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博士論文

法國的地緣戰略(1648-2009)

研究生：李政鴻 撰

指導教授：曾怡仁 博士

翁嘉禧 博士

中華民國 九十九 年 一 月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China and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Ph. D. Dissertation

The Geostrategy of France (1648-2009)

Graduate Student : Lee, Cheng-Hung

Adviser : Tseng, I-Jen Ph. D.

Weng, Jia-Hsi Ph. D.

January 2010



法國的地緣戰略(1648-2009)

摘要

法國領土毗鄰海陸的地理位置，地緣政治擴張可依循海陸兩個方向進行：海上包括大西洋與地中海兩條路徑，法國經大西洋擴大在西印度群島以及北美洲殖民勢力，另一方面跨越地中海，將勢力延伸至北非、中東、紅海、印度洋以及南海，在非洲、印度次大陸和中南半島等地建立殖民地；陸地擴張路徑則是向東橫越北歐平原，直至烏拉山。對法國而言，最理想的狀況是同時發展海權及陸權，並能夠在海、陸雙邊壓制主要對手。但是，現實情況就非如此順利，法國的外交政策需考量國際體系、歐洲地緣政治的約制等因素，並隨國際體系變遷而調整外交、軍事政策，以符合國家能力，法國地緣戰略的歷史演變即是在如此條件背景下進行。

本文採取古典地緣政治研究途徑，藉由地理、地緣政治以及地緣戰略等三個概念，勾勒出長時期法國地緣政治以及地緣戰略變化，並依循以下推演過程：第一，法國所處地理位置構成地緣戰略原型，即海權與陸權的雙元擴張路徑，並據此實踐國家地緣戰略目標；第二，法國實踐地緣戰略目標的過程，所遭受的反作用力，其他權力核心的崛起以及結盟所形成的反法勢力，如何影響並使法國修正地緣戰略；第三，再檢視法國修正地緣戰略所凸顯的地緣政治意義，是否存在變與不變的特殊意涵；最後，透過歷史事實檢驗法國地緣戰略的演變，釐清哪些是關鍵的影響因素。

最後可歸結以下幾點法國地緣戰略的特性：(一) 法國領土同時毗鄰海陸的地理特性，既是地緣政治擴張路徑，同時亦是海權受限的原因，凸顯法國地緣戰略的理想與現實雙面性；(二) 法國對歐洲進行雙軌權力平衡政策，阻擾周遭區域成立新國家，擔任大國間權力平衡者；(三) 大革命後法國仍以地緣政治，而非意識型態，作為對外政策的考量；(四) 德意志區域統一衝擊法國地緣政治，

壓制德國成為法國至今的地緣戰略；(五) 歐洲地緣政治特性：控制世界，卻未能產生歐洲帝國。

關鍵詞：地緣政治、地緣戰略、歐洲地緣政治、法國地緣戰略

The Geostrategy of France (1648-2009)

Abstract

The location of France is both adjacent to land and sea, therefore France's geopolitical expansion could follow two directions of land and sea. Regarding sea expansion path, France established colonies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 Indies by sailing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 In addition, across the Mediterranean France could expand her geopolitical influence to North Africa, Middle East, Red Sea, Indian Oc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France also established colonies in Africa, India and Indochina. Regarding land expansion path, North European plain is best way for conquering European continent. The ideal scenario for France is expanding sea power and land power altogether by suppressing main competitors. However, France's foreign policy needs to be considered with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European geopolitics. The geostrategy of France evolved under such historical context.

This dissertation applies classical geopolitical approach, includes concepts of geography, geopolitics and geostrategy, to depict the changes of France's geopolitics and geostrategy for a long time. The study's deductive logic accords with following points. First of all, location of France constructed her proto-type geostrategy as well as dual expansion by sea and land; secondly, in the situation that other European powers formed anti-France alliance, France practiced and revised her targets of geostrategy; thirdly, revisiting geopolitical meaning of France's revised geostrategy, the study tries to find out geopolitical change and unchanged; finally, the study clarifies key effect factors through historical facts of evolution of France's geostrategy.

In sum, this dissertation concludes the geostrategy of France as following: (1) France's territory is the base of expansion by land and sea; it's also the condition restricting French sea power. In other words, the location of France constructs her geostrategy pro and con; (2) France practices policy of "balance of power", preventing from new state building nearby area, and being the balancer of big powers; (3) After French revolution, geopolitics, not ideology, is still the main consideration of France's foreign policy; (4) Germany unification impacts French geopolitics, suppressing Germany is key geostrategy of France until now; (5) Controlling whole world without European empire is the attribute of European geopolitics.

Keywords: Geopolitics, Geostrategy, Geopolitics of Europe, Geostrategy of France.

致謝辭

即將畢業瞬間發覺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沒有家人的體諒支持、老師的教導以及同學們的相互鼓勵打氣，是不可能順利取得博士文憑。父母親無私地持續付出，以及老婆靜宜的犧牲，才能使我無後顧之憂的學習，在此向他們致上最高的謝意。女兒庭安算是博士班生涯的副產品，雖然常鬧警扭並惹大人們不快，但天真無邪的言行卻是最佳的舒壓劑。最重要的還是感謝老婆，最後一個半月獨自養育女兒，身心遭受的壓力絕不亞於論文寫作，辛苦了。

進中山大學讀博士班是種緣分，五年半的學習光陰，個人才有機會窺探學術殿堂的奧妙，畢業只不過是人生另一開端，這幾年的學術基礎奠定，將是個人研究生涯的寶貴資產。個人棉薄學術基礎的奠定受兩位老師影響極深：首先是張錫模老師，他在課堂內外的教導，啟發個人的學術以及政治意識，雖然張老師英年早逝，但對個人產生不可磨滅的影響；另一位則是指導教授曾怡仁老師，每週一次的導生會談所激起的學術火花，再加上紮實的知識鑽研過程，會談後常使個人雀躍不已，迫不及待下次對話的來臨。除兩位老師外，個人亦從翁嘉禧老師、廖達琪老師與顧長永老師等人的課堂收穫良多。另外亦感謝口試委員林文程院長、蔡東杰老師、陳欣之老師和王群洋老師等人對本論文提出寶貴建議，提醒個人思緒不完整之處。

最後感謝諸位同儕的相互鼓勵。家哲這位同儕兼戰友，你的不斷砥礪讓我不敢太鬆懈，未來彼此一起加油。此外亦感謝松齡與大嫂對我及內人的長期照顧，謝謝雪鳳學姐在行政與學術的協助，以及克文大哥、素杏姐、秀玲姐和子毓等人的加油打氣。感謝各位。

李政鴻 謹誌

2010/2/3 高雄

目次

第一章 序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4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21
第四節 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	28
第二章 法國崛起—全球大爭霸(1648-1815).....	31
第一節 法國與哈布斯堡王朝的歐洲大陸衝突(1648-1715).....	32
第二節 法國與英國的全球爭霸(1715-1763).....	46
第三節 法國霸權的再現(1763-1815).....	59
第四節 小結.....	73
第三章 法國地緣政治轉變—從理想到現實(1815-1945).....	77
第一節 兩次革命與第二帝國(1815-1871).....	78
第二節 德意志統一與第一次世界大戰(1871-1918).....	92
第三節 兩次大戰期間與第二次世界大戰(1918-1945).....	105
第四節 小結.....	116
第四章 大戰後的法國地緣政治—困境與突破.....	119
第一節 戴高樂主義—現實的困境(1949-1991).....	119
第二節 後冷戰時期歐洲地緣政治變動與法蘭西地緣戰略(1991-2009)...	132
第三節 後冷戰時期的法蘭西地緣政治意義.....	146
第四節 小結.....	154
第五章 結論.....	157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57
第二節 從事實與理論反思古典地緣政治學的適用性.....	161
第三節 未來研究議題.....	167
參考書目.....	169
附錄.....	183

圖表目次

圖目次

圖 1-1 研究流程.....	28
圖 2-1 1648 年的歐洲.....	35
圖 2-2 1812 年的歐洲.....	66
圖 4-1 從大西洋到印度洋的主要戰略核心.....	144

表目次

表 1-1 支配國家的地緣政治特質.....	12
表 4-1 法國重返北約軍事指揮體系的內部爭論.....	142

第一章 序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2007年薩科茲(Nicolas Sarkozy)當選法國總統，這位被形容為結合路易十四(Louis XIV)和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兩人特質的新總統，受到民眾熱烈期待，希望能夠帶領國家恢復昔日法國光榮。法國光榮除指國家實力強盛外，更指恢復法國的國際影響力，戴高樂主義(Gaullism)常用來形容這種複雜特性。其實，法國人民之所以會有如此心態，乃因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後國力衰退事實，致使法國從大國退居二等國家，國際重要性甚至比不上德國，所產生的心理落差。法國民眾期待的是像路易十四、拿破崙，甚至回到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時的光輝時代，然而事實上，法國對外政策卻受到地緣政治限制，並不總是遵循領導者以及人民的理想劇本—成為全球霸主。相反地，法國卻轉向採取更符地緣政治的現實做法—妥協與合作。

換言之，無論是過去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或現任薩科茲總統，意圖恢復光榮歷史的同時，必須考量現實環境。從十七世紀至今，法國對外政策是否有一套不言可喻的規則依循？或是受到制約？對法國而言，無論政治、經濟及軍事上，對外採取理想的全球制霸措施，亦或現實的妥協合作措施，牽涉到主觀認知還是客觀事實的發展？學界研究對外政策的著作汗牛充棟，但若缺乏長期歷史考察，以及欠缺地緣政治考量，結果將難以綜覽全貌。所以進一步啟發的思考是，究竟透過何種途徑與方法能夠理解、歸納甚至預測未來法國的對外政策？

法蘭西共和國（République française，簡稱法國）自古為歐洲大陸傳統強權，

其興衰過程影響整個歐洲，甚至全世界歷史。由於地理位置完整，以及國內中央集權特性，法國具備管理國家的優勢，法國的光芒很快地在歐陸嶄露。歐洲地緣政治決定法國海、陸發展的契機：面對地中海與大西洋，孕育出法國海權基石；陸地位置則使法國必須重視陸權，以應付鄰國的競爭。因此，對法國而言，最理想的狀況是同時發展海權及陸權，並能夠在海、陸雙邊壓制主要對手。但是，現實情況就非如此順利，法國的外交政策需考量國際體系、歐洲地緣政治的約制等因素，並隨國際體系變遷而調整外交、軍事政策，以符合國家能力，法國地緣政治的歷史演變即是在如此條件背景下進行。

綜觀法國歷史發展，可以看出法國對外政策受到地緣政治影響。過去，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為追求國土安全、維持內部完整，在國家對外擴張同時，視追尋自然地理為邊疆為優先目標；百年後，被譽為法國天才將領的拿破崙揮軍馳騁歐洲大陸時，曾說：「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在於其地理」，拿破崙所言證實地理因素影響國家對外行為；回到二十一世紀，薩科茲提出的歐盟政策、地中海聯盟、法美關係等等主張，從中亦可觀察出地緣政治脈絡。只不過，法國對外擴張的道路上，卻是處於海權與陸權發展矛盾，若過分偏重任一方，將會分散國家資源，實質限制法國國家對外能力。對法國而言，最理想的地緣戰略是能夠利用地理特性，同時發展海權與陸權。但實際情形卻讓法國將焦點置於歐洲大陸，陸權逐漸凌駕海權。最後，法國對外的現實作為變成：同海上強權合作、與陸上強權競爭。對法國而言，對外政策的理想與現實作為，表現在海權與陸權發展，區別在是否折衷妥協。¹

外交政策研究常見到三種解釋途徑：國際結構、國內根源、國家領導者及官僚機關的政策制定，但這三種已知途徑並不強調地緣政治所扮演的角色。法國地緣政治影響對外選擇，短期觀察法國對外政策，可能受到特定個人、歷史事件影

¹ 本文所指的理想與現實並非國際關係理論用法，而是單純談論法國地緣戰略最佳以及妥協劇本，海權與陸權為執行手段。理想的作為乃指法國在對外關係意圖大獲全勝，並且取得海權與陸權優勢；現實的作為乃指折衷妥協方式，標定威脅國家利益的優先順序，合作方式為可能的對外選項。

響，未具一致性和規律性。但就長期地緣政治角度觀察，法國對外政策卻是受到地理空間構成的權力與自然環境的約制，成為對外選擇考量。

因此，法國對外關係歷史發展誘發本文的問題意識，法國長期對外關係過程，地緣政治扮演何種角色？地緣戰略轉變具有何種意義？

二、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問題意識，本文研究目的包括以下幾點：

（一）從歐洲整體地緣政治的角度觀察法國地緣戰略演變。

本文主要從長期歷史發展過程，釐清歐洲國家體系與法國地緣政治間的關聯，法國在這過程當中如何締造地緣戰略，以符合國家利益。1648 年西歐建立以主權國家為主體的國際新秩序，歐洲地緣政治的演變與發展，與國家間的互動息息相關，法國的地緣戰略易受此影響而改變。本文試圖從不同歷史分期所構成的獨特體系當中，理解歐洲地緣政治變動對法國造成什麼衝擊，如何影響法國地緣戰略與對外關係。

（二）理解法國地緣政治特色。

法國的地理位置最大特色乃同時毗鄰陸地與海洋，無法單純認定法國為陸權國家（俄國），或者是海權國家（英國）。法國歷任政府依據國土特性，採取的地緣戰略亦不相同，究竟是同時擴張海權或陸權的理想劇本，還是體認現實侷限而專注其中之一發展，可能受到當時歐洲地緣政治或是重大歷史事件影響。本文嘗試理解，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當中，法國對其地理特色所採取的地緣戰略為何，地

理特性對法國而言究竟是締造優勢？還是造成困境？

（三）從長期的歷史過程，歸納出法國地緣政治演變特性。

承續前一點，除以國家為中心理解法國與其他國家的互動過程外，本文將歷史帶入地緣政治研究，透過長期的歷史觀察，歸納出法國地緣政治演變特性。本文將排除歷史事件偶然性，透過歷史分期，歸納以及比較方法，進一步釐清法國地緣政治的變與不變。

（四）探討法國地緣戰略從理想轉向現實的過程。

法國理想的地緣戰略劇本是兼具海、陸霸權，最終成為全球霸權。十九世紀初，拿破崙幾乎完成法國霸權夢想，自從拿破崙潰敗、德意志的統一和崛起，到二十世紀兩場世界大戰的浩劫，這整段歷史過程法國地緣政治從理想轉向現實，並且傾向與海洋強權合作。長期歷史可以看出法國的戰略轉折，本文嘗試討論轉折的國際因素，以及地緣政治突顯的意義。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地緣政治乃是從空間角度研究國際關係，探討法國的地緣政治亦是如此。所以文獻回顧上，有必要追溯地緣政治學與外交關係兩方面相關研究，俾能從中進一步釐清本文的問題意識，以及增進研究架構的周密性。以下文獻回顧部分主要區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法國外交政策相關研究文獻，主要探討國內外研究現狀與不足之處；第二部分將以地緣政治相關研究文獻，討論英美以及法國學者對

於法國地緣政治的看法，及其理論層面上對本文的啟發。這兩者研究都是討論國家間的關係，關聯性在於，古典地緣政治學從地理角度審視國家對外關係的選擇，以及國家地緣戰略如何形成，偏向軍事安全議題；外交政策涵蓋多元議題，且視地緣政治為外在變數，可能因研究層次不同，而將地緣政治因素排除在外。

一、法國外交政策研究

（一）國內相關文獻

國內學界研究法國國際關係著眼於外交政策，主要從國家內部政策制定，或者是法國對外之雙邊或多邊政策之演變作探討。例如，李萬來教授所著《法國外交政策結構》²一書，即討論國家內部影響外交政策制定機構，再探討戴高樂至密特朗擔任總統時期的外交作為。蘇宏達教授所著「法國第五共和外交決策的機制」³一文，則追溯法國第五共和憲政體制下總統、國家與外交間的關聯，藉由憲政制度分析，以及施行前十年的歷史經驗得知，法國第五共和總統在外交政策上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法國總統在憲法授權、直選民意支持下，主導外交決策，外交部長為主要諮詢對象，亦是執行者。而總理則除左右共治時期外，在外交政策上難有表現。吳志中教授所著「地緣政治與歷史發展下的法國國家認同」⁴一文，透過地緣政治角度以及歷史分析，談論法國國家認同的形成與演變；陳欣之教授所著「法國戴高樂政府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的回顧」⁵一文，透過文獻以及歷史分析方法，探討法國、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三者間外交關係，結論並

² 李萬來，法國外交政策結構（台北：台灣新生報，1991年）。

³ 蘇宏達，「法國第五共和外交決策的機制」，問題與研究，36卷2期（1997年），頁57-77。

⁴ 吳志中，「地緣政治與歷史發展下的法國國家認同」，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卷3期（2006年9月），頁119-140。

⁵ 陳欣之，「法國戴高樂政府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的回顧」，問題與研究，36卷7期（1997年7月），頁59-72。

指出法國與中國建交乃基於戴高樂總統個人認知以及國家利益，表現戴高樂獨立外交的特色。鄧文龍教授著文《從賠款與安全的問題論 1919-1925 法國外交政策》⁶，即以國家安全暨利益的角度，談論法國在兩次戰爭期間的外交政策。沈中衡所著《法國第五共和的中國政策》一文，則以決策者的個人層次分析，研究法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傳統，總結出政治現實主義主導巴黎—北京—台北的三角關係。

此外在學位論文部分，可將相關研究簡單分成以下兩類：外交及戰略。外交方面，最多論文研究戴高樂時期獨立自主的政策，例如，江永謀《戴高樂外交政策(一九五八 - 一九六九年)之研究》、孫若怡《一九六〇年代戴高樂的外交政策》、蕭惟仁《戴高樂對歐洲整合發展之影響》、鄭忠恩《從戴高樂主義看法國外交政策》；少數研究密特朗時期外交政策，例如；高懷京《密特朗之大西洋政策》。此外，一些比較外交政策的論文，則有李瓊玉的《英國、西德、法國在冷戰形成過程中的對外政策比較分析(1945-1955)》和于鳳娟的《德法合作條約之研究(一九六三 - 一九八八)》。至於研究法國戰略有，陳士良《法國核子政策之研究》及譚傳毅《法國國家戰略研究--形成國家權力的基礎及國家權力的行使》等等。⁷

上述提及的文獻，絕大多數限於特定時期之特定政策，或者是過於強調特定因素，例如領導者特質以及憲政制度影響等，並未將地緣政治視為重點考量，且均歸納短期研究結果。對此，現階段國內對於法國的研究仍以現代外交政策為主，缺乏一套理解長時期發展之研究途徑，並且難以從中尋得一致性、甚至得以預測未來。

⁶ 鄧文龍，「從賠款與安全的問題論 1919~1925 法國外交政策」，文藻學報，10 期(1996 年 3 月)，頁 47-66。

⁷ 學位論文的詳細書目如後：江永謀，戴高樂外交政策(一九五八 - 一九六九年)之研究，私立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 年；孫若怡，一九六〇年代戴高樂的外交政策，私立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5 年；蕭惟仁，戴高樂對歐洲整合發展之影響，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鄭忠恩，從戴高樂主義看法國外交政策，私立佛光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李瓊玉，英國、西德、法國在冷戰形成過程中的對外政策比較分析(1945-1955)，私立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年；于鳳娟，德法合作條約之研究(一九六三 - 一九八八)，私立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 年；陳士良，法國核子政策之研究，私立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5 年；譚傳毅，法國國家戰略研究--形成國家權力的基礎及國家權力的行使，私立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

(二) 國外相關文獻

國外研究法國對外關係文獻較為豐富，尤其以研究法國外交政策最多，其中又以研究戴高樂主義為最。例如，Afred Grosser 的 *General De Gaulle an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Fifth Republic*、P.G. Cerny 的 *De Gaulle, the Nation-State and Foreign Policy*、Stanley Hoffmann 的 *De Gaulle, Europe, and the Atlantic Alliance* 及 *Gaullism by Any Other Name*、Dorothy Pickles 的 *The Decline of Gaullist Foreign Policy*、Robert G. Neumann 的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Gaullism in France*、David R. Cameron、Richard I. Hofferbert 的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Gaullism: The General's Legacy* 等。⁸這些文獻主要探討二戰後法國外交政策上的戴高樂主義形成背景與原因，及對法國外交政策及歐洲的影響。戴高樂主義常被視為理解當代法國對外關係的重要遺緒，因此研究重點置於戴高樂時期法國外交政策特點，以及對後世的影響。

此外，國外研究亦聚焦於法國與歐洲之關係，探討法國在歐洲統合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與北約在安全方面的合作等。例如，Michael Sutton 所著 *Fr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urope, 1944-2007—The Geopolitical Imperative* 一書，內容描述二戰後法國不同領導者對歐洲統合所採取的政策演變。雖然作者在書名副標題提及地緣政治的重要性，文中並無任何地緣政治相關理論討論及引用，亦無談論法國地理特性對歐洲統合政策的影響。全書核心為德國問題，法國所要面對的是德國

⁸ 詳細書目如後：Afred Grosser, "General De Gaulle an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Fifth Republic,"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9, No.2(Apr., 1963), pp. 198-213; P.G. Cerny, "De Gaulle, the Nation-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33, No. 2(Apr., 1971), pp. 254-278; Stanley Hoffmann, "De Gaulle, Europe, and the Atlantic Alli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18, No. 1(Winter, 1964), pp. 1-28; Stanley Hoffmann, "Gaullism by Any Other Name," *Foreign Policy*, No. 57(Winter, 1984-1985), pp. 38-57; Dorothy Pickles, "The Decline of Gaullist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1, No. 2(Apr., 1975), pp. 220-235; Robert G. Neumann,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Gaullism in France,"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6, No. 2(Jun., 1953), pp. 250-274; David R. Cameron and Richard I. Hofferber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Gaullism: The General's Legac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7, No. 1(Feb., 1973), pp. 77-98.

軍事、經濟以及統一等議題。因此，法國所採取的法美、法英雙邊政策和歐洲統合政策，其目的為締造權力平衡或者是制約德國。

對外安全政策方面，法國學者 Jean-Sylvestre Mongreler 著有《法國、歐洲與北約—法國大西洋主義地緣政治途徑》(*La France, L'Europe, L'Otan—Une Approche Géopolitique de l'Atlantism Français*)一書談及，雖然戴高樂決定於 1966 年 3 月 7 日退出北約軍事架構，不過作者認為法國與北約軍事合作並未中斷，甚至在後冷戰時期共同面對巴爾幹、中東、北非等區域危機，關係更為密切。書中所提地緣政治途徑無涉及任何相關理論，主要談論法國與北約軍事合作，共同處理地緣上可能發生的安全威脅。

綜上所述，國外研究主題與本文較為貼切，不過整體成果仍有不足之處。首先，內容欠缺清晰的研究途徑，雖不乏冠上地緣政治的研究名稱，但文中卻未對此詳加說明，研究內容不具有系統性；其次，研究方法上雖以歷史分析為主，不過太著重於當下或者短期事件的影響，欠缺長期歷史視野，僅能理解部分而非整體；第三，仍然過於偏重政策或議題的理解，研究上可能以領導者為中心，或者注重政策分析，地緣政治因素成為分析要素之一而已。上述研究文獻與作者希望能從地緣政治角度觀察法國長期對外政策並不相同。

二、研究法國地緣政治相關文獻

十九世紀末以來，人類開始以地理學基礎研究國際關係與國際問題，因而出現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這一學門。地緣政治學起源與契倫(Rudolf Kjellen)和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密切相關，二十世紀初著名的地緣政治學者，包括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麥金德(H. Mackinder)、郝斯霍佛(Karl Haushofer)、史派克曼(Nicholas J. Spykman)、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以及帕克(Geoffrey Parker)等。法

國學界受到德國和英國地緣政治學發展影響，亦發展出法國特色的地緣政治學，主要學者包括維達爾(Paul Vidal de la Blache)、德芒戎(Albert Demangeon)、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以及拉柯斯特(Yves Lacoste)等人。本文不擬全數回顧這些作者的作品，僅討論英國、美國與法國學者對於法國地緣政治的研究文獻，可以發現，單論法國地緣政治的著作並不多。

(一) 英國與美國學者對法國地緣政治研究文獻

1、法國地緣政治的困境

對於一個強大的國家來說，同時毗鄰陸地以及海洋的地理位置，可成為國家往外擴張的絕佳條件，然而，美國學者馬漢以及專門研究霸權興衰的學者保羅甘迺迪認為法國地理位置反是擴張的障礙。

美國海軍歷史學家馬漢在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書中，強調海權對歷史的重要性。馬漢認為英國能與法國全球爭霸脫穎而出，主要依據海軍實力。在他的海權理論當中，地理位置、自然結構（物產與氣候）、領土範圍、人口、民族特性、政府性質（國家機關）等要素構成海權，英國與法國是一組對照例子。雖說馬漢著重海權的發展及影響，但其闡述的是國家如何在地理空間與國內特性下制定對外戰略，就此而言，英國在國內外環境壓力，即國家生存的壓力，不得不向外發展海洋貿易，建立一支無可匹敵的海軍將可維護海洋貿易線。

相較於英國，法國地理位置雖未如英國般有利於海權發展，不過毗鄰大西洋和地中海的領土特性，亦提供法國發展海權的道路。只是，馬漢認為法國未像英國，將發展海權視為首要之務，主要是地緣政治要素賦予法國選擇的可能性。首先，法國肥沃的土地以及合適的氣候，使其無需仰賴海洋貿易，即可獲得自足的物產；其次，法國領土雖不缺乏海岸線，但其位居歐洲大陸的地理位置，讓法國

發展海權之餘，卻無法忽視陸權的重要性，畢竟陸權強弱直接攸關法國國土安全；第三，在人口要素方面，不光是人口總數，馬漢所指的是能夠支援海權發展的潛在人力資源，並非以總人口來衡量，法國在這方面不及英國，主要為較少人從事海洋貿易；第四，就民族特性而言，馬漢認為法國良好地理位置未能使法國人熱衷海洋貿易，而且法國民族的節儉、節約以及囤積致富的特性，更與西班牙、葡萄牙、英國與荷蘭積極朝海洋冒險的特性形成對比；最後，關於政府性質，法國政府並非全然忽視海權發展，但最終在同英國爭霸中落敗，除了是政府海權政策缺乏連貫性之外，外交政策和採取大陸擴張政策等轉變，最後影響了法國海權實力。簡言之，法國發展生產、海運和殖民地的過程，決定其海權的政策與歷史發展。⁹

馬漢著作部分地呈現法國的地緣政治發展，解釋影響法、英海權爭霸之因素，同時亦誘發本文建構完整地緣政治圖像。無疑地，陸權擴張政策影響法國海權發展，此點關鍵除決策者外，勢必得從歐陸地緣政治轉變分析。就此而言，馬漢作品讓作者進一步思索，若拉長馬漢呈現的歷史縱深，法國地緣政治是呈現不規則發展？或者能找出規律？馬漢雖然條列出法國海權比不上英國的地緣政治困境，但著作後續描述各時期的海軍戰役，內容偏重軍事戰術的討論，未能進一步帶進歷史來分析法國海權發展的因果關聯。

另一方面，耶魯大學保羅甘迺迪教授所著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一書，跨越五個世紀(1500 至 2000 年)宏觀地歷史分析，描述霸權興衰過程。保羅甘迺迪以對內財政支配能力、對外軍事實力為主軸，勾勒出主要國家間軍事衝突以及優劣情勢，地緣政治位置提供各個不同衝突引爆點。坦白說，保羅甘迺迪乃是一標準現實主義者，雖然他否認經濟是決定國家爭霸勝負的唯一因素，但從書中來看，其緊密環扣財政能力、科技發展與軍事實力的邏輯分析，儼然成為國家興衰的關鍵要素，權力才是國家稱霸的關鍵，這點不容置疑。

⁹ A.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Inc., 1987), pp. 69-81.

此外，保羅甘迺迪書中亦呈現國家與地緣政治關係，歐洲民族國家的誕生乃是經歷長期中央政治與軍事權力集中化過程，在君主統治之下隨著國家稅收的形式增多，官僚機構也更趨複雜，¹⁰同時，地緣政治也扮演重要角色。保羅甘迺迪所謂的地緣因素不單單為一個國家的氣候、自然資源、農業生產力、便捷的通商路線，尚包括戰爭時所佔據的戰略位置，以及鄰國屬性（權力強弱、鄰海或陸地），¹¹保羅甘迺迪著作遵循經濟邏輯與科技發展，結合國家間複雜的合縱連橫外交以及軍事衝突，探討霸權主宰國際政治的條件。

法國在爭霸過程並沒有缺席，不過保羅甘迺迪認為，縱然是路易十四或是拿破崙時期，仍未能獲得長期主宰地位。他認為法國縱然有強大的防衛力量，但其地理位置卻不適合當作對外征服的決勝地帶，因為無論從任何方向觀之，法國都處於被包圍狀態，不是受到地理障礙的限制，就是與其他大國利益衝突。¹²此外，法國的財富、人口與國土幅員堪稱大國，但其長期缺乏國家目標，過度向外擴張，以及海、陸權力發展不均的情況下，並未能取得超級大國地位。最重要的是，保羅甘迺迪認為支撐國家往外擴張的動能來自內部經濟成長，法國雖亦採行工業化，不過整體財政健全比不上英國、普魯士，以及之後的美國與俄國。不過，保羅甘迺迪雖然從經濟—軍事—科技等三重因果關係，談論霸權的興衰過程，然數百年歷史過程當中，除前言論及地緣政治因素外，其餘部分的發展卻是去地理，同時亦回歸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

簡言之，馬漢以及保羅甘迺迪都指出法國地緣政治的困境，前者缺乏更細膩的關聯性描述；而後者雖導以經濟與科技因素，最後卻將地理因素排除在外，反更像傳統現實主義的研究。

¹⁰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pp.70-71.

¹¹ *Ibid.*, p. 86.

¹² *Ibid.*, pp. 90-91.

2、法國地緣政治擴張

英國學者帕克(Geoffrey Parker)主要在 *The Geopolitics of Domination*、*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與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三本著作裡，專門介紹地緣政治學這門學科的發展和特色，歸納鄂圖曼帝國、西班牙、奧地利、法國、德意志的歷史發展，並提出支配性的地緣政治模型，以俄羅斯為個案，闡述地緣政治與帝國擴張的動態關係。帕克耙梳歐美地緣政治的發展脈絡，並且試圖透過歷史資料，歸納影響地緣政治的關鍵因素，就學科發展而言，帕克可說功不可沒。

帕克認為地緣政治外觀(geopolitical surface)具有兩項不穩定的特質：首先，政治強化會對其產生壓力，並且定期引爆而損及由人口、經濟及社會建構的「地緣社會世界」(geosocial world)；另外，某些國家可能藉前述崩潰現象，意圖改變體系現狀，透過變更疆界、領土獲得，而成為區域霸權。¹³針對這些現象，帕克認為地緣政治因素是非固定性，甚至欠缺穩定性，原本崇尚和平的國家可能轉變成侵略國。帕克的研究成果能夠延伸一連串問題：地理因素是否決定一切？改變地緣政治的驅動力為何？驅動力來源是內生還是外生？

表 1-1 支配國家的地緣政治特質

特質	鄂圖曼	西班牙	奧地利	法國	德意志	總計
1.母文化原始核心疆界	*	*	*	(*) ¹⁴	*	4
2.相對貧窮區域的原始及歷史核心	*	*	*		*	4
3.歷史核心位於內部地點	*	*	*	*	*	5
4.歷史核心國家取得海岸線	*				*	2
5.歷史核心較母國發展差	*	*	*	(*)	*	4
6.歷史核心國家是集權、絕對主義和軍事化	*	*	*	*	*	5
7.原始及歷史核心接鄰母國，但維持獨立	*		*		*	3
8.中央向心力強	*	*	*	*	*	5

¹³ Geoffrey Parker, *The Geopolitics of Domination*(London: Routledge, 1988), p.3.

¹⁴ (*)部分指法國呈現不規則發展。

9.早期獲得許多有價值的領土	*	*	*	(*)	*	4
10.隨後獲得有價值領土，成為經濟中心		*	*		*	3
11.首都遷至征服領土	*	*	*	(*)	*	4
12.首都仍然在歷史核心(在原始或征服領土內)		*	*	*	*	4
13.歷史核心與巨型文化核心遠離或分離	*	*	*	*	*	5
14.封建農業的歷史核心	*	*	*	*	*	5
15.佔領地遭受核心民族殖民	*	*			*	3
16.多元種族與文化圍繞在擴張核心疆界	*	*	*		*	4
17.核心國家強制統一	*	*	*	*	*	5
18.外在壓力與事件導致擴張	*	*	*	*	*	5
19.在支配企圖前，核心民族社會、政治動亂				*	*	2
20.擴張受到疆界動亂或權力真空鼓舞	*	*	*			3
21.為達天然疆界而進行擴張			*	*	*	3
22.控制巨型文化，成為母國繼承者	*	*	*	*	*	5
23.擴張至鄰近無障礙低地			*		*	2
24.擴張至相似物理條件區域	*	*	*	*	*	5
25.同種人口團體變成核心民族	*	*		*	*	4
26.兩階段支配企圖： 一、區域霸權 二、普世國家(帝國)	*	*	*	*	*	5
27.第二階段持久(至少兩世代)	*	*	*			3
28.控制文化聖地	*	*		*		3
29.控制領地的秩序制定	*	*		*	*	4
30.強制政治、經濟及文化的統一	*	*		*	*	4
31.地理邏輯統一	*	*	*	*	*	5
32.試圖創造封閉控制區域		*		*	*	3
總計	26	27	24	19(23)	29	
總計%	81	84	75	59(72)	91	

資料來源：Geoffrey Parker, *The Geopolitics of Domin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88), pp.66-67.

上述種種疑問亦構成帕克寫作中心，參酌歐洲國家的歷史演變後，他歸納出三十二項支配國家的地緣政治特質(表 1-1)，其中帕克篩選二十一項特質(附加

者)，用以解釋國家源起支配地位的過程，建構一套支配國家之地緣政治模型。在他所區分的三階段（國家形成、擴張、支配地位）過程裡，乃由文化、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四個力量交互作用，決定地緣政治，並且驅動國家對外政策。簡言之，帕克必須仰賴豐富的歷史素材、官方文獻及地理觀點，才能描繪出長期且動態的地緣政治圖像。

事實上，帕克提出的地緣政治模型，線性地從國內到國際解釋國家行為，忽略國家對外行為乃國內、國際互動後產出之結果。其實另一本著作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中，帕克特別提出國家的空間形態（第五章）地緣政治分析的微觀、中觀和宏觀視野（第六章）與極化世界（第七、八章），可惜的是，帕克所提的地緣政治模型，雖強調國家內部權力與空間形態的變遷，卻未能連結國內與國際，也就是探討國內空間型態與國際空間型態的辯證過程。此外，地緣政治模型仍嫌簡約，縱然帕克嘗試以俄羅斯為個案研究，推論過程略顯片段、不完整，歸納所得影響變數亦未曾接受全面性檢驗，尚不足為地緣政治研究者提供普遍性法則。帕克雖列出五個國家的特質，除俄羅斯外，作者未能夠提出一套詳實地經驗性研究，佐證其主張。

雖然如此，帕克對地緣政治的學術研究啟發本文甚多。例如，帕克描述法國地緣政治演變過程，溯及巴黎塞那河所孕育的文明、百年英法戰爭締造的法國認同，直至 1871 年普法戰爭結束。文中帕克強調法國在人口、農業及工業上的優勢，奠定路易十四和拿破崙對外擴張的基礎。此外，法國最具獨特的地緣政治思維，乃是結合天然邊疆(natural frontier)與國家安全需求，合理化國家對外擴張的行為。本文亦認為研究法國地緣政治必須從歷史著手，而且必須依賴長期歷史研究，帕克的研究雖提出複雜的地緣政治模型，但在個案研究時會遇到歷史資料佐證不足的困境，且過於獨斷的線性因果關係，用於歷史解釋將會可能流於主觀。

3、霸權大戰略與法國地緣政治

第三類的著作最為常見，主要是從霸權，特別是美國霸權的角度，談論法國地緣政治的重要性。本文從麥金德、史派克曼以及布里辛斯基等三人作品，談論法國在全球地緣戰略的重要性。

首先，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在 1905 年發表的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文章，以及 1919 年著作 *Democratic Ideals and Practice* 當中，從長期歷史看待草原游牧民族與海洋民族(seamen)之間的對抗。他將歐亞大陸稱為世界島(world island)，認為歐亞大陸內陸遠離海洋地帶，乃是人類歷史上的樞紐，稱之為「心臟地帶」(Heartland)。心臟地帶外側由兩個新月型地帶(crescent)包圍：內新月型地帶(inner marginal crescent)指歐亞大陸毗鄰海洋地帶，包括德國、奧地利、土耳其、印度以及中國；外新月型地帶(outer insular crescent)則是隔著海洋，分佈在歐亞大陸邊緣的島嶼，包括英國、日本、東印度諸島以及澳洲等。¹⁵麥金德最為人所熟知的地緣政治三段論證是：

誰統治東歐則控制心臟地帶

誰統治心臟地帶則控制世界島

誰統治世界島則控制世界

從麥金德看來，東歐的重要性逐漸提升，尤其德國逐漸取代俄國，成為英國的首要對手情況下，德國若掌握東歐，將對英國產生不利影響。在麥金德的構想，法國扮演對抗陸權國家勢力向海權國家擴張的橋頭堡，英國應該與法國結盟，一方面迫使陸權國家必須增強陸軍以對抗法國，另一方面英國則從海上支援法國，使其能夠抗衡陸權國的勢力擴張。¹⁶麥金德於 1943 年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文章中，更清楚界定德國為主要威脅，主張透過西邊海權國

¹⁵ H.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23(1904), p. 436.

¹⁶ *Ibid.*, p. 436.

家和東邊陸權國家聯合，讓德國陷入雙面作戰的困境。不同的是，麥金德結合美國和英國兩個海權國家，共同對付陸權國家，其中法國依然扮演橋頭堡角色。¹⁷

其次，美國地緣政治學者史派克曼在 *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The Geography of Peace* 等著作中闡述地理與外交政策的關聯性，以及美國如何依據地緣政治特性制訂大戰略。史派克曼認為地理因素是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條件之一，地理環境的特性是持續存在、不易改變，其可區分成領土幅員(size)和位置(location)：前者包括自然地形、氣候環境以及交通系統等；後者則指國家的地理位置，依據鄰近陸地與海洋的特性，評估其在世界的位置，並且從鄰國的相對位置來觀察，能夠理解潛在的夥伴國和對手國，決定是否參與集體安全體系。不過史派克曼強調，地理因素雖重要，但並不意謂其能夠決定一切。¹⁸

史派克曼認為並沒有單純的海權與陸權對抗，而是兩者結合對抗另一陣營，其提出「邊緣地帶」(Rimland)形容陸權與海權交會地帶，類似麥金德提出的新月型地帶，這地帶在歷史上持續受到陸權擠壓。歐洲大陸對美國而言，應該是繼續英國的權力平衡外交政策，即維持德國、法國與中東歐國家間的權力平衡。史派克曼對歐洲的關注著重在德國與蘇聯，甚至希望能夠在這兩國中成立大東歐邦聯，平衡兩國之間的關係。法國在美國擘劃的大戰略中地位並不突出，這與當時二戰仍未結束，維琪法國稱不上是完整國家相關，直至冷戰期間，法國對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性再度出現。

最後，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著 *The Grand Chessboard* 一書，乃是從地緣政治角度思索美國全球戰略。對布里辛斯基而言，歐亞大陸像是競逐全球霸業的大棋盤，棋盤上存在不同玩家，由於美國民主政治體制限制其帝國式動員能力，若想維持美國全球霸業，就必須與棋盤上其他玩家

¹⁷ H. J.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Foreign Affairs*, Vol. 21(July, 1943), p. 601.

¹⁸ Nicholas J. Spykman, "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 I,"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2, No.1(Feb, 1938), pp. 28-50.

合縱連橫。¹⁹ 布里辛斯基認為美國主導國際事務，無法排除政治地理特性，他強調全球層次的地緣政治，必須跳脫麥金德(Harold Mackinder)的心臟地帶論，或是排除簡單地海權和陸權二元對立，而集中注意關鍵玩家和地理位置。如此，美國才能長期駕馭歐亞地緣政治利益，制定合適的地緣戰略。

實際上，布里辛斯基的全球大棋盤，乃是結合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與地緣政治理論，民族國家為全球政治主要行為者，行動上則依據國家利益以及權力等原則。根據其主張，法國是美國大西洋聯盟不可缺少的夥伴，縱然法國在歐洲認同以及北約組織內部運作上與美國看法分歧，布里辛斯基認為美國需要克服這些短期障礙，畢竟法國與德國、地中海區域的地緣政治特性，使其成為穩定歐洲大陸的重要棋子。布里辛斯基從美國中心來看待法國地緣政治的重要性，時序上偏重於後冷戰時期發展，不過光就法國而言，其地理位置影響的歷史時期應可再往前追溯。

(二) 法國學者對法國地緣政治的研究

相較於英美學術研究，法國學界對地緣政治學研究具有強烈的人文色彩，所受影響可追溯至地理學家維達爾(Paul Vidal De la Blache)。其認為地理分析主要是兩個概念：一為生活方式(*genres de vie*)；另一為研究流動、移民與貿易。²⁰ 維達爾以及跟隨者所形成的維達爾學派(Vidalian)，主要對照於德國地理學的「環境決定論」思想，認為區域結構分析需要涉及經濟與歷史研究。就某種程度而言，維達爾地理學派促進爾後法國歷史年鑑學派(*Annals School of History*)，結合地理史、經濟史及人口史。雖說年鑑學派並不是以研究地緣政治或者國際關係為宗旨，其「透過新的方法來構思社會事物」的認識論，甚至影響到法國現代地緣政

¹⁹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p. 61-63.

²⁰ Paul Claval, 鄭勝華等譯, 地理學思想史(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三版, 2007年), 頁 142。

治發展。因此，在法國文獻部分，以下將回顧維達爾、德芒戎(A. Demangeon)、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以及拉柯斯特(Yves Lacoste)等人作品，闡明法國地理學思想的特性和對本文的啟發。

首先，維達爾在其著作 *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²¹ 提出與麥金德不同的地緣政治觀點，認為海洋國家透過海上航路，突破陸地的地理邊界，能夠締造海洋帝國(Oceana)。陸權對海權的影響越來越弱，海洋無邊界、運輸成本低廉等便利性，使海洋國家容易擴張勢力，陸權國家則得面對溝通困難、自然環境、氣候調適等等阻礙，擴張程度遠不及海洋國家。²² 他的另一本著作《法國東部》(La France de l'Est)寫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本書可說是法國學界最早研究法國地緣政治的專論，主題討論法國與德國間的洛林和亞爾薩斯問題。內容當中提及德國統一後企圖控制周遭區域，特別是西邊和南邊區域，但因為德國位於中歐的地理位置，擴張的努力受到阻止。²³ 維達爾從地理環境、人口組成、工業發展、經濟組織和交通網絡等層面，說明洛林與亞爾薩斯跟法國東邊地區密不可分。最後結論部分，維達爾則回到國家中心，鼓吹這兩地區應再度併入法國領土。維達爾作品屬於區域研究，討論約百年法國東疆的歷史發展，內容提及對德國崛起的影響以及法國與這兩地區間的地緣關聯性。整體而言，其人文地理學隱含政策指導思想。

其次，德芒戎將法國地理學的特色進一步發展成全球層次。德芒戎學術研究受到老師維達爾深遠影響，除對區域研究的關注外，在其 1920 年出版的《歐洲的衰落》(Le Déclin de l'Europe)中從全球層次討論歐洲的未來。如同書名所表示的意思，德芒戎認為歐洲的霸權即將結束，因為戰爭嚴重傷害歐洲經濟，歐洲糧食依賴國外進口、債務增加以及貿易赤字等，使得歐洲無法跟北美洲的美國，以

²¹ 作者以英文翻譯版本為參考資料，文中列出英文名稱，法文書名為 *Principes de Géographie Humaine*。

²² P. Vidal De la Blache, Millicent Todd Bingham(tran.), *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26), pp. 435-437.

²³ P. Vidal De la Blache, *La France de l'Est*(Lorraine-Alsace)(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Twelfth Edition, 1918), p. 196.

及東亞的日本競爭。德芒戎從工業生產、金融數據以及海軍軍艦數目，比較歐洲、美國和日本之間的差異，內容中亦從地理位置解釋日本和美國海權擴張的動機。德芒戎在最後部分建議法國政府應該要：(一)鼓勵生育，增加法國人口數目；(二)開墾土地，避免糧食過於依賴國外進口；(三)提高機器生產能力；(四)擴展海外貿易；(五)加強法國與殖民地的聯繫。²⁴值得注意的是，德芒戎與維達爾對全球地緣政治的看法一致，兩者皆認同海權的重要性，只不過德芒戎更偏重經濟邏輯的分析途徑，特別用於解釋日本與美國的擴張。

第三，法國地理維達爾學派影響後其歷史年鑑學派的成立，布勞岱爾為年鑑學派重要領導人，其生平三大名著為《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ècle*)及《法國認同》(*The Identity of France*)，他認為歷史研究不應該侷限在狹隘的政治史、人物史或軍事史，而該結合經濟、科技、地理、科技、生態以及文化，擴展歷史的空間與時間視野，如此才能呈現人類全部的歷史。此外，布勞岱爾著作經由歷史三分法來鋪陳：長期—結構、中期—趨勢、短期—事件。首先，事件指的為個體歷史，特性為短暫迅急，為傳統歷史唯一關切的事情；第二類為趨勢(*conjunctures*)，指的是經濟與社會結構、政治組織、文明等，變遷時間較為緩慢，可能為五年、十年、廿年或是五十年；最後，所指的長時間幾乎是靜止的，甚至需花費一世紀至數世紀的時間才能辨識其微妙變化，長時間包括人的生物性變化、自然地理、氣候環境等。²⁵

所以，布勞岱爾在《法國認同》一書中的內容安排，第一冊主要討論歷史與空間，即談論法國境內的諸多不同(*diversity*)，例如語言、文化、地區經濟形式、氣候及環境等，接著談論法國地理特性以及邊疆之演變；第二冊則以人為主體，討論人口變動以及生產模式。依據布勞岱爾寫作計劃，《法國認同》總共四冊，

²⁴ A. Demangeon, *Le Déclin de l'Europe*(Paris: Payot & Cie, 1920), pp. 292-309.

²⁵ 賴建誠譯著，年鑑學派管窺（台北：左岸文化，2003年），頁115。

除已出版的前兩冊外，預定出版的第三冊以國家為主題，第四冊為對外關係。可惜的是，布勞岱爾未完成寫作計劃即逝世。對其而言，地理為歷史長時期結構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建立的空間模式，在不同的時間演變裏，使得社會現實(social reality)變得清晰。²⁶

《法國認同》並非是一部談論地緣政治的著作，亦非法國國家史，布勞岱爾想要採用歷史三分時期方法，呈現法國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的完整歷史。布勞岱爾對歷史獨特的詮釋，結合地理、經濟與社會研究方法，能夠提供地緣政治研究新思維，即長期、微變的地理環境構成地表上生活方式，進而影響國家與社會組織模式。相反地，國家與社會的互動亦會改變先天地理限制，使得地理、國家與社會的發展成為一可能性組合。對布勞岱爾而言，若欲理解歷史，就必須理解「全部歷史」(total history)。相對地，想要理解法國地緣政治發展，亦必須考量內部國家與社會等變數，避免過度陷入地理決定論。

最後，拉柯斯特被譽為法國現代地緣政治之父，致力於推廣地緣政治研究，他對地緣政治所下的定義為：「關於居住在領土上的人們，其形成相互影響、敵對的權力(pouvoirs)關係，敵對存在所有權力結構之內，並不僅限於國家」。換言之，拉柯斯特認為除權力和領土為地緣政治基本要素外，民族(la nation)、宗教、文化的重要性亦不可忽略。在其主編的「希羅多德」(Hérodote)雜誌當中，研究主題更涉及生態、環境、貧窮等問題，展現出法國地緣政治的廣泛性，對此，帕克認為拉柯斯特主導的地緣政治研究強調「聯合」(groupement)的思想，而不是針對國家與國家間的權力關係。²⁷

拉柯斯特在「地緣政治：今日之長期歷史」*Géopolitique—La Longue Histoire D’Aujourd’hui* 書中曾區分地緣政治分析層次為，國家內的城市結構、地區，以及區域與全球層次。研究方法上，拉柯斯特則強調歷史的重要性。因此，對於法國地緣政治的篇幅主題相當廣泛，包括國家內部語言地圖、國際法語地緣政治、

²⁶ Fernand Braudel, Sarah Matthews (tran.), *On History*(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 51-52.

²⁷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London: Pinter, 1998), pp. 52-54.

法國在歐洲大陸、地中海以及全球的地緣政治角色。此外，書中最大的特色，即是採用圖片方式呈現各個地緣要素間關係及其歷史演變。

本文認為強調歷史分析的重要性，不但是法國地理思想的特點，同時能夠採用歷史資料來反駁地理決定論。然而，無論是布勞岱爾或是拉柯斯特，其研究並非為地理、歷史或是結合兩者，發展一套理論來解釋、甚至預測未來。尤其是拉柯斯特的地緣政治研究具有強烈左派思想，其試圖突顯人類不平等的努力不言可喻，但與英、美研究成果相較，則是缺乏解釋和預測的企圖。如此一來，拉柯斯特的研究就容易淪為事實陳述，欠缺理論解釋能力。

外交政策與地緣政治的研究非平行沒有交集，例如，Michael Sutton 以及 Jean-Sylvestre Mongreler 的著作想要結合外交政策與地緣政治途徑的作法，與本文的研究動機相同。但是兩人偏重短期研究，而且將地緣政治視為靜態因素，顯然跟本文研究途徑和研究方法不同。因此，本文將提出以歷史為方法的地緣政治途徑來進行研究。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研究途徑

綜上所述，雖然本文並未全然接受英美、法國學界的相關文獻，然不可諱言，其研究仍給予本文許多啟發。事實上，英美學者與法國學者研究差別頗大，前者屬於權力途徑，重視經濟、軍事實力及其他權力因素，試圖藉比較及歸納研究途徑，找出單一或者數個決定變數。例如，保羅甘迺迪著重經濟力、馬漢強調海軍力量、帕克的權力膨脹擴大論、以及隱藏在史派克曼和布里辛斯基文中的權力基礎等。基本上，這些著作都有結合地緣政治因素，並且歸納出一套依賴權力為基礎的分析途徑。某種程度而言，英美相關研究跳脫簡單地理決定論，強調國家是

行為主體，權力驅動國家間互動關係。相較之下，法國學者研究則重視不同層次的地緣政治，藉由層次分析以及歷史研究方法，勾勒地緣政治的整體圖像，而非使用解釋或者抽象地歸納出運作法則，地理環境在其中僅是影響要素之一。整體而言，英美學者與法國學者根本差異在於本體論(ontology)的看法不同，所進行的研究工作，與其說是對立，不如說兩者具有互補性。

本文希望從地緣政治角度，研究法國長期的對外關係，亦即研究法國貫徹國家利益的地緣政治基礎。回顧英美地緣政治相關文獻，除保羅甘迺迪接近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研究外，馬漢、麥金德、史派克曼以及布里辛斯基等人所使用的地緣政治途徑，可以歸納為古典地緣政治學，其特色包括以國家為中心、權力平衡原則、理性主義(rationalism)以及國際無政府狀態。從這些特點來看，古典地緣政治似乎與國際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相同。然而，現實主義的研究途徑著重權力平衡，從國家間相對權力關係解釋戰爭的發生以及和平的維持，國家透過結盟或是軍備競賽方式維持國家體系穩定，預防衝突再起。結構現實主義以及霸權穩定理論皆是延續國家中心，強調國際間無政府的狀態，不過兩者的差異在於，前者認為兩極體系較能夠維持和平，後者則是認為強大霸權的存在，才能夠維持體系的和平。無論是現實主義或者新現實主義，嚴格地說，兩者都是去空間的研究，亦即，縱然現實主義將領土割讓、軍事結盟視為達成均衡的手段，但欠缺地緣政治的檢視，無從細膩解釋為何選擇甲國而非乙國為同盟對象；新現實主義亦未能解釋，為何法國與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在歐洲大陸形成兩極對抗的均衡體系之下，兩者間仍然衝突不斷？以及為何法國在路易十四和拿破崙時期，其霸權地位卻遭到其他歐洲國家聯合抵制？

使用地緣政治途徑研究可以彌補上述不足，亦即，透過國家所處地理空間的考察，能夠更清楚理解國家對外行為。地緣政治如同葛雷(Colin S. Gray)所指，以領土為基礎的安全共同體，對國家政策選擇與戰略締造，所產生的意義。葛雷認為，國家地理上的親近性(proximity)將會產生相關議題，例如，衝突議題（戰爭）以及聯盟的誘因，這些議題將成為國家政策和戰略制訂時，必須考量的因素

之一。²⁸本文的研究途徑乃藉由地理、地緣政治以及地緣戰略(geostrategy)等三個概念，勾勒出長時期法國地緣政治以及地緣戰略變化。地理是指物理現實，由山脈、河流、海洋、季風模式等組成，描述地表的地質特徵除某些自然災害(地震、氣候改變)更改地質特徵，或是政治變動(帝國擴張、國界調整)改變國家地理界線外，地理通常是固定不變的，地理本身不是解釋外交政策的有用變數。地緣政治是指地理範疇內的人類因素，資源核心與交通路線的地理分佈，決定其位置價值與戰略重要性。地緣政治情況為技術與地理互動，影響經濟、政治以及位置之重要性。地緣戰略是國家外交政策的地理方向(指導)，更精確地說，地緣戰略描述國家透過軍事以及外交活動的努力，假定國家在有限的資源下，投射政治以及經濟在特定世界區域。國家的地緣戰略非必然由地理或政治因素驅使，也許可能是意識型態理由、利益團體或簡單地為領導人因素。²⁹換言之，國家所關注的地緣戰略區域(geostrategic region)即地理特徵整合，含括區域、流動、貿易傾向以及文化或意識型態連結，以及在國界外控制陸地以及海上通路，地理範圍成為政治與經濟行動的架構。³⁰

不過，想要依據地緣政治並且制訂最合適的地緣戰略相當困難，主要原因有二：(一)沒有誰是完美的地緣政治家，能超脫而不受其他利益或觀念影響，而看到地緣政治的客觀現實；(二)地緣政治變動的本質，變動當下很難測量程度，反而是變動後才能清楚看出，例如二十世紀對石油的需求改變美國地緣戰略，這過程只能仰賴歷史來解釋。³¹本文透過歷史來理解法國地緣戰略演變，探索特定歷史分期當中，法國何以透過軍事、外交活動，將政治、經濟權力投射在海外殖民地與歐洲大陸，亦即，法國締造地緣戰略的過程，除考量政治疆界(political boundary)更迭所造成的直接影響外，更考量法國周遭權力核心變遷、對外汲取

²⁸ Colin S. Gray, "Geography and Grand Strategy,"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0(1991), p. 312.

²⁹ Jakub J. Grygiel, *Great Powers and Geopolitical Change*(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21-22.

³⁰ Saul Bernard Cohen, *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a World Divide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1975), 64-65.

³¹ Jakub J. Grygiel, op. cit., pp. 25-26.

資源的交通要道管控等地緣政治因素。本文的地緣政治途徑乃依循以下推演過程：第一，法國所處地理位置構成地緣戰略原型(proto-type)，即海權與陸權的雙元擴張路徑，並據此實踐國家地緣戰略目標；第二，法國實踐地緣戰略目標的過程，所遭受的反作用力，其他權力核心的崛起以及結盟所形成的反法勢力，如何影響並使法國修正地緣戰略；第三，再檢視法國修正地緣戰略所凸顯的地緣政治意義，是否存在變與不變的特殊意涵；最後，透過歷史事實檢驗法國地緣戰略的演變，釐清哪些是關鍵的影響因素。

因此，本文的地緣政治途徑與文獻回顧所提研究不同點在於：首先，以法國為主體的地緣政治研究，不是從他國地緣戰略角度，並視法國為客體的研究；其次，以地理空間、國家中心、國際和國家層次等因素，考察法國地緣政治演變歷史，本文不屬於泛區域或泛歐亞地緣政治研究，也不打算法國學者般，含括過多解釋變數；第三，本文不是傳統陸權與海權二分、軍事科技與戰爭關聯，或者是簡單地理決定論，而是更廣泛地探討空間與政治的關係，國際權力變遷與地緣政治間的有機結合如何影響國家對外政策。

實際上，學界對於何謂地緣政治理論尚無一致性看法，地緣政治學多被歸為國關現實主義的次學門。根據張錫模教授的解釋，地緣政治學理論可說是關於國際關係的巨型理論，企圖將國際政治權力與地理環境聯繫起來加以考察，並且將特定地理模式帶入政治史之中。³²廣義而言，地緣政治的研究重點放在考察地理此一因素於物理、歷史、經濟、戰略、社會與文化等所有層面上，以及全球、區域、國家等所有層次上，對政治性決策的影響。³³影響地緣政治的關鍵變數，可區分為靜態與動態因素：靜態因素包括國家地理位置、國土形狀、幅員和氣候等；動態因素則包括科技變遷、對資源的需求、政治意識形態的變遷以及人口動態等。³⁴然而，想要將眾多地緣政治因素皆納入考察相當困難，除靜態地理環境

³² 張錫模，地緣政治學教學講義（高雄：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2007年），頁10。

³³ 同上，頁24。

³⁴ 同上，頁57-59。

不變外，動態因素在不同歷史時期和地理區域，都可能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想要評估或理解動態因素間的辯證關係，更是困難重重。

此外，每個國家的地緣政治運作背後皆蘊藏一組地緣政治密碼，指導國家對外政策。各個歷史時期會因國際或是國內因素的變動，進而改變地緣政治密碼的原因在於，國家外部國際環境變化，將會影響外部威脅的界定；國內物質權力成長幅度、領導者及官僚體制的更迭，亦會影響國家利益的內容。簡言之，本文目的之一，為理解界定國家利益以及外部威脅的過程，亦即理解法國地緣政治密碼的演變。地緣政治密碼(geopolitical codes)，乃是一組具有長期存續性的操作型密碼(a set of operational codes)，其蘊涵著一組特定國家之外交與國防政策的地理、政治之假設。地緣政治密碼主要內容包括：(一) 國家利益的界定；(二) 標定對國家利益的外部威脅；(三) 一組針對這些外部威脅的計畫性回應方案，以及關於這些回應方案的「正當化」論述。³⁵接著，國家根據地緣政治密碼，擬定雙邊、區域、全球等不同層次的對外政策。這裡所提的正當化論述，即針對國家利益與外部威脅折衝後的所作結果，國家應當如何行為、為何這麼進行對外政策等正當理由，可以從政治領導者和政府文件得知。本文擬在小結內容，從長期地緣政治演變過程，總結各歷史分期的法國地緣政治密碼。

總體而言，本文地緣政治途徑遵循前述四個邏輯推演過程，以靜態因素為基礎，國家間的相對權力關係、軍事結盟以及戰爭後的國家勢力變更為動態因素，從中理解法國地緣戰略與地緣政治演變歷史。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採取歷史研究方法，透過史料、文獻蒐集與分析，並以歷史分期的方式，探討 1649 年至 2009 年，這段三百多年的法國地緣政治演變。本文將歷史

³⁵ 同上，頁 55。

作為研究方法，是需要克服以下幾點問題：

首先，歷史研究將面臨如何使用歷史資料，以及如何篩選歷史資料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又衍生出，歷史事件如果是多重原因的話，如何能夠納入所有因素，解釋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英國史學家卡爾(E. H. Carr)對歷史的觀點，有助於解決這些問題。卡爾認為，歷史的開始是由史學家將事實加以選擇，整理後使之成為歷史事實，亦即，只要能夠確定事實和主題的關係和意義，任何事實皆可能升級為歷史事實。³⁶換言之，卡爾承認任何歷史事實都是由史學家主觀認定後所呈現。本文所使用的文獻當中，特別是二十世紀前的歷史資料，多數源自史學家的研究，因此篩選這些歷史文獻資料時，即以是否跟本文主題相關為基準，過程中並不會涉及主觀或者是客觀認定的問題。此外，卡爾雖承認歷史事件背後可能包括多重原因，然而認為對歷史事件提供過多的解釋因素，反而會扼殺史學家的推理能力，史學家應以獨特觀點處理歷史證據，避免列舉一連串原因，鬆散地解釋歷史事件。³⁷因此，本文從地緣政治角度，進行史料的篩選與推演，希冀提供另一種不同的歷史地緣政治史觀。

其次，本文的歷史研究與史學家並不相同，後者的研究包括歐洲史、西洋史、以及全球史等通史，另一類則是研究國家之間的關係，包括國際關係史或是外交史等著作。通史的作品除傳統政治史，亦納入文明、科技、經濟以及社會發展史，內容較為全面且龐雜，本文從通史取材重於政治史資料，例如，國家間的外交、軍事同盟、戰爭、以及和平安排等。本文的歷史研究較偏向國關史以及外交史，此類作品對歷史事件的處理，圍繞在國家間外交關係發展，並亦篩選適當史料，推敲各外交事件的因果關聯性。然而，此類作品在歷史事件的因果分析上，常常混淆國家與個人層次的分析，強調政治領導者對某個政策、某國領導人，或者是意識型態的偏好等等，因此呈現出國家外交立場快速變化，或者是強調歷史事件背後的短期原因。本文排除個人偏好，單純以國家為中心，進行意識型態、國家

³⁶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3), pp. 134-135.

³⁷ *Ibid.*, pp. 115-118.

對外行為以及地緣政治三者間的歷史考察。

最後，也是最受爭議的問題，即史學家與國關學者詮釋國際關係史的差異。史學家將因果論證鑲嵌(embed)在論述當中，不同歷史脈絡的論證亦不同；國關學者通常將歷史視為理論的試驗工具，採取個案研究法，試圖尋找出一套普遍性法則，證明理論適用於各歷史階段。也因如此，主流國關學者所描述的歷史，常被批評是反覆的(repetitive)、永恆的(timeless)以及循環的(cyclical)，並不是真正詮釋歷史，而是使用歷史。³⁸本文在使用歷史資料以及詮釋歷史過程中，即是在進行「將地緣政治鑲嵌在歷史詮釋」的研究，特色在於：(一)本文與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歷史方法不同，他在 *Politics among Nations* 書中內容採用許多歷史事實，目的在佐證其提出的現實主義六大原則。本文並未設限任何給定的地緣政治原則或因素，而是圍繞法國，以及影響法國的外在地緣政治變動，進行歷史詮釋；(二)本文與季辛吉的歷史方法也不同，其著書 *Diplomacy* 可算是地緣政治的歷史著作。季辛吉並非純然從國家詮釋歷史，而是以國家、人(關鍵政治領導者)和權力關係，詮釋長時期外交歷史。本文排除個人是關鍵變數這樣的假設，避免偏離研究主軸以及混淆分析層次。

本文歷史研究法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將地緣政治置於歷史的詮釋，但同時又要避免歷史受限地緣政治框架。對此，本文採取歷時性(chronological)寫作策略，將法國長期歷史區分成 1648 年至 1815 年、1815 年至 1945 年以及 1945 至 2009 年等三個歷史分期，而以地緣政治因素貫穿全文主軸，從中尋找各歷史事件的邏輯關聯。亦即，本文以地理為基礎條件，研究法國在不同歷史分期、迥異的大國關係脈絡下，如何採取對外政策，而不因為法國地理位置，假定其必然追求制霸海權與陸權，或者是受限於海權與陸權等論斷，而陷入地理決定論。

³⁸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The Role of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7, No.2(2008), pp. 357-359.

第四節 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

一、研究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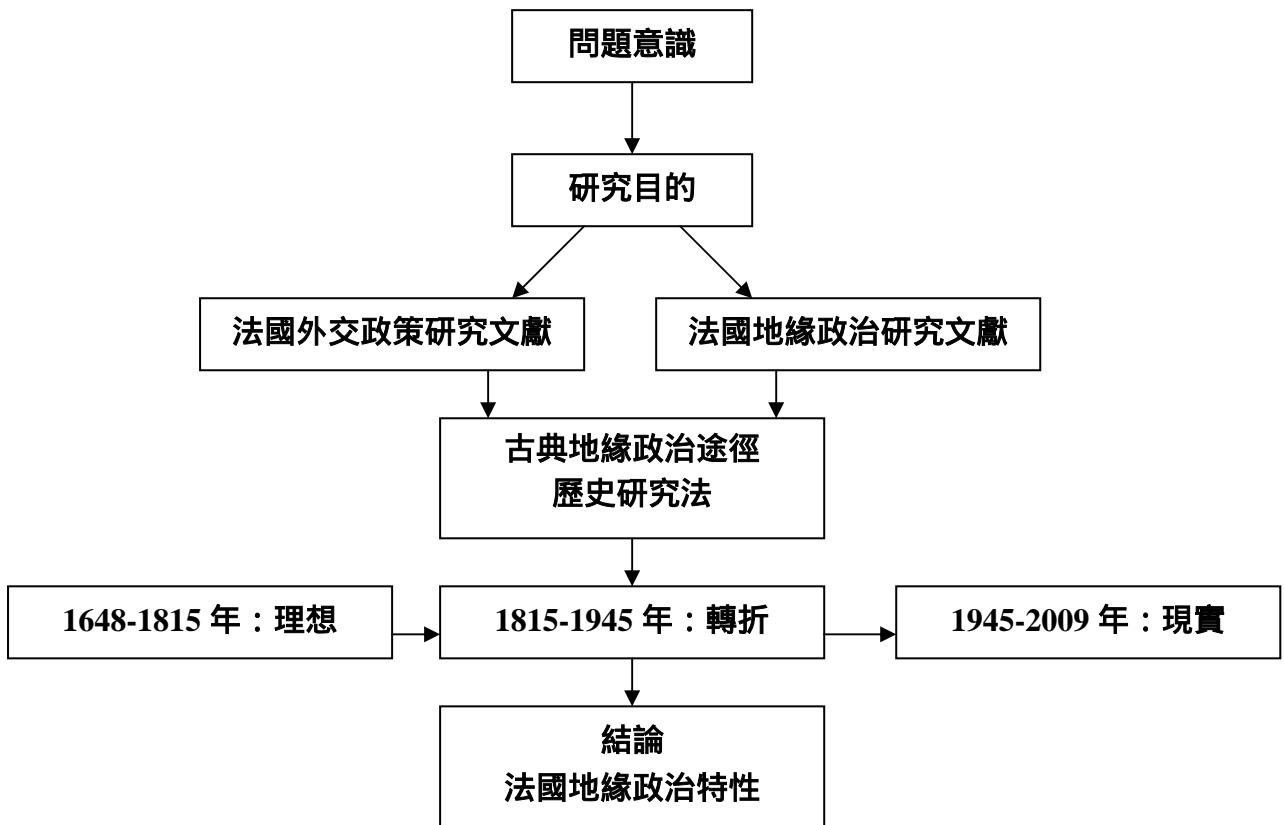


圖 1-1 研究流程

二、章節安排

本文除第一章序論外，各章節安排如下：

第二章、法國崛起—全球大爭霸(1648-1815)：從西歐國家體系開始談起，法國陸地受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勢力包圍，突圍成為此時期法國地緣戰略特色。從路易十四至拿破崙時期，法國試圖制霸海權和陸權，同時對抗英國與奧地利哈布

斯堡王朝，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七年戰爭以及拿破崙戰敗，英國取得海權優勢，法國霸權受到反法聯盟圍堵。本章各節區分依據路易十四、法英衝突以及拿破崙等三個時期，從歷史發展過程理解法國海權以及陸權的困境。

第三章、法國地緣政治轉變—從理想到現實(1815-1945)：歐洲在奧國主導下繼續圍堵法國，拿破崙三世則延續擴張政策，不過受挫於普魯士。德國統一並建立以圍堵法國為目的的俾斯麥體系，衝擊法國地緣政治。法國開始尋求英國和俄國的合作，對德國進行圍堵。本章各節主要以德意志統一作為區隔，德國統一前，法國仍持續海陸擴張政策；德國統一後，法國與德國間的地緣政治衝突則延續至今。

第四章、大戰後的法國地緣政治—困境與突破(1945-2009)：冷戰兩極體系下法國除德國問題外，仍需要考量美蘇兩強勢力劃分歐洲的事實，戴高樂時期法國政策凸顯其地緣政治困境。冷戰結束美國單一霸權的現實，使法國與北約和歐盟互動更頻繁。本章各節安排以冷戰與後冷戰兩個歷史分期，從法國與北約和歐洲整合進程，理解法國對德國以及美國的地緣戰略。最後，在古典地緣政治的基礎下，理解後冷戰時期法國地緣政治特色與未來趨勢。

第五章、結論：總結前三章法國地緣政治歷史，得出法國地緣政治的特性，回應本文序論中所提出的研究目的。本章另兩節嘗試回答全球化現象下，古典地緣政治學是否仍適用，以及提出本文將來的相關研究議題。

第二章 法國崛起—全球大爭霸(1648-1815)

法國領土面海以及陸地的地理位置，戰略上既優勢也是劣勢。1648 年西歐國家體系建立，直至 1815 年維也納體系建立，這段時期可說是法國最接近陸權與海權的雙重霸權理想，一方面試圖突破陸地受包圍的態勢，另一方面則要在海外挑戰英國，建立法國全球性霸業。本章即描述從路易十四到拿破崙執政時期，法國試圖擴張其地緣政治影響力的過程，可將其歷史分期為：1648-1715 年、1715-1763 年、1763-1815 年。第一分期為路易十四執政時期，其特色為西歐國家體系的建立(1648)，主權國家成為國際事務的主要行為者，法國在路易十四及其大臣治理下，無論在軍事或是經濟上均獲得成果，並於陸權以及海權上分別挑戰西班牙與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英國等。然而，法國的霸權嘗試最終導致反法聯盟的形成，尋求天然疆域並且試圖打破受包圍的局面終告失敗，這亦是西歐國家體系當中權力平衡的運作過程。第二分期為後路易十四時代，法國再次在海權與陸權上挑戰英國與哈布斯堡王朝，但較前一時期不同的是，法國與英國的競爭遍及海外殖民地，尤其是北美大陸以及印度殖民地，其中爆發的七年戰爭(1756-1763)英法兩國均投入大量資源作戰，最後以英國勝利終結，奠定海權乃至全球性霸權的基礎。第三分期從七年戰爭至拿破崙戰敗為止，法國想要報復的心態使其支持並參與北美獨立戰爭，但耗費人力、物力後卻使國內產生財政危機，間接導致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的崛起。拿破崙時期的法國勢力遍及歐洲大陸，與英國的對抗儼然成為陸權跟海權對立，然終究在反法聯盟阻擾，以及無法成功制衡英國海權情況下失敗。

第一節 法國與哈布斯堡王朝的歐洲大陸衝突

(1648-1715)

三十年宗教戰爭為歐洲帶來巨幅的人員、財產損失，戰爭結束時法國路易十四雖已即位，不過國政部分乃由紅衣主教李希留(le cardinal duc de Richelieu)和繼任者馬薩林(Jules Cardinal Mazari)攝政，以輔佐路易十四。路易十四為法國在位最久的君王，其外交政策除受兩位紅衣主教影響，對外尋求擴張政策外，此時期亦凸顯當時甫建立的歐洲國家體系的運作，即各國擁有獨立自主的外交權，國家間因利益差異而結合不同的聯盟。路易十四的政策乃依循地緣政治與國家間權力政治運作等兩個邏輯，這段時期法國試圖主導歐洲國家體系的意圖明顯，相對地，其他歐洲國家也群起結成反法聯盟，試圖建立國家間的權力平衡。

一、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亞國家體系建立

(一) 國際國家體系的構成基本單位—主權國家

1618 年至 1648 年期間，歐洲大陸爆發一系列的軍事衝突，戰爭緣起於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鎮壓波西米亞(Bohemia)境內的新教徒而引發，史學家稱此為三十年宗教戰爭。1648 年，各國簽訂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結束這段冗長又耗費鉅資的軍事衝突，條約內容導致直接的影響包括：首先，歐洲統一帝國（神聖羅馬帝國）與統一教會（天主教教會）的局勢正式終結，確立世俗君主和宗教並立的態勢；其次，神聖羅馬帝國控制權力削弱，德意志諸國更容易受法國影響，延緩德意志統一時程；第三，西班牙的權力受戰爭影響，逐漸衰弱，法國開始崛起。除此之外，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在國際關係史具指標性意義，其確立「干涉主權國

家之內政乃違反國際法之行為」的準則，藉以防止列強因為宗教問題而介入他國內政，進而引爆戰爭，創造西歐國家體系的新國際秩序。¹

四百年前，法國思想家博丹(Jean Bodin)在著作《主權論》(On Sovereignty)中，首次系統地闡述主權的概念，²並且體現在威斯特伐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 1648)的內容，國際關係學者將此締造的新秩序稱之為西歐國家體系。這些主權概念更與崛起的國家(state)概念相結合，構成近代特有的領土國家政治單位，取代中世紀基督教的普遍共同體。西歐國家體系依循國家主權概念、國際法原則和權力平衡政策來進行，由各個大小不一的國家所構織的複雜關係當中，基本單位是主權國家，國際法形式上規範主權國家間互動原理，實質上則以權力平衡政策作為體系成員彼此互動的最核心考慮及外交活動的中心。³從神聖羅馬帝國實質性統治變更來看，條約內容賦予神聖羅馬帝國三百多個邦獨立自主地位，且其享有宣戰以及媾和的權力，皇帝未經過帝國議會同意，不得立法、宣戰、締盟、徵稅等。此種規範德意志帝國的新憲法載於條約，受到國際法的保障，而法國及瑞典又為條約的保證者。⁴換言之，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後西歐國家體系互動更為複雜，西班牙以及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對抗法國和新教國家等軍事抗爭，不再以堅定的宗教信仰為議題核心，盟友間的關係亦變化多端、忽敵忽友，呈現出現實的歐洲國家間權力政治之面貌。

主權國家成為新國際秩序的基本成員，其特徵涵蓋領土性與排他性，亦即，國家在領土之內享有壟斷的行政權力，他國無權干預，國際層面上則是各個主權國家地位相等。此外，國家的政治邊界(political boundary)形成受到歐洲軍事革命和商業革命影響。從十五世紀起，歐洲發展的軍事革命、火器的進步，尤其是大

¹ 張錫模，聖戰與文明：伊斯蘭與世界政治首部曲（台北：玉山社，2003年），頁171。

² 博丹推崇的主權概念與當時絕對主義(absolutism)王權契合，強調君權神授的正當性，其闡述的主權基本權力包括：任命官吏，賦予他們職責；制訂和廢止法律；宣戰和終止戰爭的權力；保有對所有官吏的裁斷不服，提出上訴後的最後聽審權；法律沒有變通和寬恕的情況下，決定他人生死的權力。請參閱 Jean Bodin, Julian H. Franklin (Tran.), *On Sovereignt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xvi。

³ 張錫模，聖戰與文明：伊斯蘭與世界政治首部曲，頁171-172。

⁴ 王曾才編著，西洋近世史（台北：正中書局，1998），頁119。

砲的發明，使城垛喪失防衛功能、商業都市的守城戰略喪失意義，因而在防衛思想上必須講求京畿之外的前方防衛。⁵政治邊界的確立同時亦代表國家政治權力範圍的臨界點，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邊界經常形成一帶狀地區，受到戰爭以及領土主權轉移而構成的邊疆地帶(frontier)，往往因其天然險阻和軍事戰略要衝的價值，而成為各國戰爭爭奪以及戰後和談時的籌碼。

無可避免地，西歐國家體系內部必然存在著渴望秩序和獨立等兩者間緊張關係。國家希望能夠維持體系秩序，以促進和平與經濟繁榮，不過相對地，國家卻要犧牲部分自由做為代價，用限制共同體行動自由的方式來維持秩序。同時，國家追求自主性及獨立的行為，企圖掙脫外在國際的束縛，也會造成經濟與軍事的不安全。⁶這組矛盾命題根源於西歐國家體系並未存在「國際中央政府」的現實，即結構現實主義學者所謂的國際無政府狀態(anarchy)，各國間不平等權力關係並未因國家主權平等原則而改變，大國、小國之間的外交合縱連橫為國家理性(raison d'état)的部分表現，亦是體系理性(raison de système)的表現，因為結盟行為有益於所有成員。⁷簡言之，透過權力評估與威脅認知來選擇聯盟對象，從而達到歐洲大陸的權力平衡狀態，這樣的運作模式成為威斯特伐利亞西歐國家體系的特色。

(二) 國際新秩序下的法國地緣政治

三十年戰爭初期，法國並不想直接介入紛爭，而是密切監控雙方陣營衝突發展，一方面不希望哈布斯堡王朝取得勝利，另一方面亦留心瑞典取而代之。就現實權力政治而言，法國的歐洲政策乃是遵循權力平衡原則，在瑞典軍事失利之際，為避免哈布斯堡王朝大獲全勝，法國決心參與戰爭，並且主導反哈布斯堡聯

⁵ 張錫模，*聖戰與文明：伊斯蘭與世界政治首部曲*，頁 178。

⁶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992), p.14.

⁷ *Ibid.*, p.14.

盟。實際上這亦符合國家理性，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法國的政策深受地理因素影響，從亨利四世、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四執政時期，法國外交政策關注核心一直是哈布斯堡王朝，縱然哈布斯堡王朝在 1555 年二分為西班牙和奧地利兩大家族，但仍絲毫不減對法國的安全威脅（如圖 2-1）。



圖 2-1 1648 年的歐洲

資料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Europe_map_1648.PNG

法國不安全的心理並不難理解，特別在受到哈布斯堡王朝包圍情況下，反抗或者從屬於哈布斯堡王朝是法國的唯一選擇。根據李希留的分析，法國當時受到哈布斯堡王朝以及附屬國形成的兩道弧線包圍：內圈部分由西班牙、法國康堤 (Franche Comté) 和西屬尼德蘭組成，這些區域直接和法國邊疆接壤；外圈部分則由哈布斯堡家族成員、親戚所統治的邦城，如那不勒斯 (Naples)、米蘭、奧地利、斯提里亞 (Styria)、提洛爾 (Tyrol)、波西米亞 (Bohemia) 以及塔斯坎尼 (Tuscany) 和熱內亞 (Genoa) 等諸侯國。哈布斯堡王朝及其附屬國對法國享有戰略優勢，能由

多處地點進擊法國，使後者的生存安全備受威脅。

此種情況下，從亨利四世(Henri IV)開始，其大臣蘇利(Duc de Sully)就曾提出歐洲政治整合的大設計(grand design)，希望藉由聯合其他歐洲國家，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勢力擴張。路易十三及李希留繼承此種觀點，擬定法國外交政策的三大目標：首先，對於哈布斯堡王朝的威脅，採取直接的因應之道；其次，在歐洲範圍內盡量找尋盟友，並且透過各種外交管道，必要時不惜動用武力，來擴張法國的影響力；最後則是突破哈布斯堡包圍勢力的戰略，即嘗試去建立地區性的橋頭堡，特別是阿爾薩斯、洛林、法國康提、阿圖瓦(Artois)和法蘭德斯(flanders)等據點，讓法國未來有機會將勢力深入神聖羅馬帝國境內。⁸總體而言，當三十年戰爭結束後，法國在和約土地劃分內容上，獲得其東部的亞爾薩斯(不包括史特拉斯堡)，加上梅茲(Metz)、圖爾(Toul)和凡爾登(Verdun)三個主教城市，法國逐漸取得突破哈布斯堡王朝包圍的關鍵據點，遂行其外交政策目標。

整體而言，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建立的國際體系並未大幅改變法國在地緣上受包圍的狀況，就防禦地位而言，相較於西班牙以及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廣泛與零碎領土特性，法國領土賦予其強大的防禦能力，能夠藉由天然險阻來抵禦外來軍事侵略。然而，法國地理位置亦成為向外擴張的障礙，除天然地理環境的因素以外，法國向外擴張容易與其他大國發生利益衝突。例如，法國若要進取哈布斯堡王朝所控制的荷蘭南部(尼德蘭)，就必須奮力通過星羅棋布的要塞與縱橫交錯的河流，這過程將不僅招致哈布斯堡勢力的反擊，而且將激起英國和荷蘭的強烈反應。法國入侵德意志區域也是困難重重，雖然要突破邊界防線並不難，但補給線卻拉的很長，而且還不可避免地要面對奧地利、荷蘭、英國和普魯士因此而結成的同盟。⁹

不過，法國從宗教戰爭的結果看到突圍的契機，東面神聖羅馬帝國瓦解以及西面西班牙勢力逐漸衰弱，再加上法國國內情勢的相對穩定，種種有利因素使得

⁸ Stephen J. Lee, 王瓊淑譯，*三十年戰爭* (台北：城邦文化出版，1999年)，頁57。

⁹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p. 89.

法王路易十四實質掌權後(1661)，便對外採取一連串軍事擴張行動。而且，法國領土雖鄰近地中海與大西洋，然其歷史和文化發展，卻明顯偏重於陸權，這種特性受到歐洲大陸地緣政治的影響，同時亦限制爾後跟英國的海權競逐。

二、路易十四與歐洲國家體系的發展

(一) 海權與陸權發展的政治經濟邏輯

路易十四於 1643 年就任王位，直至 1661 年紅衣主教馬薩林逝世後，才開始掌握實權。這段時期，歐洲國家體系的權力重心逐步向東轉移，英國與荷蘭取代葡萄牙與西班牙，成為商業貿易國與海上強權；歐陸上則是普魯士漸漸嶄露頭角，俄國亦開始擴張權力並且與瑞典、波蘭在北方歐洲爆發衝突。國家體系內權力平衡經常為國家外交政策依循的法則，法國自然不例外，不過如季辛吉所指，權力平衡並不是要去避免衝突以及戰爭，而是去限制衝突的範圍。權力平衡的安排並無法滿足體系內所有成員，其壓抑對於現狀安排不滿國家的作為，一旦體系的權力平衡關係遭受破壞，不滿國家將起而推翻既存秩序。¹⁰季辛吉的說法與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學者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一致，後者在其著作當中，以相當篇幅並舉歷史事證來描述達到權力平衡的方式，例如分化、軍備、補償、聯盟方式等，以及權力平衡的道德價值。¹¹簡言之，歐洲歷史證明國家體系運作上是動態模式，發動戰爭以及戰爭結束後所締結的條約，則是過渡到新秩序的歷程。法國在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中找到突破既存秩序的機會，除哈布斯堡王朝勢力消退外，其中亦蘊含著政治與經濟的雙重運作邏輯。

在政治邏輯方面，法國在路易十四時期建立一套理性的中央政府體制，核心

¹⁰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4), p.21.

¹¹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 NY: Alfred A. Knopf, Forth Edition, 1966)

人物為李希留、柯爾白與馬薩林，並且首次將王權統治力普及全國，形成王權絕對主義國家(absolutist state)。安德森(Perry Anderson)從階級的角度分析絕對主義國家，其形成乃資產階級與國家兩者間的結合，歷經內部反對與國家鎮壓過程後，法國國王的權威增加，軍隊人口也大幅成長。¹²亦即，法國政府在內部的緩境過程中集權，並且建立強大陸軍和海軍，奠定向外擴張的基礎。柯爾白除擔任法國財經總設計師之外，亦兼任海軍部長，負責規劃海軍建設。在其擘劃下，法國政府興建港口和船塢、訓練海軍，使法國成為大西洋沿岸的第三海權國，以及地中海區的第一海權國。此時法國政府實行的海員徵用法(*inscription maritime*)，規定必要時可以徵召全部的水手及漁夫服役，確保海軍發展所需要的人力資源，這點後來為他國學習。¹³此外，法國延續重視陸權的傳統，提升陸軍規模並改革軍事組織，用以支持歐陸軍事行動。

在經濟邏輯方面，法國與荷蘭的軍事衝突根源，可以追溯至重商主義政策。法國為促進國內商業和製造業的發展，以及支持海外殖民擴張，國家採取重商主義政策，補助紡織、玻璃、地毯與鐵器製造等新興產業，特別是造船業獲得高額補助，並且成立特許公司以因應東、西印度貿易等措施，最後甚至實施關稅保護。安德森認為重商主義政策的內容與結果，直接導致法國在 1672 年入侵荷蘭，用意在於消滅這一貿易競爭敵手。¹⁴亦即，從經濟戰略角度來看，法國若能佔領荷蘭，其意謂控制萊茵河出海口，那麼全數的萊茵河商業貿易航線，以及佔德意志諸邦半數的商業皆受法國掌控，用此經濟邏輯來解釋，可以得知為何法國總將西屬尼德蘭視為對外擴張的首選。¹⁵

然而，從荷蘭或者是英國的角度來看，這或許能夠部分解釋法國發動戰爭的原因，但純然經濟的解釋，忽略法國所處地緣政治位置以及想要突破包圍等作

¹² 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London: Verso Edition, 1979), p. 85-112.

¹³ David G. Chandler, "The Art of War on Land," J. S. Bromley (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VI—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15/25*(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743-747.

¹⁴ Perry Anderson, *op.cit.*, p. 103.

¹⁵ Will and Ariel Durant, 幼獅翻譯中心編譯，路易十四與法國（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三版，1970年），頁 54。

為，與其說商業利益驅使戰爭爆發，倒不如說戰爭來自法國對國際環境不安全感所導致，經濟利益歧異增加軍事衝突可能性，但只能算是間接而非直接因素，如同法國與英國的衝突，就不會是純然的經濟因素所導致。綜觀歷史發展，法國權力崛起受到經濟因素影響無庸置疑，不過擴張路徑與追求的目標受到地緣政治制約，路易十四執政時期的法國權力擴張與受限，即是受到歐洲地緣政治現實的影響。

（二）法國領土的天然疆域

法國路易十四執政時期的對外擴張政策，歷史學家經常以追尋天然疆域的傳統來解釋其行為，然而這種解釋缺乏根據，並無直接證據顯示路易十四或是李希留的外交政策受此概念影響。法文文獻當中使用疆域概念相當地晚，直至十三世紀晚期，才模糊地用於周邊戰爭區，而不是精確的邊界。疆域一詞首次出現在1315年，用於解釋法國與法蘭德斯(Flanders)的邊界，直至十七世紀末，則將概念延伸用至法國與英國之間的不安全地帶。¹⁶當時地理教科書 皇家地理(Géographie royale, 1633)的內容裡面，作者拉柏(Philippe Labbe)就毫不掩飾鼓吹復興高盧法國的古老疆域，其範圍包括，與西班牙隔著高山山脊，東邊為萊茵河、部分阿爾卑斯山、瓦爾河(Var)，南邊為地中海與庇里牛斯山；西邊為大西洋，稱為亞吉丹灣(Gulf of the Aquitaines)；北方為英吉利海峽。¹⁷

實際上，法國的擴張與天然疆域無任何對應，僅僅是反映歐洲大陸國家間的相對權力關係。天然疆域對應虛弱的法國時，常常成為最佳的防禦險阻，但在法國國家強大時，則又成為對外擴張絕佳的前哨站。十七世紀歐洲國際關係的本質，仍以君主國家間締結的條約為基礎，而不是現代國家意義上的政府間外交關

¹⁶ Xavier De Planhol, Janet Lloyd (tran.),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Fr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09.

¹⁷ Xavier De Planhol, *op.cit.*, p.113.

係。此外，各國君主之間的錯綜複雜的血緣關係以及姻親聯結，使得國家之間常常為繼承權而發動戰爭，路易十四即是藉由這些機會，利用法律觀點，目標定位在那些統治權存在爭論的地區，宣稱法國主權及於此，以遂行法國領土擴張的野心。當時，各國關心複雜的王位繼承，卻更害怕有任何一國因此快速擴張權力，而取得獨霸歐洲大陸的地位。因此，這過程產生的矛盾是，依循血緣關係而進行的國際互動，與追求權力平衡、集體安全等政策產生矛盾，十七世紀不僅決定政治、宗教分離，更在其演進過程下，血緣關係不再主導國際互動，其重要性與地位讓步於權力平衡原則。於是乎，過去難以理解，並被認為漫無章法的君王間互動關係，逐步轉向於國家間權力對抗與結盟關係。

戰爭為國家改變國際現狀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模式，戰爭結束後的條約內容立即反映國家間權力結構轉變。三十年戰爭結束不意謂歐洲大陸建立永久和平，而是開啟另一輪權力競賽，法國在此次則位居主角。前述曾提及，李希留的外交政策為突破哈布斯堡王朝的包圍狀態，堅固的防禦自然不可或缺。東部方面，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雖然承認法國對於梅茲、圖爾和凡爾登等三個主教區的最高統治權，法國從 1552 年便開始對這些城市進行實質統治，條約內容縱然承認法國的這項統治權利，然而，神聖羅馬帝國從未放棄將其重新納入勢力範圍的企圖。這三個教區南部是洛林公國(Duchy of Lorraine)，雖受法軍長期佔領，但是路易十四政權始終無法將其納入版圖，使得法國國境呈現半開放狀態。此外，洛林公國東邊的史特拉斯(Strasbourg)，是阿爾薩斯(Alsace)和通往萊茵河及多瑙河上游的重要城市，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關於法國對阿爾薩斯的主權呈現出相當曖昧不清的狀態，尤其在被稱之為十極(Décapole)的十座城市（不含史特拉斯堡），形成另一不安定邊界區，嚴重威脅法國的安全。¹⁸此外，法國還需擔憂首都巴黎遭受來自尼德蘭的入侵，以及北部英國勢力藉由敦克爾克港(Dunkirk)直搗法國境內，和西部西班牙哈布斯堡勢力在庇里牛斯山以及義大利北部的威脅。

¹⁸ J. H. Shennan, 李寧怡譯, 路易十四, (台北: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9 年), 頁 118-119。

法國發動數次戰爭和運用外交政策將天然疆域轉變成現實，以滿足安全和擴張雙重需求，包括法西戰爭(1648-1659)、九年戰爭(1688-1697)以及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02-1713)。法國藉由締結條約為合法途徑，逐步將天然疆域納入版圖：首先是 1659 年所簽訂的庇里牛斯山條約(Treaty of the Pyrenees)，西班牙割讓邊界領土給法國以結束戰爭；其次為 1678 年簽訂的奈梅根條約(Treaty of Nijmegen)，法國合併法國康堤(Franche Comté)；第三步則在 1697 年簽訂的雷斯威克條約(Treaty of Ryswick)，法國放棄李希留在萊茵河東岸所建立的碉堡，翌年於萊茵河西岸建立新布里薩西(Neuf-Brisach)城，至此實現萊茵河做為天然疆域。¹⁹此外，法國亦從英國買下敦克爾克港，並且佔據與西屬尼德蘭邊界上的土爾納(Tournai)和查利瓦(Charleroi)兩個軍事要塞，以增強巴黎的防衛能力。²⁰總體而言，路易十四執政時期雖不是刻意追求天然疆域，不過被包圍的安全威脅狀態，使其利用各種機會突圍，擴張法國的地緣政治影響力。

三、歐洲權力平衡：反法聯盟的形成

(一) 法國地緣擴張的諸條路徑

季辛吉談及歐洲國家體系所維持的權力平衡，來自於圍堵法國的構想。他認為國家理性提供個別國家行為的理性解釋模式，不過對於世界秩序的挑戰，誰將追求霸權或者形成反霸權聯盟等行為，國家理性並未提供任何解答。亦即，國家理性驅使國家追求卓越或建立權力平衡，但很少平衡狀態是經由有意識的設計達成。平衡通常來自於特定國家試圖支配的過程瓦解後來達成，圍堵法國即是為了

¹⁹ Xavier De Planhol, *op. cit.*, pp.113-114.

²⁰ 法國在 1662 年買下敦克爾克港；1668 年的愛克斯拉沙佩勒條約(Treaty of Aix-la-Chapelle)中，獲得土爾納(Tournai)和查利瓦(Charleroi)。

達到歐洲的權力平衡，而這一整個過程夾雜著風險與利益的估算。²¹基本上，十七世紀後半期，歐洲國家體系乃是在法國勢力擴張和反法聯盟形成與抗衡的過程，法國意圖支配歐洲大陸，其餘相對弱國與之抗衡並形成聯盟，類似的情形在該世紀上半期，則是法國尋求聯盟以對抗哈布斯堡王朝，支配與反支配的勢力抗衡後形成的權力平衡，則為歐洲大陸地緣政治特色。

法國地緣擴張主要是突破哈布斯堡王朝包圍的狀態，因此，在法西戰爭確立西部庇里牛斯山疆界後，法國能將注意力轉向萊茵河東部以及德意志地區，導致法國入侵西屬尼德蘭和歷時九年的戰爭。前面已提及尼德蘭對法國安全上的重要性，在此不再說明，而 1688 至 1697 年的九年戰爭，能夠說是法國捍衛自身地緣政治利益以及維持德意志地區權力平衡的戰爭。這場戰爭肇因於親法大主教亨利 (Maxmilian Henry) 健康惡化所面臨的繼承人問題，其管轄區分佈在萊茵河西岸，沿著河流除科隆(Cologne)外，領地尚包括三個重要的城市：波恩(Bonn)、萊因貝格(Rheinberg)和凱澤斯韋斯(Kaiserswerth)。而且，亨利大主教還是列日(Liège)的君主兼主教。列日主教區地跨默茲河(Meuse)兩岸，本身是戰略要道，並且還擁有工業區、煤田和煉鐵廠，荷蘭軍隊的大部分軍火即從此地而來。²²然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拒絕承認亨利內定的親法繼承人選--菲爾斯滕貝格(Cardinal Fürstenberg)，教皇亦不給予特許，於是法國在捍衛自身利益考量下，向亨利大主教領地出兵，遭致德意志諸邦國、神聖羅馬帝國，以及後來加入的英國與荷蘭抵抗，最後以簽訂雷斯威克條約告終。

九年戰爭結束後不過四年，歐洲大陸因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而再次陷入戰爭當中，這複雜的問題肇因於西班牙國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並無子嗣，轄下統治領土涵蓋菲律賓群島、義大利、西西里以及南、北美洲的廣大土地財產。宣稱擁有繼承權者包括路易十四，為西班牙菲利普三世(Philip III)長女的兒子，其妻亦

²¹ Henry Kissinger, *op. cit.*, pp. 66-67.

²² George Clark, "The Nine Years War, 1688-1697," in J. S. Bromley (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VI—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15/25*(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24-225.

為菲利普四世的長女；另一可能的繼承者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李奧波德(Leopold)，為菲利普三世幼女的兒子，娶菲利普四世(Philip IV)的幼女為妻。²³然而，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攸關歐洲大陸權力平衡的維持，兩位競爭者無論誰全部繼承，將嚴重影響既有的平衡狀態。法國繼承意謂波旁王朝擴增勢力；奧地利繼承的話，則再度將哈布斯堡二合為一，造成獨霸地位。因此，除局內人（即兩位競爭者）對此議題相當關注外，其他國家也害怕既定秩序遭受破壞，可能會傷害自身的國家利益。

針對西班牙王位繼承的爭議，法國分別於 1668 年、1698 年提出瓜分西班牙協議，但仍無法避免爆發繼承戰爭，主要是因為協議內容無法滿足所有國家。第一次瓜分協議由法國與英國達成，奧地利反對而破局，領土瓜分協議如下：西班牙、印度群島、薩丁尼亞(Sardinia)和西屬尼德蘭委託給李奧波德孫子暨巴伐利亞選侯斐迪南(Joseph Ferdinand)；法國的王子取得塔斯卡尼(Tuscan)港市和二西西里（義大利南部的教宗屬地）；而李奧波德之子卡爾(Karl)，將得到米蘭公國。第二次瓜分協議由法國與英國以及荷蘭達成，西班牙與奧地利反對，協議內容為：法國王子取得塔斯卡尼港市、二西西里和洛林公國，而以米蘭補償洛林公爵；西班牙帝國剩下的所有部分，包括美洲殖民地和西屬尼德蘭在內，則歸於卡爾大公。²⁴查理二世為避免死後西班牙王國的分裂，決定草擬遺囑，立巴伐利亞選侯斐迪南(Joseph Ferdinand)為繼承人，然為時已晚，仍無法避免王位繼承戰爭。

法國願意以瓜分西班牙的方式解決紛爭，並非事先考量歐洲權力平衡，而是理解法國的困境，無法同時和主要歐洲國家作戰。從協議內容可以得知，法國期望能先行突破東方包圍態勢，取得前進德意志諸邦和神聖羅馬帝國的戰略要地，至於英國與荷蘭關注的西屬尼德蘭，法國選擇讓步以換取妥協，避免其介入繼承紛爭。不過，法國的如意算盤並未實現，除哈布斯堡勢力阻礙之外，英國、荷蘭

²³ Will and Ariel Durant, 幼獅翻譯中心編譯，路易十四與法國（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0年，三版），頁 276。

²⁴ Will and Ariel Durant, 路易十四與法國，頁 277。

亦有不同利益考量，導致戰爭的爆發。

（二）反法聯盟的形成

從九年戰爭到西班牙王位繼承戰，法國面臨相同的雙面作戰情勢，即在陸權地上受制於哈布斯堡勢力，海權上則與英國競爭對抗。實際上，國土地理位置遭受敵對勢力包圍，以及同時在陸地與海上作戰等情況，並非法國獨具特質。就如同保羅甘乃迪所言，法國長期以來欠缺明確的戰略目標，四處擴張與開闢戰場的結果，即是一方面與英國與荷蘭等海權國家在海上作戰，不但消耗有限的資源，並且分散法國能夠投入歐陸戰場的資源，加深法國獲勝的困難度。²⁵不過，這樣的論斷過於絕對，畢竟法國意圖從幾次戰爭以獲取安全的目標並未變更，當時路易十四時期增建海軍與陸軍實力，相對於其他歐洲國家，法國的確有能力主導歐洲體系。而且，法國並非一味對抗英國，甚至在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上，法國首選英國為合作夥伴，遂行實現突破哈布斯堡王朝包圍。

然而，法國企圖稱霸歐陸的野心，仍遭致其他歐洲國家聯合圍堵，兩次戰爭可說是歐洲各國（英國、奧地利及普魯士）反對法國擴張的戰爭。海權國家方面，英國與荷蘭雖主要關注西屬尼德蘭，尤其是商業利益考量，然卻也害怕法國權力擴張過速，危害自身利益。假如法國因為王位繼承而與西班牙合併，不僅改變原有歐洲大陸平衡態勢，對於海權國家來說，也會產生壓力，因為法國將擁有更豐富的資源，以及更容易集中心力發展海權。而且，兩者合併意謂波旁王朝控制伊比利半島，亦即控制地中海，這非英國所樂於見到的。因此，對英國而言，除運用海軍實力直接削弱法國海權以外，還採取兩種方式消耗法國的軍事力量，一種是以外圍的突襲或派遣遠征軍支援盟國等方法進行直接的軍事行動，另一種為財

²⁵ Paul Kennedy, *op. cit.*, pp.90-91.

政援助，具體作為是出錢雇用外籍兵與法國作戰或直接資助盟國。²⁶所以說，法國的處境是受到海權國與陸權國聯合抵抗，一點也不為過。

路易十四執政時期從不掩飾發展海權的野心，實際發展也相當有成果，²⁷不過卻無法在九年戰爭與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發揮功用，主要是法國財政無法同時支持海上、陸地兩個戰場。1695 年開始，法國即大幅削減海軍經費，海軍戰略轉為破壞敵國貿易為目標，而非直接軍事對抗為原則，如此能將戰爭重心置於歐陸戰場。²⁸類似情形同樣出現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由於海權與陸權性質迥異，無法用於攻城掠地與進行統治，法國即放棄建立強大海軍的企圖，專心致力於陸權發展。然而，法國仍無法逆轉陸地戰場受包圍的態勢，法國迫害境內胡格諾教派教徒以及鄂圖曼土耳其勢力從維也納撤退後，使得德意志新教諸邦國與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更緊密結合反法，特別是土耳其因素致使奧地利全力對付法國的情況下，法國想要取得勝利更加困難。

位於法國波旁王朝與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之間的義大利諸邦國，不但為兩大歐洲強權間的緩衝國，同時其立場也可能左右兩者間的對抗結果。法國一直希望能中立化義大利諸邦國，避免其與奧地利哈布斯堡以及德意志諸邦結合。實際上，當時中立的概念仍相當模糊，一個中立國雖然可避免直接軍事行動，但其可依過去訂立的條約派軍隊前往交戰國，而無損及中立地位。此外，中立國可以允許交戰國軍隊「無害通過」其領土去攻擊敵國，中立這個概念有時用於一個地理範疇而非指國家，各個交戰國皆同意不在此區域內作戰。²⁹然而，法國的策略受到土耳其勢力消退的影響，神聖羅馬帝國無須因此而與法國妥協，原以中立自保的義大利諸邦得以選擇陣營，導致法國身陷包圍之中。³⁰

²⁶ Paul Kennedy, *op. cit.*, p. 98.

²⁷ 柯爾白建設法國海軍的成果斐然，從 1661 到 1683 年之 22 年間，法國海軍艦艇數量增加六倍，從 30 艘增加為 176 艘，法國直迄 1763 年能在工業生產和商業貿易方面居於領先的地位，多是其政策所奠基。

²⁸ George Clark, "The Nine Years War, 1688-1697," p.244.

²⁹ Andrew Lossk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ope," in J. S. Bromley (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VI—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15/25*, pp.174-175.

³⁰ 法國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只有四個盟國：德意志的科隆(Cologne)、巴伐利亞(Bavaria)，葡萄牙以及薩伏依(Savoy)，後兩國均在 1703 年背棄與法國的同盟關係。

反法聯盟成員包括海權以及陸權國家，其對抗法國的邏輯再次驗證季辛吉的說法：強者尋求支配，弱者抗拒並形成聯盟來增加自身強度。假如聯盟權力強大到足以制衡侵略者，則均衡將形成，但若不能的話，某個國家可能形成霸權。³¹ 總體而言，歐洲權力平衡不是強國事前規劃，而是當某一國家改變現狀，試圖支配歐洲大陸時，其餘相對弱勢國家不得不選擇因應方式，結盟即是其中一種，地理位置鄰近或易受攻擊的特性，亦成為是否選擇結盟的前提。

第二節 法國與英國的全球爭霸(1715-1763)

一、 路易十四時代的結束與新一輪歐陸爭霸

(一) 後路易十四時代的歐洲新秩序：烏特勒支條約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進行到最後幾年，各國國內財政均面臨窘境，無法支撐長期戰爭的花費，於是開始進行停戰談判。各國參戰初衷並不相同，對戰後秩序的看法亦不相同，戰爭最後以簽訂烏特勒支條約(Treaty of Utrecht)結束。交戰各國從 1712 年起，便在烏特勒支進行停戰談判，並於翌年四月分別簽約，這些條約總稱為烏特勒支條約，並與 1714 年法國與奧地利所簽訂的拉斯塔特和巴登(Treaties of Rastatt and Baden)作為補充，建立十八世紀歐洲新秩序。條約的主要內容如下：³²

1. 路易十四孫子菲利普五世繼承西班牙王位，不過卻得放棄法國王位繼承權利，即法國與西班牙不得合併。
2. 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放棄西班牙王位繼承權，並獲得以下領土補償：西屬尼

³¹ Henry Kissinger, *op. cit.*, pp. 66-67.

³² 王曾才編著，前引書，頁 185-186；Pierre Goubert, Maarten Ultee(tran.), *The Course of French History*(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148.

德蘭、米蘭、那不勒斯以及薩丁尼亞。

3. 英國保有從西班牙獲取的地中海之米諾卡島(Minorca)以及直布羅陀。北美殖民方面，法國割讓紐芬蘭(Newfoundland)、諾瓦斯古夏(Nova Scotia)以及哈德遜灣(Hudson Bay)等給英國地區，但仍保留魁北克以及路易西安那。
4. 法國放棄敦克爾克堡壘，割讓數平方哩的北方領土。荷蘭得以駐兵尼德蘭南邊靠近法國邊境地帶，從法奈(Furnes)至納穆爾(Namur)，防止法國進犯，並且取得須耳德河的貿易專利權。此外，法國將萊茵河東岸征服的土地歸還給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法國南部與薩伏依的邊界重新調整，薩伏依成為阻礙法國軍隊行進的阻礙。
5. 普魯士升格為王國。

條約內容代表各國妥協的結果，亦展現出各國關注點的歧異。對荷蘭而言，關注如何建立一套防衛體系，以對付法國的擴張行動；對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而言，則是關注萊茵河地區的領土爭議以及在義大利的利益，希望能夠重新恢復遭法國奪取的領土與利益；而較小的同盟國則是關心戰勝後戰利品的分配，以及提升自身國際地位。然而，對英國而言，則試圖建立一歐洲和平方案，以解決四項彼此關聯且重要的問題：(一)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二)法國周遭國家的安全；(三)建立各主要歐洲國家間協議，承認各國的領土與王位繼承權利，英國與法國位居核心地位；(四)義大利的中立化。³³英國主導談判過程，並且從烏特勒支條約獲益最多，確立其在北美洲、西印度群島以及地中海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同時亦鞏固英國的海權霸主地位。

最後，對法國而言，路易十四執政時期力行的擴張政策，最終結果仍回歸原點。法國未能實現霸權的夢想，也未能保留因擴張而取得的天然疆域，其作為歐洲平衡者(balancer)的角色，在這幾次戰爭當中，明顯移轉至英國。西班牙王位繼

³³ Kaleve J. Holsti, *Peace and War—Armed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1648-1989*(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73-75.

承戰爭整個過程可看出，英國對歐洲的外交政策遵循權力平衡法則，當法國權力擴張時，英國選擇與荷蘭、奧地利哈布斯堡以及德意志諸邦國等合作來遏阻法國，避免出現區域性霸權；相對地，英國亦要避免哈布斯堡勢力合併，再次主導歐洲大陸。從談判過程與結果，即可看出英國這種想法，法國也因此受益，除歸還過去征戰的領土，並未對本土產生直接影響，所以法國能夠迅速恢復國力，再度與歐洲其他強權競爭。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主導歐洲國家間關係的王權主義原則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為權力政治，特別突顯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的英國角色。亦即，路易十四時代強調的「道德」、「正統」之戰越來越不適合，背後隱藏的運作脈絡是國家權力。十八世紀開始發生的大北方戰爭、波蘭王位繼承戰爭以及後來的七年戰爭，已經由過去錯綜複雜的血緣繼承問題，轉向國家權力政治。

（二）法國的地緣戰略與新、舊競爭對手

路易十四於烏特勒支條約簽訂兩年後逝世，其曾孫路易十五即位後面對的歐洲局勢，除舊有英國、哈布斯堡勢力之外，法國亦需面對崛起的俄國以及普魯士。西歐國家體系主要行為者增添普魯士與俄國，使得原本就相當複雜的國家間外交關係，變得更詭局多變。歐洲地緣政治主要變動為：法國東疆萊茵河東岸，普魯士從一幕爾小國轉變為軍事強國，對法國、德意志諸邦國和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皆造成不小壓力。特別是法國與奧地利兩大強權，儘管兩者的出發點不同，都不願意見到普魯士強大並且擴張勢力範圍，但另一方面又需要普魯士，以制衡對手國家。此外，俄國崛起並且向西擴大勢力範圍，雖然沒有與法國疆土直接接觸，但卻是法國傳統盟國—瑞典、波蘭和鄂圖曼土耳其等三國勢力衰弱，所造成的直接結果。³⁴而在海權部分，英國取代荷蘭成為第一海上強國，並且建立全球性日

³⁴ Bernard de Montferrand, *Diplomatie—Des Volontés Françaises*(Condé-sur-Noireau: Editions Alban,

不落帝國的霸業，法國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海權發展，以及全球各地殖民擴張，都會受到英國海權的限制。當時法國天主教教士聖皮耶(l'abbé de Saint Piere)在烏特勒支條約簽訂同年，提出「歐洲永久和平方案」(project pour rendre la paix perpetuelle)，呼籲歐洲國家建立國際警察，預防歐洲衝突再起。³⁵此種理想主義的想法類似現今集體安全體制，雖然未能夠實現，不過能反映人們渴望和平的心情。

對法國而言，最糟的情況乃是再度遭受英國、荷蘭以及奧地利(甚至普魯士)等國聯合包圍，思索如何突圍仍是路易十五執政時期的地緣戰略挑戰。法國重視陸權的傳統，從地緣政治以及歷史上可以得知，畢竟法國必須直接面對鄰國的軍事威脅，海權對其而言，仍較為其次且沒有迫切需求。從地理位置與經濟發展來看，法國不像英國，必須依賴海外貿易，能夠在經濟上自己自足。縱然如此，路易十四同時與英國和荷蘭(海權國)、奧地利和普魯士(陸權國)為敵，甚至迫使這些海權國和陸權國組成大同盟來對抗法國，這對法國長期、短期均造成影響。因此，法國的理性解決作法是，改採合作、非對抗的方式，既能維持大國的地位，亦能夠擴展影響力。

路易十五執政即以改善與英國關係為第一要務，1716年，法國與英國簽訂同盟條約(le traité d'alliance franco-anglais)，隨後荷蘭也加入，法英為軸心成為影響西歐國家體系的關鍵。翌年，西班牙出兵薩丁尼亞，從奧地利手中奪得後，又繼續進取西西里。針對此危機，英法外交使節便在倫敦共商大計，希望可以達成全面對策，解決所引發的危機，而於1718年奧地利亦加入同盟條約，形成四國同盟。英國與法國分別於海上及陸上協助奧地利，直接進行武力干涉，迫使西班牙勢力退出西西里以及薩丁尼亞。至於俄國、波蘭、普魯士、丹麥與瑞典之間的北方戰爭，法國也因與英國關係和緩，能增強其調停戰爭的仲裁者角色。此外對於西班牙，1721年法國與西班牙簽訂共同保障的協防聯盟，重申烏特勒支、倫

2006), p. 91.

³⁵ Ibid., p. 100.

敦兩會的協議原則，並於同年稍後，倫敦也加入協防，遂成為馬德里三國同盟 (Triple Alliance of Madrid)。此約的效用在於減緩波旁家族（法西）兩國緊張內訌的壓力，鞏固烏特勒支會後歐洲諸國相互建立安全保障的架構。直至此時，以法英為軸心的歐洲國家體系儼然形成，並且主導歐洲國際關係。

然而，這樣的結果並不能維持太久，當西歐主要國家都想要約制對方的勢力範圍，另一方面則擴張自己的影響力時，衝突自然無法避免。歐陸部分，十八世紀的歐洲雖以奧地利、普魯士之間的競爭，以及北方戰爭為主，不過法國與英國在其中並未缺席。除此之外，十八世紀中期，卻是法國與英國的全球地緣政治衝突最激烈的時期，這兩國在北美大陸與印度的競逐歷史悠久，到達這時期則競爭白熱化。

二、 法國與歐洲陸權國家的競逐

（一） 俄國崛起與歐陸權力結構的變動

歐洲陸權國家之間的競逐主要環繞在波蘭王位繼承戰爭(1733-1735)，以及普魯士與奧地利的競爭。法國在名義上並無直接跟戰爭有關，不過，其利用各國之間衝突，而且英國在此時期亟於發展海外貿易，無暇顧及歐陸競爭，遂給予法國機會來擴展影響力。法國仍維持其傳統歐陸強權地位，當俄國勢力崛起並且在北方戰爭獲勝時，便提議與法國聯盟，俄國保證建立海軍艦隊並提供商業利益為條件，希望法國幫助其取得波羅地海出海港口，最後遭到拒絕。³⁶俄國轉而求助英國，承諾不會建立波羅地海軍隊，卻仍不為英國所接受。簡言之，俄國的崛起逐漸改變歐洲權力結構，法英兩國雖不願承認其為歐洲主要國家，仍無可避免地受

³⁶ J. H. Shenn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ope, 1689-1789*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22-23.

其影響。

法國對付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重要的戰略夥伴為：瑞典、波蘭以及鄂圖曼土耳其。這三個國家能夠有效牽制奧地利，使奧地利無法全力對付西邊的法國，然而，俄國的崛起改變原有的權力平衡。北方戰爭是在法國的斡旋下結束，影響最大者卻是法國的盟友—瑞典。參戰各國簽訂尼斯塔德條約(Treaty of Nystad, 1721)，俄國得到利伏尼亞(Livonia)、愛沙尼亞、英格利亞(Ingria)、以及卡瑞利亞(Karelia)幾地，因此從芬蘭灣上的維伯格(Viborg)起，一直到維那(Dvina)河上的里加，整個波羅地海東岸及東南沿岸地區，被納進俄國版圖。³⁷瑞典原是波羅地海區域霸權，經過長期北方戰爭後，領土割讓給普魯士、丹麥以及俄國後，即喪失原有霸權地位，而波羅地海主導權也移轉至俄國。

此外，波蘭也因北方戰爭以及自身地緣政治弱點，致使國力衰弱而後遭受列強瓜分。波蘭王位繼承戰爭源自於法國支持的國王列申斯基(Stanislaw Leszczynski)遭到推翻，改以俄普兩國所支持的人選替代。波蘭的地緣政治情形使其容易遭受外患侵襲：地理上來看，整個波蘭處於歐洲低地區，雖然西南方可以喀爾巴阡山(the Carpathian Mountains)為屏障，然對於東邊的俄國以及西邊的普魯士均無天險可守。此外，波蘭人口結構與宗教信仰，亦成為其弱點，³⁸削減國內的凝聚力，最後成為俄國、奧地利與普魯士瓜分的對象。³⁹不過，相當弔詭地，法國宣戰的對象應該是俄國與普魯士，卻反而向奧地利宣戰。法國與薩伏依簽訂杜林條約(Treaty of Turin, 1733)，承諾幫助從奧地利奪回米蘭；此外，法國又與西班牙簽訂家人之約(Family Compact)，相互保證對方在歐洲以及海外的領地，戰爭結束法國得到洛林，西班牙得到那不勒斯以及西西里。⁴⁰總體而言，法國關

³⁷ J. H. Shenn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ope, 1689-1789*, p. 28.

³⁸ 其人口當中僅有一半為波蘭人，聚集在維斯杜拉河(the Vistula)谷地，其餘為俄羅斯人、立陶宛人、日耳曼人以及猶太人。波蘭雖以天主教為國教，但境內俄羅斯人和部分烏克蘭人信奉東正教，日耳曼人信奉路德教會。

³⁹ Józef Gierowski and Andrzej Kamiński, "The Eclipse of Poland," in J. S. Bromley (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VI—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15/25*, pp. 681-715.

⁴⁰ J. H. Shenn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ope, 1689-1789*, pp.39-40.

心的核心仍然是切身的地緣政治利益，特別是東部疆域以及鄰近義大利邊界的安全，而且就長期戰略而言，法國意圖結合同為波旁王朝的西班牙，不僅對抗陸權的奧地利，更有合作抗衡英國海權的意味。

十六世紀開始，土耳其人建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鄂圖曼帝國，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是歐洲最主要的對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與其爭奪對地中海的控制權，為達成目的，與法國合作便是土耳其在歐洲的最佳選擇。1536 年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與法國簽訂貝爾格勒條約(The Treaties of Belgrade)，約定法國自西面、鄂圖曼土耳其自南面，共同夾擊中歐的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⁴¹法國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之間亦達成貿易協定，來自法國馬賽的商人可以在近東各港口貿易，並且不受土耳其法律管轄，由派駐人員管理，若與土耳其人發生糾紛，則受特別法庭審訊，這種特許為近代護照的起源。⁴²然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地中海海權受阻，並且喪失印度洋壟斷貿易利益，在鄂圖曼土耳其最後一次圍攻維也納並且敗北後，所簽訂的卡爾洛維茲條約(the Treaty of Carlowitz, 1699)，以及巴薩洛維茲條約(the Treaty of Passarwitz)後，正式確認其勢力在歐洲的退潮。⁴³

從 1450 年至 1650 年之兩百年間，俄國勢力已擴至波羅地海以及黑海，在彼得大帝執政時期，更勵行擴張政策，取得溫水港口和打開通往「西方的窗戶」(windows on the west)。俄國的競爭對手包括掌控波羅地海的瑞典、控制黑海的土耳其，以及西邊的波蘭。前述提到的北方戰爭、波蘭王位繼承戰爭，以及 1735 至 1739 年俄國對土耳其的戰爭，法國均介入調停，並達到安定東疆的目的，然而，歐洲大陸東半部權力結構變動，及其造成的影響，再加上普奧激烈競爭後的結果，開始衝擊西歐國家體系原有秩序。

⁴¹ 張錫模，聖戰與文明：伊斯蘭與世界政治首部曲，頁 167-167。

⁴² 王曾才編著，前引書，頁 204；張錫模，聖戰與文明：伊斯蘭與世界政治首部曲，頁 167。

⁴³ 張錫模，聖戰與文明：伊斯蘭與世界政治首部曲，頁 188-189。

(二) 普奧爭霸與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

1740年奧地利皇帝查理二世逝世，其女瑪麗繼承，但仍有三位王侯聲稱有繼承王位的權利，包括巴伐利亞選侯亞伯特(Charles Albert)、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五世，以及薩克森的奧古斯都三世(Augustus III)。然而，繼承戰爭並非由這些國家發動，卻是以普魯士出兵奧德河上游地區的西里西亞(Silesia)揭幕。普魯士對西里西亞主張擁有世襲的繼承權，但真正動機乃因為西里西亞人口眾多、土地肥沃和富有礦產，而且又居於戰略要地。如果能夠納入版圖，普魯士自身安全立刻大增，奧地利影響力也相對遞減。⁴⁴所以當奧地利拒絕割讓西里西亞的要求，以換取普魯士承認瑪麗的繼承權時，普魯士揮軍西里西亞，並且因其他國家的加入而使戰爭更為複雜。

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1740-1748)歷時八年，除普奧兩國之間的衝突外，這亦是一場聯盟對聯盟的戰爭，法國、巴伐利亞、西班牙與普魯士組成反奧聯盟，另一方面，奧地利則與英國、荷蘭同盟，並且結合德意志邦國的傭兵，以進行戰爭。兩個聯盟之內的成員目標各不相同：除普魯士的戰略意圖、巴伐利亞與西班牙覬覦奧地利王位外，西班牙更希望能夠恢復在義大利的影響力，並以義大利為軍事目標；法國則藉此機會想要削弱奧地利實力，並再次設定奧屬尼德蘭為軍事佔領目標。法國延續對東部疆域安全的優先關注，不過，其舉動卻引起英國以及荷蘭的警覺。

荷蘭直接毗鄰法國邊界，假若法國佔領尼德蘭，將會直接威脅荷蘭的安全，於是，荷蘭駐軍法國邊界的軍事要塞，以捍衛自身的領土安全。不過，單憑荷蘭己力無法對抗法國，必須要有鄰國，特別是英國的援助才能夠抗衡法國。⁴⁵英國此次則拋棄從烏特勒支條約以來，對歐陸衝突的不介入態度，主要以財政支援方

⁴⁴ J. H. Shenn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ope, 1689-1789*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44.

⁴⁵ Mark A. Thomson, "The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in J. O. Lindsay(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VII—The Old Regime 1713-63*(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422-423.

式幫助奧地利，並且利用地中海海權優勢，迫使西班牙放棄海上運兵方式，從陸地進軍義大利，從而拉長補給路線。這場戰爭明顯可以看得出來法國主導聯盟對抗奧地利，英國則是基於自身國家利益以及考量歐陸權力平衡而介入。戰爭最後以各國簽訂愛斯 拉 契帕條約(Treaty of Aix-la-chapelle, 1748)結束，以恢復戰前原貌為目的，特別在英國堅持下，法國必須將尼德蘭歸還奧地利，各國承認奧國女皇瑪麗的王位繼承權利。值得注意的是，普魯士仍保有西里西亞的特例，反激化後來普奧之間的衝突，而且普魯士的崛起，更為英國權力平衡考量增添另一選擇，致使爾後的外交大變革：英國與普魯士對抗法國與奧地利。

從路易十四時代以來，奧地利一直是英國傳統盟國，且又是法國的死對頭，並與法國產生嚴重的地緣政治衝突。直至十八世紀中期，英國與奧國的地緣政治關注核心日益分歧，英國致力於全球殖民地擴張以及全球政治問題，奧地利則將注意力移轉至中歐與東歐區域。過去連結英國、荷蘭與奧地利等這三個國家，其共同關心的地緣政治利益在尼德蘭，特別是保障荷蘭的國家安全。然而，荷蘭的地緣戰略位置缺點，在十七世紀後半期的戰爭中表露無遺。荷蘭比其他歐洲國家更依賴海外貿易，國內的織布、釀酒、煉糖、造船和榨油等工業，都要依賴進口的原料，人民的生活也依賴進口糧食。而且，荷蘭的海上貿易線需通過波羅的海和英吉利海峽，這些海上通道都容易遭到來自英國海軍基地的攻擊，陸地邊界(接近尼德蘭)又容易受法國軍隊的攻擊。最後也是最基本的問題在於，相較於其他國家來說，荷蘭人口較少，無法組成強大的軍事武力。⁴⁶普魯士的崛起及其佔領西里西亞的作為，使奧地利重新構思結合強大同盟夥伴，以因應普魯士的威脅。

催化法國與奧地利從過去敵人轉變成朋友的關鍵點在於，法英兩國在全球的殖民衝突越演越烈，法國需要陸地同盟國以確保其東疆安全，使其全力與英國展開競爭，這部分首選夥伴國家為奧地利；另外對奧地利而言，考量到對付普魯士以及收復西里西亞失土，法國的地緣戰略位置明顯優於英國，其能夠從陸地牽制

⁴⁶ C. H. Wilson, "The Growth of Overseas Commerce and European Manufacture," in J. O. Lindsay(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VII—The Old Regime 1713-63*, p. 28.

普魯士。因此，除 1746 年與俄國結盟外，奧地利與法國在 1756 年簽署防禦同盟條約，即第一次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法國保證絕不侵犯奧國領土，奧國則應許中立，不介入英法之爭。雙方並約定，任何一方若受到第三國的攻擊，另一方必出兵或出資相助（英法戰爭不包括在內）。另外，英國考量漢諾威的安全，以及普魯士擔心受到法奧俄三國聯合侵略，英普兩國亦簽署西敏寺協約(Convention of Westminster)成為防衛同盟。

這場外交大革命使得英國與普魯士、法國與奧地利從上次戰爭的敵人轉變成盟友，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這些轉變凸顯國家理性的外交作為外，普魯士亦成為歐洲權力平衡重要的一環，影響爾後歐洲的地緣政治。

三、 法國與英國的海外殖民競爭

（一）法國全球地緣政治影響力的擴張

發展海權是十五世紀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歐各國擴張其全球地緣政治影響力最直接的方式，法國腳步緊隨在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以及英國之後。然而，法國與英國的海外衝突直至十七世紀末才開始，之前西歐國家的海外衝突，以荷蘭、英國的衝突較為明顯。

對英國而言，其經濟發展主要依賴於海上航線，雖然奶製品和蔬菜可從鄰近地區運往消費市場，不過笨重的貨物只能經由水路運輸，例如煤、建築石材、穀物等。而且，英國欠缺木材、瀝青、松脂、黃麻和繩索，這些以及鐵礦等物資的大宗來源自波羅地海。⁴⁷因此英國關心波羅地海權力轉移的北方戰爭，是可以理解的。同時，英國於十七世紀初即在北美大陸建立永久性的根據地，⁴⁸到十八世

⁴⁷ W. R. Brock, "England," in J. O. Lindsay(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VII—The Old Regime 1713-63*, pp. 242-243.

⁴⁸ 英國在 1607 年和 1620 年，分別在維吉尼亞建立詹姆斯敦(Jamestown)以及麻薩諸塞建立普里

紀初期，英國在北美殖民地人口約三十萬人，且主要居於阿帕拉契山脈 (Appalachian Mountains) 以東的大西洋沿岸。

在法國方面，路易十四時期的財政部長柯爾白，除前面已經提到擴建海軍外，法國更積極打造港口、商貿船隊，延伸法國貿易路線至東印度群島、西印度群島、近東、北海與非洲塞內加爾等地。此外，法國為避免過度依賴海外貿易，柯爾白鼓勵企業的海外殖民，以模仿荷蘭東印度公司方式，透過皇家授權，成立五家特許企業。法國的殖民墾荒行動包括：從非洲塞內加爾購買奴隸，並送往西印度群島，以擴大當地蔗糖產業的產能；在北美洲的新法國(New France)、魁北克以及路易西安那等地殖民；在印度本地契里(Pondichery)、昌德那加(Chandernagor)兩地建立貿易中心。⁴⁹法國在北美殖民地則分佈在英國北方，主要據點在芬地灣(Bay of Fundy)以及聖羅倫斯河流域，以大湖區為新法國(New France)，並且藉助河流，繼續往南推進到俄亥俄河、密西西比河流域一帶，即現今的路易西安那州。從殖民地的地理分佈來看，法國最早將勢力深入到北美洲地理中心地帶，佔有地緣戰略優勢，不過法國的劣勢在於人口，總數約為英國殖民人口的十分之一。

歐洲國家勢力擴及印度方面，葡萄牙在十五世紀初最早在印度的果河(Goa)設立據點，隨之荷蘭來到並驅逐葡萄牙勢力，同時，英國亦成立東印度公司推展東方貿易，1612年在印度半島的蘇拉特(Surat)設置第一座商館，陸續在馬德拉斯(Madras)、孟買與加爾各答建立殖民據點，英國將印度東北、東南與西南的重要港市皆納入控制。⁵⁰十七世紀結束前，英國已經成功地驅逐荷蘭勢力，印度次大陸僅存的競爭對手為法國。1719年，法國將東印度公司重組，新公司擁有從非洲西海岸繞過好望角到紅海、印度洋各島嶼、印度本土以及遠東等地的獨有的貿

茅斯等兩個據點。1664年英荷戰爭勝利後，英國又得到新阿姆斯特丹一帶的新尼德蘭。十八世紀初，自緬因(Maine)到喬治亞的十三州之地已經建立。

⁴⁹ G. de Bertier de Sauvigny and David H. Pinkney, 蔡百詮譯，1989年，*法國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9年)，頁176。

⁵⁰ 張錫模，*聖戰與文明—伊斯蘭與世界政治首部曲*，頁236-237。

易特權。法國在印度南岸彭迪遮裡(Pondicherry)設立貿易據點，並陸續擴及其他據點。法國在印度設立據點，初期純粹為商業考量，將東方的茶葉、咖啡以及紡織品運送到法國市場，而建築要塞是用於保護貿易安全。不過，到了十八世紀中期，法國政策從商業轉變為殖民治理，開始攫取領土作為貿易和法國帝國的基礎，在實際作為上，則是利用本地人治理，逐步建立法國對整個印度南部的權力範圍。⁵¹

當歐洲大陸爆發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時，在北美殖民地，英國對法國、西班牙發動安妮女王戰爭(Queen Anne's War, 1702-1713)，主要戰場發生在新英格蘭、佛羅里達和南卡林納等區域，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結束後，北美洲殖民戰事亦宣告結束，烏特勒支條約劃分英、法在北美的殖民地界線，不過還是相當模糊，無法解決兩國之間的紛爭。此外，法國從十八世紀起便積極加強在北美與印度的部署，建立要塞、碉堡，並在印度訓練士兵，干涉蒙兀兒帝國內政，這些行為均引起英國高度關心。直至七年戰爭爆發，英國與法國均出動人力、物資在北美洲以及印度進行殖民戰爭。這場戰爭的結果也決定，爾後數個世紀央格魯薩克遜民族主導國際關係的局面。

(二) 七年戰爭(1756-1763)與英國海權的確立

曾有史學家將 1688 年到 1763 年這段時期，稱之為英法二次百年戰爭，亦有歷史學家認為直至 1815 年兩國之間的戰爭才算結束。基本上，七年戰爭可以區分成歐洲戰場以及海外戰場：歐洲戰場為進行外交革命後的新聯盟間對抗，1756 年從波西米亞爆發，主要是奧地利與普魯士兩個陸權國家間的戰爭。歐陸戰場上，普魯士在四面敵國包圍的情況下，率先進攻薩克森尼(Saxony)，雖然英國為名義上的同盟國，但實際上多為財政援助；法國則是進軍漢諾威、威斯特伐利亞

⁵¹ C. H. Wilson, "The Growth of Overseas Commerce and European Manufacture," in J. O. Lindsay(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VII—The Old Regime 1713-63*, p.41.

等地，不過遭致普魯士軍隊抗拒。因此，歐陸戰場幾乎是普魯士獨立對抗全歐洲，特別是奧地利和俄國更約定瓜分普魯士。不過到 1762 年，俄國與瑞典分別簽訂條約，將佔領土地歸還普魯士，恢復戰前狀況。奧地利則無俄國以及瑞典的奧援下，於 1763 年與普魯士訂立胡勃圖斯堡和約(Peace of Hubertusburg)，主要約定普魯士保有西里西亞，薩克森尼恢復戰前狀態。⁵²

法國與英國的海外殖民衝突主要發生在北美洲以及印度兩大戰場。其實，就英國的戰略來說，想要維持歐洲的權力平衡，除以財政支援的間接方式援助普魯士，使其與法俄奧等國抗衡外，更能夠在殖民地削弱法國的實力，使法國分散注意力而無法致力於歐陸戰爭。⁵³簡言之，英國要讓法國處於海權、陸權兩面作戰的困境，同時，歐陸上又試圖讓法國再度遭受包圍。英國一方面加強奧屬尼德蘭的關卡要塞，並保持與奧荷兩國的舊盟；另一方面則是離間西班牙與法國的關係，促使奧地利、西班牙與薩丁尼亞簽署阿倫尤茲條約(Treaty of Aranjuez, 1752)，互相保證在義大利的屬地，使西班牙立場靠向英國。⁵⁴

在北美洲部分，七年戰爭爆發前，英法都在積極尋求加強保障殖民地的途徑：阿卡地亞邊界近布列敦岬(Cape Breton)及愛德華王子島(Prince Edward Islands)處，英國人正向加拿大步步推進，試圖斬斷布列敦岬路易斯堡(Louisburg)至聖羅斯河(Saint Lawrence river)魁北克(Quebec)之間法方交通線的可能，此外，英國移民也正越過阿帕拉契山更往西進。相反地，法國的殖民政策則是打通南北，將其在加拿大及路易西安那兩地的屬地貫穿起來，這需要從大湖區(Great Lakes)起往南延伸，建立一龐大的交通聯絡網，辦法是在俄亥俄河(Ohio river)河谷，一路囤兵移民開墾，直到密西西比河止。這計畫若成功，從新蘇格蘭到喬治亞一線下來的東岸英國殖民地，就有被圍堵的危險。⁵⁵從北美殖民地位置來看，法國享有地

⁵² Autrand, Françoise., et al (els), *Histoire de la Diplomatie Française—Du Moyen Age à l'Empire*(Paris: Editions Perrin, 2007), pp. 432-434.

⁵³ Eric Robson, "The Seven Years War," in J. O. Lindsay(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VII—The Old Regime 1713-63*, p. 466.

⁵⁴ J. H. Shenn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ope, 1689-1789*, p. 52.

⁵⁵ *Ibid.*, pp. 51-52.

緣戰略優勢，能夠經由皮毛貿易得到的經濟利益支撐戰爭花費，軍事上透過河流水運、外交上則有印地安部落援助。然而，法國的優勢卻逐漸喪失，主要原因在於英國掌控制海權，法國殖民地補給匱乏，英國得以從歐洲補給軍隊、大規模動員殖民地人力和物資。法國的海權劣勢，同樣顯現在印度殖民地戰爭。此外，在印度殖民爭奪部分，英國的海權優勢亦是取得勝利的關鍵要素，能夠透過海運補給兵源、物資以及資金，同時也能利用海權阻止法國來自歐陸的補給。1756 年至 1757 年期間，英國冒險家克萊武(Robert Clive)帶領孟加拉雇傭兵，在普萊西(Plassey)中對法國東印度公司軍隊贏得決定性勝利，徹底確立英國在孟加拉的優勢並排除法國在印度的影響力。⁵⁶

1763 年簽訂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關於西印度群島與塞內加爾被英國所奪取的殖民地，法國承認英國統治權。而且在東方，法國東印度公司重新恢復五個貿易站，並以完全去軍事化為條件，不得設防。最後也最重要的北美洲殖民地版圖重劃，加拿大密西西比河以東的領土，交由英國統治，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殖民地，即路易斯安那的所有剩餘地區，則割讓給西班牙，法國以此補償西班牙在戰爭中的殖民地損失（佛羅里達）。⁵⁷至此，英國海外殖民可說大獲全勝，歐陸本身亦回歸戰前權力平衡狀態，對法國而言卻是恥辱，路易十五執政遺留的復仇想法、財政問題等，影響法國對英國以及對美國獨立運動的立場。

第三節 法國霸權的再現(1763-1815)

1763 年，英國與普魯士的勝利，以及法國與奧地利的失敗，構成歐洲歷史發展的轉捩點。歐洲國家體系不再僅以西歐為中心，權力重心逐步往東移動，形成英法奧普俄五國並存的多國型態，然在七年戰爭勝利後，英國海外殖民勢力遠

⁵⁶ 張錫模，聖戰與文明：伊斯蘭與世界政治首部曲，頁 237。

⁵⁷ G. de Bertier de Sauvigny and David H. Pinkney，前引書，頁 210。

勝於法國，深化兩國之間的敵對關係。

一、 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

(一) 美國獨立戰爭(1776-1783)

巴黎合約後呈現英國在外交上孤立的結果：首先是普魯士的立場搖擺不一，甚至表明對新芬蘭捕魚權不在乎，無法成為英國在歐陸的堅固盟友；其次則是法奧同盟後，法國必須放棄侵犯奧屬尼德蘭的企圖，這亦減少對荷蘭的安全威脅，動搖英國與荷蘭的同盟關係，將荷蘭推向中立的立場；第三則是穩定義大利半島局勢，結束波旁家族與哈布斯堡家族之間的衝突，有益於法國以及西班牙等波旁家族的合作關係。⁵⁸法國在七年戰爭後，其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即是恢復海外影響力以及海外殖民地，英國為主要的競爭對手，從這點來看，西班牙與法國的具有共同利益。因此在英國北美洲殖民地醞釀獨立運動時，法國與西班牙的立場一致，在財政與軍事上支援北美洲獨立。

法國支援美國獨立運動的戰略，與七年戰爭時英國的戰略邏輯如出一轍，亦即，在海權上牽制英國，使其無法在北美大陸戰場獲勝。路易十六上任後任命維芝納(Comte de Vergennes)為外長，他將法國外交版圖劃分成歐洲與北美兩大塊，歐陸上加強與俄國、普魯士以及奧地利的關係，在北美大陸則是支持獨立運動，斷絕英國國力的來源。法國表示不反對俄國與波蘭在 1774 年所劃定的黑海邊界，對普魯士保證維護現狀，並希望普魯士在法英衝突中維持中立，對奧地利則重申 1756 年所建立的聯盟體系不變；此外，法國亦與許多德意志邦國簽訂政治

⁵⁸ A. Goodwin, "Introductory Summary," in A. Goodwin(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VIII—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1763-93*(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5.

同盟，強化其在普魯士與奧地利之間的外交槓桿。⁵⁹從法國的角度來看，英國國力強盛來自於海外貿易以及殖民利益，若能夠幫助北美殖民地脫離英國而獨立，削弱英國海外勢力，則有益於法國與英國的競爭，無論是在歐洲陸地或者是海外殖民競爭皆是如此。於是在 1777 年，法國承認美國獨立地位，兩國並簽訂友好通商條約以及同盟條約(1778)，約定共同對英國作戰並且不會單獨媾和，西班牙於翌年也加入該同盟。對維芝納來說，法國一方面要維持歐洲的權力平衡，另一方面則是準備戰爭，如此才是維持平衡的務實作法，北美獨立戰爭提供法國再平衡英國的機會。⁶⁰

於是，法國利用北美獨立戰爭期間，再次挑戰英國的海上霸權。法國除與美國合組艦隊，對付英國的海軍外，並且鼓動歐洲其他國家武裝中立，因應英國海上檢查各國船隻的行為，其目的是保衛中立國的貿易權益，包括丹麥、瑞典、荷蘭、奧地利以及普魯士等皆加入。美國建國之父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對此即認為，法國在財政上以及海軍上的援助，能幫助其在陸地擊敗英國軍隊，使獨立運動獲得成功。⁶¹1783 年英美兩國簽訂巴黎條約，英國承認美國為獨立國家，領土範圍為北至加拿大，南至佛羅里達，西至密西西比河，東至大西洋等；同時，英國亦與法、西兩國訂約，法國獲得加勒比海的托貝哥(Tobago)以及非洲塞內加爾(Senegal)，西班牙則獲得西地中海的米諾卡島(Minorca)以及北美佛羅里達。

然而，1783 年後法國財政面臨困境，由於介入北美洲的獨立運動，讓法國耗掉大量人力、物力，並陷入全國性的財政危機，迫使法國政府召開三級會議，間接導致大革命的產生。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俄普奧等三國第一次瓜分波蘭(1772)，以及衍生的俄土戰爭(1768-1774)，法國在外交上其實都暗助波蘭與土耳其。不過，波蘭遭受瓜分以及土耳其戰敗的結果，不僅意謂法國傳統盟國勢力衰微，更凸顯法國在東歐的地緣政治影響力逐漸消失，喪失維持歐洲權力平衡的重要外交槓桿。

⁵⁹ Bernard de Montferrand, *op.cit.*, pp. 134-135.

⁶⁰ Autrand, Françoise., et al (els), *op.cit.*, p.439.

⁶¹ 王曾才編著，前引書，頁 174。

(二) 法國大革命(1789)

法國介入美國的獨立戰爭，雖然在政治上扳回一城，卻造成法國政府財政危機，最終在 1789 年引起法國大革命。⁶²1792 年法國政府向奧地利宣戰，以及革命政府於 1793 年二月將路易十六處死等事件，引發一連串的軍事衝突。英國、普魯士、奧地利、荷蘭、西班牙、薩丁尼亞、那不勒斯以及德意志邦國等，為遏阻革命繼續蔓延，共同組成反法聯盟，進軍法國以干涉革命。歐洲國家體系受到法國大革命所建立的民族國家模型衝擊，革命政府在國內推動整套「民族國家化計劃」(nationalizing project)，創造法國民族與單一國家的政治架構，包括國旗、國歌等民族象徵，軍隊從國王的雇傭兵轉化為國家軍隊，國家並且主導國民教育以及介入宗教領域。法國大革命期間的種種改革衝擊歐洲傳統君主主權觀念，引發歐洲以國王為主權象徵的國家體系的正當性危機，致使反法聯盟再次形成。

法國革命政府首要面對本土如何免遭受入侵，與過去相同，革命政府再次出兵佔領奧屬尼德蘭、薩伏衣，以及幾處萊茵河左岸領土，搶先佔領這些地緣戰略標地，以捍衛法國領土安全。於是，法國革命政府以行政命令方式，宣布須耳得河開放自由航行，此政策明顯違反除荷蘭以外的其他國家禁行須耳得河的國際條約，1792 年 11 月法國海軍強行須耳得河口，更直接威脅荷蘭以及英國的海權。⁶³此外，法國亦通過一項法令，承諾對希望獲得自由的人們給予友誼與援助，這項法令則是直接呼應萊茵河地區的請願，法國革命政府將輸出革命思想合法化的行動，對於普魯士跟奧地利來說如芒刺在背。1793 年法國便向荷蘭以及英國宣戰，直至同年 3 月為止，除俄國與少數斯勘地那維亞國家外，法國革命政府已經

⁶² 有關法國大革命的起源，歷史學者的研究著作相當豐富，爭議也相當多。不過，本文並不打算陷入革命起源的討論，而是針對革命的影響，以及革命時期到拿破崙執政時期的歐洲國際關係。

⁶³ A. Goodwin,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October 1789-February 1793," in A. Goodwin(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VIII—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1763-93*, pp. 710-711.

跟大部分歐洲國家進入戰爭狀態。然而，1793 年法軍接連遭受軍事挫敗，反法同盟將法國勢力逐出尼德蘭，法國內部亦發生反革命叛亂，在各國干涉戰爭的外在，以及內部反動勢力的雙重壓力之下，反而將法國革命政權推向恐怖治理，革命政府亦徵召所有男性服役，對抗反法同盟的軍事威脅。

不過，反法同盟畢竟不是鐵板一塊，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普魯士與奧地利的地緣政治衝突雖因為法國大革命而暫時遺忘，但當局勢稍微穩定之時，兩國之間便產生嫌隙；英國以及荷蘭仍然以海權為基礎，在歐陸戰場的貢獻度比不上奧地利、普魯士與俄國等國家。雖然正統原則(principle of legitimacy)⁶⁴將這些國家結合一起，但背後的地緣政治歧異仍然存在。此外，法國革命政府能夠繼續維持下去的另一關鍵要素在於波蘭，當時普魯士對波蘭領土的興趣多過壓制法國大革命，對於奧地利與俄國而言，從波蘭獲得的領土多寡，將會影響自身在中東歐的權力競逐，因此雖具備反法的共同立場，但關注波蘭仍勝過於法國。不過，法國革命政府執行的擴張政策，再次與周遭鄰國發生直接軍事衝突，同時，法國亦面臨國內反革命勢力反撲，國際與國內的情勢促成拿破崙(Bonaparte Napoleon)的崛起。

三、拿破崙時期的法國霸權

(一) 拿破崙的突圍之戰

1799 年拿破崙在法國內外面臨危機之時發動政變奪得政權，不過在取得政權之前，法國已經透過戰爭兼併東北邊界外地區，包括薩伏依、尼斯(Nice)、比利時以及萊茵河左岸普魯士的領土。同時，法國革命政府亦支配週邊荷蘭、瑞士、

⁶⁴ 正統原則是拿破崙戰敗後，各國代表於維也納會議所制訂的仲裁原則。承認 1789 年前各封建君主為正統王朝，恢復其統治權力，被拿破崙推翻的君主，亦可由兄弟或親屬替代。恢復君主王朝為當時各國結合對抗法國的主張，但主張背後蘊含不同的地緣政治考量。

教皇國，以及那不勒斯王國等幾個共和國。於是，拿破崙宣誓就職執政官時，即保證維護萊茵河、阿爾卑斯山脈、庇里牛斯山以及大西洋與地中海等天然疆域。⁶⁵不過，拿破崙執政時期，所擘劃法國帝國藍圖更具野心，其規模擴及歐洲大陸與海外殖民地，亦即，法國除希望在陸權上支配傳統歐洲國家，更冀望在海權上擊敗英國，取代英國而成為全球性帝國。為達成目的，法國必須能夠做到：首先，統治並且鞏固萊茵河以及阿爾卑斯山區域，真正實現天然疆域；其次，建立一從西邊大西洋到東邊烏拉爾山脈的大陸型帝國，各國成為法國帝國的附庸國；第三，建立海洋型殖民帝國，取代英國、西班牙以及葡萄牙，成為真正的全球性帝國。⁶⁶

法國革命政府能夠繼續執行領土擴張政策的原因，除前面所提歐陸國家重視波蘭的程度勝過法國大革命外，各國之間的內在衝突亦成為法國瓦解反法同盟的關鍵。特別是在 1795 年以後，法國地緣政治擴張的標地直指奧地利以及英國，拿破崙執政前的兩場重大戰役：義大利戰役以及埃及戰役，即是針對奧地利陸權以及英國海權的再次挑戰。1796 年，法軍入侵義大利並擊敗皮德蒙 薩丁尼亞王國(Piedmont-Sardinia)，迫使後者承認法國擁有薩伏依以及尼斯，並且允許法國軍隊的領土過境權，法國更使教皇放棄亞維農(Avignon)以及孔達(Comtat Venaissin)，並割讓波河平原屬地的北部平原。另外，拿破崙亦擊敗奧地利軍隊，兩國簽訂剛波 佛米歐條約(the Treaty of Campo-Formio)，奧地利放棄荷蘭以及米蘭，並且承認萊茵河左岸亞爾薩斯以北的部分土地歸為法國所有。拿破崙在義大利北部成立新國家「內阿爾卑斯山共和國」(République cisalpine)，成為法國的附庸國。⁶⁷換言之，法國軍隊在拿破崙指揮下，成功擊敗奧地利，取代奧地利成為義大利半島最具地緣政治影響力的國家。

⁶⁵ Will and Ariel Durant, 幼獅翻譯中心編譯, 拿破崙的升沈(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1978 年), 頁 18。

⁶⁶ 時殷弘, 「法國大革命、拿破崙和國際政治的變更」, 歐洲研究, 第 6 期(2005 年), 頁 3。

⁶⁷ Geoffrey Bruun, "The Balance of Power During the Wars, 1793-1814," in C. W. Crawley(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IX—War and Peace in an Age of Upheaval 1793-1830*(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255 ; G. de Bertier de Sauvigny and David H. Pinkney, 前引書, 頁 240。

此外，對英國的戰略，法國放棄直接登陸英國本土，或者挑戰英國海權等方式擊敗英國，而改採間接方式，選擇佔領埃及來阻斷英國海外貿易。1798 年拿破崙征服埃及的戰略意義，即要阻絕英國聯繫海外印度殖民地的海上交通線。美國獨立之後，英國將海外殖民重心轉移至印度次大陸，法國為切斷大英帝國的帝國通路以斷絕英國的經濟命脈，拿破崙除遠征埃及外，甚至聯合俄國共同從陸路進攻印度，並且說服波斯與法國共同進擊印度。⁶⁸從十八世紀以來，英國即增加與東方的貿易，英屬東印度公司於印度擴展迅速，七年戰爭結束後更是英國在次大陸獨霸的情況，而且，英國亦逐步擴及地緣政治影響力至紅海。美國獨立後，英國海外殖民重心移轉至印度次大陸，紅海以及東地中海居於地緣戰略重要位置。因此，拿破崙征服埃及並且控制蘇伊士，其戰略思想為阻絕英國與海外殖民地的聯繫。

拿破崙在 1799 年發動政變並奪取政權，繼之分別在波河平原以及巴伐利亞擊敗奧地利，迫使奧地利簽訂倫內維爾(Lunéville)條約，強調奧地利應遵守剛波佛米歐條約，並再次確認法國對萊茵河左岸領土享有主權，解決法國在義大利邊界紛爭。法國在德意志區域組成萊茵邦聯，將原有 350 個邦國減至 82 個，加強法國對德意志區域的控制能力。此外，法國雖然無法直接擊敗英國，但反法同盟實際已瓦解的情況下，法國與英國在 1802 年簽訂亞眠合約(La Paix d'Amiens)，法國從那不勒斯王國、羅馬等地撤軍，英國從馬爾他、直布羅陀以及埃及等佔領地撤軍，終止兩國的戰爭狀態。然而，這合約實際上並不能維持很久，隨著法國擴張政策的持續，不過三年，英國再次組成反法同盟，與拿破崙法國對抗。

（二）拿破崙時期的法國地緣戰略

法國在歐陸戰場獲勝增加其對抗英國海權的實力，拿破崙實施大陸封鎖政

⁶⁸ 張錫模，聖戰與文明：伊斯蘭與世界政治首部曲，頁 254。

策，選擇另一種間接模式來對付英國，不僅要切斷英國對歐陸的貿易關係，同時以整個歐洲大陸為範圍，增加英國想要完全封鎖歐洲大陸海岸線的困難性。這戰略跟過去不同，英國傳統上只要封鎖法國對地中海或者是大西洋的港口，即可封住法國海權勢力的擴張，此次法國則反過來利用整個大陸廣袤幅員，耗掉英國海上資源，讓完全封鎖幾乎成為不可能。⁶⁹同時，法國在 1803 年出售路易西安那給美國，意謂放棄在北美大陸恢復殖民勢力，且希冀美國能夠加入對英國的封鎖，法英發生軍事衝突時，美國亦能夠牽制英國的海權。



圖 2-2 1812 年的歐洲

資料來源：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d/d4/Europe_map_1812.PNG

實際上，英國從十八世紀以來在海權、商業以及海外殖民方面居於主宰地位，然而英國並未打破歐洲內部的權力平衡態勢，維持這種平衡符合英國自身國家利益。不過，拿破崙時期的法國打破這種權力平衡態勢，大陸封鎖政策的計畫

⁶⁹ C. C. Lloyd, “Armed Forces and the Art of War—Navies,” C. W. Crawley(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IX—War and Peace in an Age of Upheaval 1793-1830*(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77-78.

是要封鎖歐陸海岸、港口，遏阻英國貨物輸入，並且迫使英國撤銷對所有法國轄區的封鎖，終止阻擾法國海上貿易，收回英國強佔的法國殖民地，以及阻止英國經援歐陸各國與法作戰等行動。⁷⁰

大陸封鎖政策是承認英國海權優越，1812 年以前，法國與英國呈現陸權、海權對峙的情況（如圖 2-2），法國在歐洲大陸的絕對優勢，並且與俄國達成同盟協議，對英國而言，其缺少在歐洲大陸的橋頭堡。不過，由於法國仍無法撼動其海權，制海權仍然掌控在英國手上，致使法國無法橫越海峽並且征服英倫三島。雖然 1778 年法國參戰時，英國為了減少戰艦的損失而放棄對法國嚴密封鎖的策略。實際上，這無異拱手交出制海權，縱然英國派遣遠征軍到直布羅陀、西印度群島和北美沿海，並不如對法國海岸的出入通道施行嚴格管制來的有效，因為控制這些通道即可防止法國派遣艦隊到遠方戰場去。直至 1782 年，英軍在聖徒島（the Saints）大捷並解除直布羅陀之圍後，英國才奪回制海權。⁷¹

不過，隨著拿破崙勢力擴張到整個大陸，英國需要更多的海上艦隊進行封鎖。英國的地緣政治邏輯並非要海權直接擊敗或征服陸權（法國），而是結合另一個陸權國家，並以海權牽制的方式，協助其對抗競爭的陸權。英國殖民政策在取得好望角(1795)以及錫蘭(1796)等地後獲得進展，然而在歐洲大陸並未獲得立足點。因此，為避免經濟命脈受法國阻絕，英國必須善用法國地緣政治上的弱點，即歐洲陸地上牽制法國陸軍，利用海權繼續壓制法國，避免後者的挑戰。英國在 1801 年派遣印度孟加拉兵團短期佔領埃及，並在印度半島上展開前方戰略（forward strategy），企圖將控制力推向波斯與阿富汗。⁷²此外，英國亦著力在伊比利半島以及法國過去舊盟友土耳其，藉著加強與西班牙、葡萄牙與土耳其的貿易，突破拿破崙的大陸封鎖。法國則以鎮壓方式懲罰西班牙與葡萄牙，導致接下來數年法國在伊比利半島的戰事。

⁷⁰ Will and Ariel Durant, 幼獅翻譯中心編譯, 拿破崙的升沈 (台北: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1978 年), 頁 289

⁷¹ Paul Kennedy, *op. cit.*, pp. 116-117.

⁷² 張錫模, 聖戰與文明—伊斯蘭與世界政治首部曲, 頁 254-255。

直至 1811 年，拿破崙建立的法國帝國範圍含蓋整個歐洲，除斯堪地那維亞國家、普魯士、奧地利以及俄國外，整個歐洲均在法國掌控下。以法國本身的領土版圖為基準，⁷³其他歐洲附庸國家尚包括萊茵邦聯、瑞士邦聯、義大利王國、那不勒斯王國以及西班牙王國等。法國帝國與大英帝國形成典型的海權、陸權對抗模式，然而，法國在歐陸並非不受挑戰，與俄國的模糊盟友關係影響著法國的帝國霸業，精確地說，兩國間潛在的地緣政治衝突不斷升高。例如，法國一直阻擾俄國佔領君士坦丁堡，阻絕俄國海權勢力於博斯普魯斯(Bosporus)、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 Strait)之外，同時，法國扶植華沙大公國，使得波蘭復國並且直接威脅俄國。此外，法國的大陸封鎖政策亦影響俄國國內經濟，其小麥、苧麻和木材主要出口市場為英國，因此，俄國在 1810 年開放英國商品輸入，並對法國商品課以重稅的舉動，更使得法俄兩國關係更加惡化。⁷⁴ 所以 1812 年拿破崙決定對俄國作戰，即是認為，若法國能在歐洲大陸擊敗俄國，就能支配整個歐洲，並且對英國的戰爭取得最後的勝利。法國靠著全民軍事總動員的模式，即動員本國與附庸國約六十萬軍隊對俄國進行戰爭。⁷⁵俄國軍隊並無直接與法軍決戰，反而不斷退後並讓追擊的法軍陷入疾病與遠程後勤補給的困境。雖然法國在莫斯科擊敗俄軍，但一直無法獲得決定性勝利，直到冬季來臨，酷寒天氣迫使法軍撤軍，使得原有六十萬部隊僅存約十萬。

法國從拿破崙執政、百日復辟到滑鐵盧慘敗，整個擴張過程打破英國與法國之間的海權、陸權對抗模式，而再次限於同時對抗海權（英國）以及陸權（俄普奧）的局面。拿破崙與路易十四執政時期的對外擴張政策相似，同樣地，其他歐洲國家雖存在著地緣政治衝突，但生存邏輯迫使這些國家結盟對抗法國，形成反法同盟的結合與瓦解過程不斷重複。

⁷³ 當時法國版圖包括北部的荷蘭、不來梅、漢堡和盧比克等城市，南邊的皮德蒙、熱那亞、多斯加尼、教宗國的西部，以及亞得里亞海(Illyrie)省分。

⁷⁴ G. de Bertier de Sauvigny and David H. Pinkney, 前引書, 頁 258-259。

⁷⁵ 從法國大革命到拿破崙執政時期，戰爭科技與戰術並沒有很大的改變，不同的是，革命政府實施全民皆兵的軍事動員模式，影響爾後的戰爭發展。1793 年法國革命政府通過徵兵法令，徵召 18 至 25 歲的年輕人服役，直至 1794 年時，法國已經擁有 75 萬軍隊。拿破崙執政後將徵兵法令納入法典當中，到滑鐵盧之役為止，法國最高動員 120 萬人投入戰爭。

三、1815年維也納體系建立

(一) 各國的分歧意見

1814年至1815年各國所要處理的問題在於如何避免類似法國大革命再發生，革命不再僅是一國內部的單獨事件，而是跨國界的問題。就如同奧地利首相梅特涅所認為的，法國大革命將奧地利帝國推向解體的邊緣，反法聯盟進行的戰爭，其實是攸關奧地利生存的一場戰爭。從地緣政治來看，奧地利無可避免地受到其他國家的影響，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衝擊，奧地利受的影響甚至比英國嚴重，其自由以及民族主義的思想，更衝擊奧地利多民族組合的政治體制。⁷⁶然而，如同前面所敘述，各國組成的反法同盟，或又稱為反法神聖同盟之間亦存在分歧，形成英國與普魯士、俄國與奧地利之間的差異立場，而各國對後拿破崙時代的歐洲秩序的不同意見，提供法國繼續維持歐洲大國地位的機會。

就英國而言，首先是維持自身的海權優勢，其次則為依循傳統權力平衡，來進行歐洲秩序的重建。因此，英國刻意避免在談判會議當中論及戰爭期間的海上行動適當性，英國在拿破崙發布「大陸封鎖令」後，同時亦也實施「長距離海上封鎖政策」，其中許多舉動(包括趁機攫取各國海外殖民地)不符合國際法規定，而且，英國海軍將領納爾遜在戰爭期間曾派海軍在哥本哈根港內殲滅了丹麥海軍，此舉也有觸犯國際法之嫌。此外，英國希望與其他歐陸國家建立「一般性同盟」(General Alliance)，但是要有四項地緣政治條件：首先，絕對禁止法國勢力擴張至比利時境內的須耳德(Scheldt)河口；其次，為保障荷蘭的安全，應使其併入比利時；第三，英國主張恢復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兩國的完全獨立，其領土完整須受到列強保障；最後，雖不是絕對條件，但英國熱切期盼能恢復義大利各國的

⁷⁶ Kaleve J. Holsti, *op. cit.*, pp. 116-117.

獨立，尤其是薩丁尼亞，並應使其控制半島西北部的地區。⁷⁷英國巧妙地維持海權優勢地位，在荷蘭問題退讓，不做支配者角色，以換取各國同意而達成其外交最高指導：歐洲權力平衡。

從俄國角度來看，俄國沙皇亞歷山大認為歐洲外交的三個核心觀點為：國內實行憲政，歐洲各國基於民族主義原則獨立，以及建立歐洲聯邦。實行憲政目的在限制獨裁者的權力，避免類似拿破崙的政權形成，危害其他歐洲國家；歐洲國家體系應以民族為原則進行重組；在國際層面上，歐洲應成立歐洲聯邦或同盟，禁止成員行使武力。簡言之，俄國主張結合預防與處理兩個層面，來處理戰爭的問題，只不過，俄國的主張與瓜分波蘭的作法明顯違背，而且主張民族獨立原則也跟奧地利的立場相左。俄國這些想法已經將自身納入歐洲當中，並且開始認為俄國有能力與其他歐洲國家制訂歐洲國家體系，然而當俄國將建立新歐洲國家體系融入自由主義以及理想主義思想時，便受到奧地利阻擾，最後只剩下陳腔濫調。⁷⁸此外，俄國的權力崛起，以及其對波蘭的興趣，格外引起英國的重視，使其結合奧地利共同對付俄國，避免俄國取代法國成為霸權，假若俄國的地緣政治影響力擴及到波羅地海以及地中海，將影響英國的原料輸入（波羅地海），以及危害英國—地中海—紅海—印度洋—印度的海上貿易路線。簡言之，俄國權力擴張影響海權與陸權兩個層面，英國為鞏固海上霸權的地位，以及維持歐陸權力平衡態勢，勢必格外預防俄國這一崛起大國。

奧地利與普魯士爭奪德意志區域主導權，協商會議當中，俄國曾提議奧國放棄自波蘭所得到的土地，同時讓普國得到薩克森尼區，這無異增強普魯士在德意志區域的主導權，不僅加深奧普，甚至奧俄之間的矛盾。從奧地利的角度來看，普魯士與俄國的主張顯然破壞歐洲權力平衡，除普魯士地位大為提升之外，俄國若獲取整個波蘭，其地緣至政治影響範圍將向西延伸，並且迫近維也納。俄國雖然是奧地利對抗法國的重要屏障，但對其勢力不斷擴大，將可能危害自身國家安

⁷⁷ 蔡東杰，2006年，*西洋外交史*（台北：風雲論壇有限公司，2006年），頁18-19。

⁷⁸ Kaleve J. Holsti, *op. cit.*, pp. 120-121.

全。最後維也納會議對德意志的解決方案為，將拿破崙時代前的三百多個邦國，併成約三十個較大國家，並且組成德意志邦聯(the German Confederation)，目的在共同抵禦法國的侵略，又能夠以鬆散邦聯模式，阻止德意志的統一。這種設計既能夠制衡普魯士的軍事力量，以及奧地利的威望及正統地位，又能使成員國有足夠的力量抗衡法國，以維持歐洲和平秩序。⁷⁹

(二) 法國的地位

依據英國版本的歐洲權力平衡藍圖，英國、奧地利、普魯士以及德意志諸邦國應該結合成為一強大權力核心，一方面阻止法國再次向東擴張，另一方面則是遏制俄國勢力繼續向西延伸；從另一角度來看，英國亦居於關鍵平衡者角色，處於法國與奧地利，對抗俄國與普魯士等兩大集團中間，繼續遵循權力平衡的外交政策。歐洲國家體系更明顯地轉變為列強政治的形式，維也納會議所建立的「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體制，其目的是維持歐洲諸國王權支配體制的安定，並且依循權力平衡來維持列強間權力關係的安定。從會議進行的過程亦可看出，具備發言權的僅為戰勝的英國、奧地利、俄國、普魯士，以及戰敗的法國等五國，其餘國家如西班牙、波蘭、義大利諸邦以及德意志諸邦等，雖在對拿破崙戰爭貢獻良多，不過在維也納會議當中並沒有發言權。

法國雖是戰敗國，但在列強政治當中卻能得到發言權，主要還是歸功於英國主導以避免破壞歐洲權力平衡而成。1814年，英法俄普四國簽訂儲蒙條約(Treaty of Chaumont)，規定至少維持歐洲二十年的和平。翌年，四國與復辟後的法國波旁王朝簽訂第一次巴黎條約(First treaty of Paris)，內容主要是：(一)法國得以保持在1792年11月前的疆域，包括亞威農、維乃辛(Venaissin)、部分薩伏依、德意志與比利時，領土範圍相較革命前來得廣泛；(二)法國承認荷蘭、德意志各

⁷⁹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4), p. 81.

邦、義大利各邦以及瑞士的獨立地位；(三)除托巴哥(Tobago)、聖路西亞(St Lucia)、模里西斯(Mauritius)以及馬爾他以外，英國歸還法國殖民地；(四)聯盟國放棄賠償要求；(五)法國應承諾放棄奴隸買賣。⁸⁰此外，在拿破崙短暫的百日復辟之後，四國與法國簽訂第二次巴黎條約，除增添賠款外，法國疆域改以1790年為基準，並且各國聯軍將佔領法國北部和東部邊境十七個要塞，時間長達五年。簡言之，歐洲協調體制並非制裁侵略者，而是希冀建立一套制度，約束潛在競爭國家的行動，防止某國採取行動危害到其他同盟國的安全以及利益。⁸¹

在薩克森尼議題上，英國與奧地利反對俄國這項提議，會議形成英國與奧地利對抗俄國與普魯士的情況。對法國而言，普魯士的擴張與德意志的統一，本身就違背路易十四時期所執行的外交政策，紅衣主教李希留對東部德意志諸邦國一項採分而治之的政策，普魯士取得薩克森尼即享有巨大優勢，將會危急法國原本就脆弱的東部疆域安全，這一點法國就與奧地利的立場一致。法國在會議中主張神聖的正統原則(the sacred principle of Legitimacy)，將法國定位成拿破崙戰爭的受害者，而不是發起者，因此，法國不該被視為戰敗國家。同時法國亦認為，維持正統主義與波旁王室非但可保持國內穩定，亦可藉此爭取國外的保守力量的支持。⁸²法國便在四國間的矛盾衝突，以及消弭法國大革命的民族主義、自由主義思潮進一步擴大上，極力維護其大國的地位。

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維也納會議的安排乃是在法國周遭，特別是從東北到南部疆域建立起緩衝地帶，這道弧狀地帶目的在避免奧地利、俄國以及英國再次受到法國直接的軍事威脅，且若爆發軍事衝突，各國能具備足夠時間來回應。荷蘭統一之後能夠強化奧屬尼德蘭的安全地位，南邊恢復薩丁尼亞王國的意義也是一樣，希望能夠對法國構成阻力。更重要的是，為彌補喪失的波蘭領土，普魯士得到萊茵河西岸領土，即德意志內的西北地區，成為貫穿中歐(Mitteleuropa)的橋

⁸⁰ 王曾才編著，前引書，頁422-423。

⁸¹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00-101.

⁸² 蔡東杰，前引書，頁22。

樑。普魯士此次的領土改變，重要性不下餘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中的西里西亞，影響更為深遠的是其人口解構改變，從約三分之一的斯拉夫民族，變成近九成的德意志民族，而成為往後德意志區域統一的領導國家。

法國雖然利用各國間的矛盾而維持大國地位，但其領土被限制在古老的範圍，而不是從路易十四以來汲汲追求的天然疆域。而且，法國東疆面臨越來越強大的普魯士，甚至半世紀後原本防堵法國勢力擴張的普魯士，卻成為侵略法國的國家，恐怕是當時參與制訂歐洲協調體制的國家所始料未及。

第四節 小 結

學者郝斯悌(Kalevi J. Holsti)歸納 1715 年至 1814 年期間，西方國家的三十六場戰爭，其發生頻率（平均 2.8 年發生一場戰爭）與前一個世紀差不多，不過參與國家的性質卻不相同。十七世紀或是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前，大小國家都積極參與戰爭，直至十八世紀參戰國以大國為主，小國參戰只剩下那不勒斯、薩克森、薩伏依以及威尼斯等國家。⁸³易言之，西歐國家體系正逐步邁向大國，即華爾滋所謂的「極」(pole)體系發展。本章的三個歷史分期亦顯現出當時西歐國家體系主要成員的改變：1648 至 1715 年，歐洲大陸上主要的競爭對手為法國、英國以及西班牙、奧地利等哈布斯堡王朝，基本上以歐陸戰場為主；然而在後路易十四時期的 1715 年到 1763 年，法國與英國進行全球地緣政治的競逐，最後以英國獲勝並且確立全球海權地位，而且西歐國家體系亦不再僅限於西歐，北歐、中東歐所進行的大北方戰爭，俄國以新崛起姿態出現在國際舞台，並且逐步增強對西歐國家體系的影響力，更精確地說，使用歐洲國家體系形容這一時期，將會比西歐國家體系更為正確；本章最後一歷史分期從七年戰爭到拿破崙滑鐵盧失敗為止，維也納會議建立歐洲協調體制，法國仍然維持大國地位，而除英國、奧國與

⁸³ Kalevi J. Holsti, *op. cit.*, pp. 83-86.

俄國外，普魯士在國際地位的重要性逐漸增加。

綜觀這段歷史發展，法國最後未能成功，除反法聯盟的對抗因素外，戰場過於分散亦是關鍵，使得法國在海權與陸權兩面作戰下，無法聚集資源全力競逐歐洲大陸，反而處處受制於英國的海權。這些原因既是法國地緣政治的現實，亦是法國歷任政府想突破、追求主導海陸兩權的夢想。此外，西歐國家體系的運作邏輯具有三重性：體系成員間的承認政治與認同政治、體系內部的結構性競爭，以及體系對外部的不斷膨脹動力（1721年納入俄羅斯帝國、1783年包括美國、與奧圖曼土耳其衝撞）。⁸⁴隨著歐洲國家體系的膨脹，法國最理想的劇本乃是同時掌控海權和陸權，追求天然疆域的鞏固以維護國家安全，並擴及全球地緣政治影響力。然無論是路易十四或者拿破崙，均遭到其他歐洲國家的聯合反抗，致使法國必須同時面對來自東、西、南面的威脅。此外，法國的海外（海權）發展受制於歐陸戰爭，當法國領土同時遭受威脅時，則必須將有限的資源移轉來增建陸軍，如此一來將會減緩海軍艦隊的數量。特別在路易十五執政初期，法國將多數海軍軍艦除役，並且沒有增補新戰艦，主要在於前一世紀至當時的法國國債太多，法國財政無法支撐維持龐大艦隊所需的經費。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1648年到1815年這段時期，法國的外交和軍事行動背後隱含的地緣政治思維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無論是波旁王朝或者是拿破崙政權，都可以看到法國持續對東疆至南疆的關注，尤其是尼德蘭、萊茵河沿岸到義大利半島。這些與法國安全息息相關的關鍵地理區成為法國與英國、奧地利和普魯士等國家間的緩衝地帶，且法國的外交政策以及軍事擴張政策都會以此為考量。因此，這段時期法國執行權力平衡外交政策，希冀維持德意志以及義大利區域的分裂狀況，是最符合法國本身的地緣戰略需求，即當法國採行擴張政策時，這些地理區成為軍事前進碉堡，當法國居於守勢和劣勢時，亦可成為捍衛法國領

⁸⁴ 體系內的認同政治指的是主權國家間，承認彼此對於領域及其上的人民管理權。體系既定成員對於新成員承認與否，享有極大優勢，亦即給予承認或不承認變成一種權力，形成承認政治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張錫模，聖戰與文明：伊斯蘭與世界政治首部曲，頁 178-180。

土的堡壘。不過，法國海權的發展卻一直受制於英國，縱然在拿破崙執政時期仍然如此。擊敗拿破崙的英國將軍威靈頓曾對海軍軍官說：「想要瞭解拿破崙戰爭的歷史，我會告訴他，由於我們的海上優勢我才有能力維持我的軍隊，而這一點敵人卻做不到」。⁸⁵換言之，英國的兩棲作戰能力，即利用海路運兵登陸作戰，並利用海權優勢運補物資和人力，直至拿破崙戰爭後期才逐漸成熟，而這項優勢讓英國在歐洲競逐中持續扮演關鍵角色。

法國從路易十四時期便積極發展海權，以及拓展海外殖民地，然而十八世紀的七年戰爭挫敗於英國，法國喪失北美洲和印度殖民地和市場，英國也奠定其在海權的地位。法國雖在拿破崙戰爭中慘敗，但在 1815 年後的半世紀中，在許多方面仍然強於普魯士或哈布斯堡帝國。例如，法國國民所得超過這兩國，資金也充裕的多，人口也比普魯士多，而民族構成則比哈布斯堡帝國單純。法國的地理位置同時賦予戰略優勢以及劣勢，歷任領導者都想積極擴展地緣政治影響力，延續到後拿破崙時代亦是如此，不過不同的是，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法國將面對比奧地利更強大的陸權對手—普魯士，德意志統一成為當時乃至於現今影響法國地緣政治的關鍵。

此時期歐洲發生數次王位繼承戰爭，呈現傳統歐洲各政權複雜的聯姻關係。不過，各國之間的衝突、談判以及妥協過程可看出，釐清誰是正統繼承人並非各國關切要點。反而是如何取得地緣政治利益，或者避免他國取得優勢，成為各國介入與否的考量。法國打敗西班牙取得地緣戰略進展，解除西疆直接安全威脅，可在陸權全力對付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而且，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後，法西兩國統治者都屬於波旁家族，更拉近兩國關係，西班牙成為法國重要的同盟國家。因此，總結上述歷史，法國地緣政治密碼為：

全球層次與英國對抗；區域層次與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對抗；雙邊層次則與西班牙

⁸⁵ C. C. Lloyd, "Armed Forces and the Art of War—Navies," in C. W. Crawley(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IX—War and Peace in an Age of Upheaval 1793-1830*, p. 77.

牙合作。

第三章 法國地緣政治轉變--從理想到現實 (1815-1945)

1815 年之前，法國從路易十四到拿破崙崛起，都嘗試同時制霸海權以及陸權，突破天然疆界所帶來的限制，不過，法國的企圖遭致英國與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圍堵。本章將描述後拿破崙時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法國再次試圖主宰歐洲，但卻限於歐洲地緣政治現實，不得不轉向尋求盟國合作的過程。本章歷史分為三個時期：1815-1871 年、1871-1918 年、1918-1945 年：第一分期從拿破崙戰敗至普法戰爭為止，此時期歐洲在奧國主導下建立歐洲協調體制，受到革命的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思潮影響，歐洲地緣政治不斷受到衝擊，法國第二帝國時期企圖重新找回昔日光榮，最後受阻於普魯士。第二分期從德意志統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德國主導並建立俾斯麥歐洲體系，透過數個同盟條約圍堵法國。德國崛起衝擊法國地緣政治甚鉅，除海權受制於英國外，法國陸權更因為德國主導下受到箝制。然而，法國單憑己身之力無法突破困境，最後則是德國實行世界政策(Weltpolitik)，與俄國和英國產生直接的地緣政治衝突，法國得以突破圍堵，最後演變成協約國與同盟國兩大陣營對峙，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第三分期從兩次大戰期間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雖然是敗戰國，然而美國、英國以及法國等三國之間的地緣戰略歧異，以及奧匈帝國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瓦解，反使德國處於極佳的地緣政治地位。法國採取包圍態勢進行對德國的地緣戰略，但欠缺英國、美國以及蘇聯的合作下，成效相當有限，且無法遏阻希特勒德國逐步的地緣政治擴張，最後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一節 兩次革命與第二帝國(1815-1871)

一、革命前的法國國際關係

(一) 歐洲協調體制的運作與歐洲地緣政治衝突

後拿破崙時代所建立的歐洲協調體制，主要奠基於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以及四國同盟(Guadruple Alliance)。前者由俄國提出，從宗教與道德的角度出發，即在宗教上信仰基督，並且反對革命，希望藉由集體干涉，消除威脅王權的政治以及宗教的思想，俄國、普魯士和奧國首先簽署，英國亦表示支持，其他歐洲國家則隨之加入；後者由英國提出，主要受神聖同盟影響，希望能夠結合英國、普魯士、奧地利以及俄國等四國的力量，長期監督法國，並且預防拿破崙及其家族再起。¹簡言之，這兩者的目標都相同，希望能夠維持歐洲和平現狀，不過所採行的概念並不太一樣，神聖同盟著重危機處理，當危害歐洲和平的事件發生，特別是發生革命思想與活動的散播時，歐洲主要國家對其進行鎮壓。四國同盟則是著重在危機管理，亦即透過各國領導者之間的定期面會，交換意見等方式，防範危機於未然。

無論是神聖同盟或者是四國同盟，歐洲協調體制在運作過程當中，成員間亦存在著地緣政治衝突，英國以及俄國之間的衝突最為明顯。俄國、普魯士和奧地利等三國簽訂的「神聖同盟」，俄國希望能夠邀請更多國家加入，甚至希望能夠拉進美國，以抗衡英國的海權。因此，俄國於 1812-14 年的英美二次獨立戰爭當中，自願擔任調停人。²大北方戰爭結束之後，俄國即意圖從黑海、波羅地海持

¹ 張麟徵，*近代國際關係史*（台北：揚智文化，2002年），頁 32-34。

² C. W. Crawle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815-30," in C. W. Crawley(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IX—War and Peace in an Age of Upheaval 1793-1830*(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671.

續擴張其海權勢力，這過程當中最大的阻礙將會是英國，只不過單憑俄國一國之力並無法與英國抗衡。因此，除拉攏美國之外，俄國還希望能夠聯合法國、西班牙以及荷蘭等國，共同對抗英國海權。因此，當西班牙在中南美洲殖民地醞釀獨立運動時，1818年，俄國便提議以神聖同盟的名義介入拉丁美洲，然此提議遭致英國否決而作罷。此外，從1820至1821年，歐洲三大半島都爆發革命危機：西班牙革命(1820)、那不勒斯革命(1820)、薩丁尼亞革命(1821)以及希臘革命(1821)。俄國、普魯士以及奧地利根據1820年簽署的「特羅寶議定書」(Troppau Protocol)³組成的反革命陣線，將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予以合法化，英國和法國表示不贊成，並未簽署此議定書。

然而，各國因應歐洲革命的立場並非全然是道德層面，或者是主權不干涉的考量。以西班牙革命為例，奧國以及普魯士擔憂俄國派兵前往干涉，將使得俄國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從東歐延伸至西歐伊比利半島，普奧兩國最後不得不支持法國派兵前往鎮壓，避免俄國陸權的擴張。對於希臘革命（獨立運動）亦是如此，特別是英國與奧地利，深恐俄國勢力擴及巴爾幹半島，最後，英國與俄國於1826年簽訂聖彼得堡協議(the protocol of St. Petersburg)，約定兩國分別處理多瑙河公國問題以及希臘問題。俄國要求多瑙河公國恢復在1821年的自治狀態，並且維持俄國在此區的特權；英國則獨立處理希臘獨立問題，同意土耳其對希臘的宗主權，希臘可以組成自治政府，並且對土耳其納貢。⁴此外，排除俄國勢力延伸至西歐區域，並不意謂原有勢力的鞏固和擴張，奧國原本打算成立義大利聯邦，將整個義大利半島納入其地緣政治影響範圍，不過遭致法國以及薩丁尼亞的反對而未能實現。

歐洲地緣政治的複雜以及各國分歧的利益，更顯現在舊大陸與新大陸之間的關係。美國與歐洲各國並未存在直接的地緣政治衝突，西屬美洲殖民地醞釀獨立

³ 其內容為，一國因革命導致政府更替，如其結果威脅到其他國家，將自動從歐洲同盟除名，直到恢復法律秩序與安定為止。如情況直接威脅到他國，同盟國家可以和平或武力方式，將此犯錯國家帶回同盟懷抱。

⁴ 張麟徵，前引書，頁54-55。

運動，正好給予舊大陸國家介入機會，將會對美國造成威脅。就英國而言，援助西班牙鎮壓拉丁美洲獨立運動，使其繼續維持西屬殖民地的話，就能夠阻止美國進一步向南延伸地緣政治影響力，如此作法符合英國自身國家利益。然而，西班牙自身發生內戰亦引起神聖同盟是否直接軍事介入的討論，若歐洲國家直接介入西班牙內戰，其拉丁美洲殖民地極可能落入其他國家的勢力範圍，這不是英國所樂見，單就這點來說，英國與美國的立場一致。而且，西屬殖民地若成為獨立國家，有助於英國擴張海外市場。因此，當時美國總統門羅(James Monroe)在 1823 年 12 月 2 日對國會發表的咨文內容提出門羅宣言，反對歐洲列強介入美洲事務，任何的介入皆視為不友善行為，美國承認美洲既有各殖民地的獨立，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美國絕不介入歐洲大陸事務。同年，英國亦聲明承認一切歐洲事實上的政府為合法政府，不干涉其內政，同樣地，也不會干涉歐洲列強在美洲的現有殖民地與附屬國，但也不允許歐洲各國將不同的政治制度強加給美國。⁵簡言之，當時最強大的海權國家背書之下，英美兩個過去的敵對國家對西屬美洲殖民地採取共同立場，讓美國以及美洲能夠獨立於歐洲國家的干涉，俄國希冀納入美國以共同抗衡英國海權的想法，亦受破壞而未能實現。

（二）法國恢復大國地位與地緣戰略

1823 年，西班牙保皇派政變失敗，法國堅稱其在西班牙境內的權利，決意出兵西班牙。不過，除俄國公開表示支持外，普魯士與奧地利僅止於道義支持，未提到任何物資援助，最後僅承諾在西班牙出兵的前提下願意支援法國。前文曾提及，普魯士和奧地利兩國之所以同意法國介入西班牙內戰，乃因怕若俄國介入西班牙內戰的話，將需派軍隊跨越歐洲大陸，這並非歐陸國家所樂意見到。實際

⁵ C. W. Crawle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815-30," in C. W. Crawley(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IX—War and Peace in an Age of Upheaval 1793-1830*(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682.

上，這事件可看出法國在外交以及軍事上已經享有自主性，並且法國已經恢復大國地位，扮演影響歐洲權力平衡的重要角色。西班牙內戰所帶來的革命思潮，首當其衝定會影響法國，兩國僅以庇里牛斯山相隔，政權又皆屬於波旁家族，因此，法國自然對西班牙政局格外關切。然而，其他歐洲國家擔憂地不僅僅是兩國的密切關係，同時亦擔憂法國藉此將影響力擴及到西屬美洲殖民地，致使英國、美國採取共同立場，反對歐洲舊大陸干涉美洲新大陸，最後迫使法國分別向英國以及美國承諾，願意接受門羅宣言的內容。

伊比利半島的局勢提供法國重回國際舞台的機會，而巴爾幹半島局勢則讓歐洲協調體制名存實亡，法國再次成為歐洲地緣政治重要行為者以及平衡者。土耳其人從十四世紀征服歐洲巴爾幹半島並將其納入版圖，此外，整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尚涵蓋近東區域，即現今的中東以及北非區域，而東地中海幾乎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內海。法國曾在拿破崙領軍下佔領埃及，目的為搶奪東地中海的制海權，切斷並打擊英國海上貿易。俄國與土耳其兩國從 1806 至 1812 年期間即頻繁交戰，1812 年簽訂的布加勒斯特條約(Treaty of Bucharest)中，俄國取得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英國受到拿破崙佔領埃及的衝擊，認知東地中海地緣戰略位置的重要性，於 1815 年後取得馬爾他(Malta)和愛俄尼亞群島(Ionian Islands)的軍事基地，確保地中海的制海權。爾後歐洲地緣政治的發展，因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衰弱所衍生的東方問題，直接牽涉到奧地利、法國、英國和俄國等四國在地中海和巴爾幹半島的地緣政治利益。普魯士雖無直接地緣關聯，但其歐洲國家大國地位，普魯士在東方問題上具有發言權。

其中，俄國亟欲擴張勢力至巴爾幹半島的企圖明顯，俄國與巴爾幹半島地緣政治關係密切，特別是在宗教以及種族方面，俄國藉著相同的因素，宣稱為巴爾幹基督教徒以及斯拉夫民族的保護者。俄國目的在獲得黑海控制權，或至少維護黑海航路的通暢不受阻礙。⁶當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勢力強大以及前進歐洲擴張

⁶ René Albrecht-Carrié,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New York : Harper & Row, 1973), pp. 41-43.

時，奧地利即不斷遭受威脅，甚至首都維也納亦多次遭土耳其軍隊包圍，從這點來看，俄國與土耳其發生多次戰爭，奧地利支持俄國，這因其跟俄國在阻止土耳其擴張上具有共同立場。然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勢力開始衰弱時，俄國試圖瓜分土耳其帝國版圖，並且暗中支持希臘革命，將勢力延伸至巴爾幹半島等作法，這對同樣是多民族組成的奧地利而言是一大威脅，奧國特別擔憂發生骨牌效應。因此，奧國一方面遊說俄國放棄支持希臘革命，一方面則是聯合英國，奧國的政策與英國的近東政策相似，兩者希冀維持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現狀，反對俄國勢力進一步延伸至巴爾幹半島。⁷

法國與巴爾幹半島並無直接的地緣政治關聯，然而希臘革命與衍生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瓜分危機，卻是構成法國地緣戰略的部分。根據當時法國政府的計畫：瓜分鄂圖曼帝國的領土，讓希臘獨立並擁有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內的廣大領土，希臘國王由低地國(the Low Countries)國王出任；俄國獲得幾個多瑙河流域公國以及鄂圖曼帝國在亞洲的領土，領土範圍擴及海峽；瓜分低地國領土，殖民地歸英國、荷蘭歸普魯士以及比利時歸法國；普魯士可獲得薩克森尼，而薩克森王則獲得普魯士在萊茵河西岸領土為補償；奧地利則是取得波士尼亞與塞爾維亞。⁸簡言之，法國將巴爾幹危機當成重組歐洲權力版圖的機會，重新瓜分低地國以及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並且利用領土補償原則滿足並維持大國間權力平衡狀態。從這過程當中，法國希望建立自身與俄國和普魯士兩國之間的緩衝區域，巴爾幹的希臘以及萊茵河西岸的薩丁尼亞成為法國地戰略重要的一環。

因此，法國透過外交向土耳其施壓，說服土耳其與俄國簽訂阿克曼(Ackermann)條約，土耳其同意從多瑙河兩個公國撤軍，承諾沒有得到俄國的同意，不可罷免該公國貴族選出之大公(Hospoder)，此外，土耳其亦允許俄國在黑海以及其海峽進行貿易，並給予塞爾維亞自治。希臘爆發獨立革命時，法國便要求與英國以及俄國共同介入，以多邊談判的方式強迫土耳其與希臘停火，三國於

⁷ 張麟徵，前引書，頁 51-52。

⁸ René Albrecht-Carrié, *op.cit.*, pp. 47-48.

倫敦簽訂條約，同意土耳其為希臘宗主國。然而，鄂圖曼土耳其拒絕接受三國斡旋，迫使法國與英國、俄國共同參與地中海那瓦里諾海灣(Navarino Bay)封鎖行動，並且戰勝土耳其以及埃及的艦隊。1828年，俄國正式向土耳其宣戰，在法國折衝下，三國的分工狀況如下：俄國的軍事行動僅限於歐陸，即多瑙河流域一帶，在任何情況下俄軍都不會進入地中海；英國艦隊駐守地中海，除防止土耳其海軍外，亦防範俄國勢力南下至地中海；法國則負責摩瑞亞(Morea)地區的綏靖行動，必要時可調用英國海軍。⁹最後土耳其戰敗，並且承認希臘獨立。簡言之，法國利用希臘獨立事件的英俄歧異，在外交上恢復關鍵平衡者、調解者角色，雖然整體歐洲地緣政治並未如法國所願變動，但最終結果仍對法國有利，歐洲協調體制亦可說實質終結。

二、1830年和1848年兩次革命與歐洲地緣政治

(一) 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歐洲地緣政治變動

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及拿破崙崛起，使歐洲各地吹起一陣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風潮，更導致保守份子組成神聖同盟應付。1830和1848年兩次革命，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思潮蔓延至歐洲各地，傳統王權國家疲於奔命地鎮壓革命，最終致使一手安排歐洲協調體制的梅特涅下台。然而，革命或反革命陣營所構成的歐洲地緣政治不斷變動，縱使是反革命神聖同盟間，也如同前面所提，內部存在許多矛盾與衝突，無論支持或反對革命的國家，皆難以釐清地緣政治利益以及道德訴求孰重孰輕，最後呈現的歐洲地緣政治變動圖像仍然是大國權力平衡、地緣戰略的考量。法國大革命遺留的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1830年革命後再次影響

⁹ Jean-Claude Allain, et al (els), *Histoire de la Diplomatie Française II—De 1815 à nos jours*. (Paris: Editions Perrin, 2007), pp. 35-37.

歐洲大國間關係。支持與反對革命的立場將切割歐洲為英法跟俄普奧兩大集團，前者同情甚至支持各地的獨立運動，後者則反對並主張干涉革命的自由。1827年開始法國遭受到長期的農作歉收，造成物價上漲，經濟不景氣，里昂、巴黎等都會地區出現許多失業工人。1830年7月，巴黎出現群眾暴動，開始攻擊士兵以及佔領政府機關，最後查理十世被推翻，改由奧爾良公爵，即路易腓力(Lois Philippe)擔任法國國王。俄國與奧國雖然表示關切，但除非法國過度干預其餘歐洲國家而影響歐洲均衡態勢，這些國家大致維持不干涉立場。

法國革命風潮蔓延到歐洲其他地區，引起包括比利時革命、波蘭革命以及義大利半島革命等，德意志區域雖相對保守，並未發生革命，不過民族主義意識型態開始發酵，而有德意志關稅同盟的提出。這些事件不斷衝擊歐洲傳統王權與多民族組成國家統治正當性，歐洲地緣政治在這些支持和反對革命的國家角力間變動，使得原有歐洲權力平衡關係更加複雜。

比利時直接受到法國革命衝擊，境內反對者基於宗教信仰、語言以及租稅政策等差異，反對荷蘭統治，並於1830年10月4日主張比利時獨立。比利時的這項變動直接挑戰1815年歐洲協調體制，普魯士、奧國和俄國主張武力干涉，但這首先面對法國的抗拒，以及英國的可能反對。前文曾提及，各國於1815年合併荷蘭與比利時的主要用意，乃是要阻止法國可能的擴張侵略，英國則藉此捍衛漢諾威安全，並且避免商業利益遭受威脅。英國基於自由主義立場而同情比利時革命，然若考量地緣政治利益，則又得擔心建立的歐洲平衡狀態受到破壞，亦即，法國的立場將牽動英國的作為，法國單方面或者是與普奧俄三國共同行動，軍事干預比利時革命的話，英國將無法坐視不管。於是，當荷蘭軍隊入侵比利時，法國派軍援助時，英國不得不與俄普奧三國共同施壓，迫使法國撤退軍隊，1839年比利時以中立國身份獨立。

比利時獨立運動之所以成功，部分得利於波蘭與義大利半島亦發生革命，各國基於各自地緣政治考量，比利時革命反成為次要問題。波蘭爆發革命轉移俄普奧三國的注意力，相較於比利時地緣位置，波蘭的局勢更讓這三國關切。當波蘭

獨立軍要求北至波羅地海、南到黑海和喀爾巴阡山，東到聶伯河(Dnepr River)的領土外，更要求波蘭版圖應擴及立陶宛、白俄羅斯以及烏克蘭等國，波蘭的要求牽涉到俄普奧三國，在其他兩國支持下，俄國出兵強力鎮壓，結束波蘭革命運動。

¹⁰另一方面，義大利半島亦爆發獨立革命，奧國則在其他國家默許下出兵鎮壓，結束義大利半島的革命。簡言之，此時各地爆發的獨立無法自絕於地緣政治影響，列強劃分的勢力範圍大致如下：波蘭屬於普奧俄三國、義大利半島屬於奧國、比利時屬於法國。

德意志各邦國的分裂不僅是政治以及宗教，甚至經濟方面亦呈現分裂局面，即各邦國享有獨立的財稅制度，且採行保護主義政策。德意志區域受奧國嚴厲管制下並未產生類似其他地區的獨立運動，鬆散的德意志同盟也僅是普魯士與奧國爭奪領導權的領域。普魯士以關稅同盟形式整合德意志中部各邦國，直至 1844 年時，除奧地利、漢諾威、奧登堡(Oldenburg)、梅克林堡(Mecklenburg)等外，全部德意志邦國皆已加入關稅同盟，為爾後德意志政治整合奠定經濟基礎。¹¹

（二）兩次革命期間與法國地緣戰略(1830-1848)

事實上，從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法國主要面對三個陸權國家（俄普奧）與一個海權國家（英國）。過去幾世紀法國不斷與英國和奧國衝突，至十九世紀歐洲爆發多次革命以及意識型態緣故，法國與英國、法國與奧國這兩組關係不再是單純對抗，亦可能產生合作關係。1830 年革命後，從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來劃分歐洲地緣政治的話，¹²可以粗淺地用萊茵河為界，呈現西方自由主義（英國

¹⁰ Gordon Craig, "The System of Allianc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J. P. T. Bury,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X—The Zenith of European Power 1830-70*(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46-251.

¹¹ James Joll, "Prussia and the German Problem, 1830-66," in J. P. T. Bury,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X—The Zenith of European Power 1830-70*, pp. 494-495.

¹² 民族主義意指各個民族爭取統一和獨立的運動，自由主義則包含代議制度、個人自由以及司法改革等等。

與法國)對抗東方保守主義(俄普奧三國)的圖像,然而標榜自由主義國家卻不見得支持所有民族獨立運動,這讓此時期的歐洲地緣政治愈顯複雜。兩個集團內部絕非鐵板一塊,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法國雖在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層面與英國一致,甚至法國、英國、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等四國組成新四國同盟,以對抗舊神聖同盟,不過若遇上地緣戰略的衝突,法國政策選擇亦可能與英國從合作變成對抗。

路易腓力政府與過去法國政府不同的是,政策上轉變為法英、法奧合作的地緣戰略,而非循著過去與這兩個國家海、陸權對抗模式,而俄國則為這三個國家合作的最大公約數。因此,當土耳其與埃及爆發戰爭,俄國希冀藉此介入並擴張勢力到地中海時,法國選擇與英國合作以阻絕俄國勢力於地中海之外。第一次土埃戰爭(1832)肇因於埃及在希臘革命時派軍援助土耳其,之後埃及要求敘利亞領土以回報,但遭土耳其拒絕而引發戰爭。埃及軍隊獲勝並且進逼君士坦丁堡,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生存與否端賴歐洲各國立場,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法國與埃及的密切關係源自拿破崙時代,同時,埃及亦是英國與印度之間帝國生命線的重要戰略要地。奧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在中東歐而非地中海區域,種種這些因素將土耳其推向俄國,後者也著眼地緣政治考量而極力介入。對俄國而言,君士坦丁堡與海峽的地理意義,宛如比利時對於法國、義大利半島對於奧國以及中南美洲對於美國一樣。換言之,俄國不樂見國外勢力進入自家後院,最好能夠掌控衰弱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並使其成為附庸國,一旦土耳其遭受瓜分,對俄國整體來說是不利。¹³最後在三國干預下,土耳其與埃及簽訂庫塔亞(Kütahya)條約,埃及獲得敘利亞全部,而且俄國雖受到英法聯合阻擾,但最終仍然獲得實質的地緣戰略利益。¹⁴

第一次土埃戰爭的結果成為第二次土埃戰爭(1839)的導因,不過不同的是,

¹³ 張麟徵,前引書,頁85-86。

¹⁴ 俄國與土耳其簽訂恩機亞-史開來西(Unkiar-Skelessi)條約,約定兩國在戰時互相援助,土耳其在達達尼爾海峽封鎖他國船隻,俄國軍艦可以自由進出或登陸海峽,並於黑海享有完全的自由。請參閱張麟徵,前引書,頁87。

法國與英國從合作關係轉為敵對關係。土耳其發動對埃及的戰爭乃因對第一次土埃戰爭結果感到恥辱，然戰爭結果亦是土耳其戰敗。依據土俄兩國所簽訂的條約，俄國將可依條約內容出兵援助，但如此作法則是直接違反法國以及英國的利益。不過，英國此次卻一反前次與法國合作的立場，反而聯合俄國、奧國以及普魯士等國施壓，迫使埃及和法國接受各國妥協的條件，即維護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領土完整，埃及統治者保有世襲權並統治敘利亞南部，不過需歸還敘利亞北部領土以及將土耳其艦隊釋回。英國的作法著眼於全球地緣政治利益，尤其從 1833 年到 1839 年期間，蒸汽船於紅海以及幼發拉底河試航成功，就英國來說，東北非和中東區域對其聯絡印度次大陸的航線重要性不言可喻，自然不希望埃及或俄國掌握紅海以及幼發拉底河流域。¹⁵因此，埃及與法國的特殊關係，或者是俄國介入土埃戰爭而掌控此區域都不符合英國利益，英國便以多邊形式結合各國迫使法國和埃及接受。¹⁶

整體而言，法國的地緣戰略主軸乃要突破 1815 年歐洲協調體制，恢復法國做為歐洲大陸平衡者的地位，然而，法國與英國基於意識型態的合作立場並不長，兩國間的地緣政治衝突仍然存在。特別是在英國主導的歐洲國家體系之下，假若法國被認定為破壞歐洲權力平衡 或者威脅英國東地中海地緣政治利益的主要國家的話，反法同盟將再次結合以抗衡法國。

三、法國第二帝國(1852-1871)

(一) 民族統一運動與歐洲地緣政治變動

¹⁵ Gordon Craig, "The System of Allianc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J. P. T. Bury,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X—The Zenith of European Power 1830-70*, p. 255.

¹⁶ 英國主導整個土埃衝突的解決，不過仍有賴於俄國的妥協，並未真正實踐土俄條約內容。俄國的地緣政治考主要是在最終附加條約中，即和平時期土耳其海峽禁止各國軍隊進入，除土耳其參與戰爭，同盟國才可以進入。這項條約能夠保證俄國在黑海領土的安全，縱然俄國在中亞、印度與英國發生衝突，只要土耳其未涉入，就可以避免英國從海峽侵入黑海報復。

1848年2月，法國再次爆發革命並且推翻路易腓力政府，建立法國第二共和。拿破崙姪子路易·拿破崙(Louis-Napoleon Bonaparte)原當選為制憲大會代表，其參與當年12月份總統大選獲勝，1852年時將法國第二共和改建為法國第二帝國，遂行自己的政治野心，以拿破崙的繼承人自居，自稱拿破崙三世。此時期歐洲地緣政治受到革命所散佈的民族主義思潮影響，波蘭、義大利與德意志分別爆發民族獨立和統一運動，雖然波蘭以失敗告終，但後兩者則成功地統一建國，三個事件都衝擊歐洲地緣政治。

1863年，波蘭爆發獨立革命，對俄國而言，若依據波蘭人的獨立主張，其版圖將從維斯杜拉河口和多瑙河口開始，一直延伸至第聶伯河的斯摩林斯克和基輔，如此一來，俄國的政治地理完整性將受到破壞，其勢力範圍將退回至亞洲領土。¹⁷對德意志諸國而言，波蘭的獨立和統一，將使德意志區域遭受兩面包圍的情勢，這是普魯士和奧國所不願接受的地緣政治變動。對法國而言，波蘭從十七世紀以來即為抗衡哈布斯堡王朝的重要盟國，直至大北方戰爭結束後波蘭國力式微，並且遭受俄普奧三國多次瓜分。法國雖基於天主教以及同情民族主義為理由，原想要聯合英國共同介入波蘭革命，但在英國不配合、且遭遇普奧俄三國聯手阻擾而作罷，翌年，波蘭革命以俄國軍隊鎮壓結束。法國於此事件的作法逾越過往跟俄國的默契，壓縮法國第二帝國與俄國合作的外交空間。

另一方面，雖然義大利半島一直屬於奧國的地緣政治勢力範圍內，受限於英國和普魯士，法國遲未能突破東北疆以及萊茵河之天然疆域限制，於是注意力轉向南邊義大利半島。薩丁尼亞主導義大利統一過程當中，理解奧國雖然是最大阻礙，不過若獲得法國支持，義大利統一更可能實現。1858年，法薩達成協議，同意組成義大利聯邦，法國將從中獲得尼斯和薩伏依兩地做為酬庸。¹⁸義大利半

¹⁷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9.

¹⁸ 義大利聯邦由四個王國組成：薩丁尼亞與奧地利屬地組成北義大利王國(The Kingdom of Upper Italy)；義大利中部成立另一王國；教皇維持原來統治版圖；那不勒斯王國繼續存在。教皇為

島雖然不是法國傳統地緣政治關注區域，然而與萊茵河區域意義相同，即產生一個統一的國家終究使法國南疆受威脅，法國基於同盟關係而出兵介入薩丁尼亞與奧國戰爭，卻得注意萊茵河東岸普魯士的動態，畢竟法國無法同時應付南與東兩個不同陣線，因此轉而與奧國妥協，繼續維持義大利半島分裂的狀態。然而，1861年，義大利王國的成立終結半島分裂狀態，義大利半島統一並成立新國家的地緣政治意義有三：首先，奧國無力阻擋傳統勢力範圍的統一行動，新國家建立的既定事實，已削弱奧國在義大利半島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其次，英國一向支持在義大利半島建立更強大的國家，但不是成為法國的附庸國，而是可以獨立且抵制法國勢力進入地中海的國家；第三，義大利統一鼓舞德意志區域民族主義份子，促使德意志統一並且衝擊整個歐洲地緣政治。

前文曾提及普魯士成立關稅同盟成效良好，受到義大利成功統一的激勵，普魯士繼續推行小德意志政治統一計畫，排除奧國並建立統一的德意志國家。普魯士必需克服地緣政治幾大阻礙：北邊丹麥、南邊奧國以及西邊法國。德意志與丹麥之間因易北河流域斯萊士威克(Schleswig)與荷爾施泰因(Holstein)等兩個公國雖以丹麥為宗主國，不過前者全屬德意志民族，後者南部地區亦屬於德意志民族。這兩個公國地理位置毗鄰波羅地海，英國、俄國以及法國都認為應由丹麥管理，避免波羅地海出海口掌控在單一國家手上。然而，隨著船隻普遍使用蒸汽動力取代傳統風帆，英國船艦建造不再需依賴波羅地海的木材供應，打造船艦的基本材料亦從木材轉變成鐵材；此外，俄國亦是以小麥為大宗出口，取代過去的木材，其經濟重心從波羅地海轉移至烏克蘭，俄羅斯的海上航線亦從丹麥與瑞典間的桑德海峽，移轉至土耳其的博斯普魯斯與達達尼爾海峽。¹⁹因此，普魯士以此藉口發動丹麥戰爭(1864)，尚未引起周遭大國的軍事介入。

普奧戰爭(1866)以及普法戰爭(1870-1871)的結果完成普魯士建國大業。從地

義大利聯邦的主席，然而北義大利聯盟才是真正主導者。請參閱 René Albrecht-Carrié, *op.cit.*, p. 100.

¹⁹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p. 12; Michael Lewis, "Armed Forces and the Art of War: Navies," in J. P. T. Bury(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X—The Zenith of European Power 1830-70*, p. 275.

緣政治角度來看，雙方均試圖主導德意志統一的版本與過程，普魯士與奧國的衝突難以避免，法國將在衝突中扮演關鍵角色。因此，普魯士承諾以比利時和萊茵河區為補償，換取法國同意在普奧戰爭過程維持中立，同時，普魯士亦與義大利建立同盟關係，牽制奧國軍隊於阿爾卑斯山以南。最後普魯士以戰備、運輸和通訊系統的優勢擊敗奧國，並積極準備對法國的戰爭。普法戰爭的過程凸顯法國外交孤立的國際現實，戰爭前法國意圖併吞比利時、盧森堡之舉動，使英國對其防範；法國對波蘭革命的同情與立場，早已推開法國與俄國外交合作空間；奧國內部進行改革，對外亦不願意介入法奧戰爭。最後法國戰敗並簽訂條約，割讓亞爾薩斯與洛林，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國在凡爾賽宮的明鏡殿正式成立，終結法國第二帝國，自此歐洲出現一個新興民族國家，衝擊法國、甚至整個歐洲地緣政治，。

（二）法國全球地緣政治影響力的擴張

拿破崙三世的法國主張「秩序與光榮」(l'ordre et la gloire)，即維護國內穩定秩序外，法國需要找回過去的光榮。法國從未停止在歐洲大陸追求更大影響力，同時，法國第二帝國亦積極發展海外殖民，擴張其全球地緣政治影響力。這過程當中，法國與英國常常處於合作與競爭，一方面兩國共同對俄國發動克里米亞戰爭(1854-1856)，阻止俄國勢力擴及東地中海，另一方面則在全球各地拓展殖民，進行另一輪的海外殖民競爭。

克里米亞戰爭源於俄國要求土耳其境內東正教徒的宗教以及行政控制權，此要求與國家主權原則衝突，土耳其雖在宗教權讓步，不過不為俄國接受，進而引爆土俄戰爭。俄國曾對英國以及奧國提議分裂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版圖，成立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兩國，俄國取得博斯普魯斯海峽、奧國取得達達尼爾海峽的管轄

權，英國可獲得埃及與克里特島(Crete)，但此提議遭英國斷然拒絕。²⁰俄國從大北方戰爭後想要瓜分土耳其，並繼續擴張歐洲地緣政治影響力的企圖受到抵制，此次土俄戰爭顯露俄國同時遭受陸權以及海權雙面包圍，普魯士與奧地利擁有阻止俄國勢力進入巴爾幹半島的共同利益，法國以及英國則是藉由海權阻止俄國勢力進入東地中海，兩國還以海路運輸兩棲作戰方式，將戰場帶入俄國領土—克里米亞，最後成功擊敗俄國，俄國勢力從多瑙河、黑海等區域退回本土。積弱的土耳其變成英國、法國與俄國的緩衝國。

法國對地中海區域一直存有興趣，包括經濟或者是戰略的利益，不過常會跟英國產生競爭與合作關係，法英共同阻止俄國勢力進入東地中海即是一例。除埃及以外，法國與阿爾及利亞關係從 1789 年法國大革命開始，當時阿爾及利亞供應法國軍隊糧食。²¹1830 年，法國征服並且將勢力進駐於北非阿爾及利亞，普奧俄等歐陸國家與地中海並無直接的地緣政治關係，英國雖不贊成法國的舉動，但並未大力阻擾，直至 1842 年時，英國政府已經默認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歸屬權，法國於 1858 年建立阿爾及利亞殖民政府。法國於東地中海亦獲得進展，1854 年在官方支持下籌資成立蘇伊士運河公司，進行開鑿運河工程，期間雖受到英國阻擾而曾停工，在英法彼此諒解且不將運河做為政治利益用途下復工，1869 年蘇伊士運河完工。²²

此外，法國積極尋找在太平洋與印度洋的貿易站以及地緣戰略地點，例如 1841 年佔領馬達加斯加島北端諾西北(Nossi-Bé)港、非洲莫桑比克海峽中的馬約特島(Mayotte)。²³法國循著地中海—紅海—印度洋的海路，延伸其全球地緣影響力到中南半島和東亞，著重在貿易和經濟利益，主要從馬賽(Marseilles)、南特(Nantes)跟波爾多(Bordeaux)等港口到各殖民地以及貿易站，絲製品為此時期法國

²⁰ René Albrecht-Carrié, *op. cit.*, pp. 86-87.

²¹ H. L. Wesseling, Diane Webb(tran.), *The European Colonial Empires 1815-1919*(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4), p. 88.

²² 法國人擁有蘇伊士運河的控制權，一直到 1875 年，英國政府購得埃及股票並取得控制權。

²³ Jean-Claude Allain, et al (els), *op. cit.*, p. 71.

重要的進口商品。²⁴亦即，從經濟邏輯的角度來看，法國與英國具有共同利益，而不至於產生地緣政治的直接衝突，因此才會有英法聯軍(1856)共同擊敗清帝國，共同奪取經濟利益。法國亦在中南半島建立殖民地，1858年入侵安南(Annam)，1863年柬埔寨成為法國的保護國。

法國第二帝國試圖恢復過往在美洲大陸的影響力，利用美國內戰期間(1861-1865)，墨西哥爆發財政危機且拒絕償還外債、沒收外國公司資產之際，法國出兵墨西哥。法國的作法並未獲得其他歐洲國家直接援助，出兵干涉行為已抵觸美國門羅主義，於是美國內戰結束後立即對法國施壓，而單憑法國一己之力無法與美國抗衡，不得不撤軍並放棄先前成果。法國雖然藉著北美權力真空時期擴張美洲影響力，然而一旦美國內戰結束，絕不會對中南美洲的外國勢力坐視不管，法國在欠缺海權國的支持下勢必讓步。

總體而言，法國第二帝國未能主導歐洲地緣政治發展，甚至因德意志統一而結束帝國。不過，此時期法國海外殖民除出兵墨西哥以失敗收場外，其餘可算相當成功，法國依靠這些殖民地繼續維持其全球地緣政治影響力，直至下一個世紀。

第二節 德意志統一與第一次世界大戰(1871-1918)

一、德國崛起對法國地緣政治衝擊

(一) 俾斯麥體系的建立(1870-1891)

俾斯麥體系指的是在德國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主導下所形成的歐洲國家體系，其特色為管理兩個歐洲可能的衝突：法國向德國復仇、奧匈帝國與

²⁴ H. L. Wesseling, *op.cit.*, p. 112.

俄國在巴爾幹半島爆發軍事衝突，這兩者若發生對德國皆會產生不利影響。德國擔心法國的報復不是沒有理由，1873年時，法國經濟已從戰爭中復甦並且償還50億法郎的鉅額賠款，德國軍隊沒有理由繼續進駐在法國領土。而且，法國視軍事失敗和割讓領土為恥辱，法國對德國的軍事報復可能性相當高。²⁵因此，德國藉由保守主義意識型態，希望再次恢復德國、奧匈以及俄國之三國神聖同盟關係，目的即在孤立法國。

德國藉著三個同盟關係建立並主導歐洲國家體系：德奧同盟(1879)、三皇同盟(1881)以及三國同盟(1882)關係。德國選擇與奧匈締結同盟關係乃基於地緣政治的親近性(*proximity*)，奧匈帝國以及俄國作為外交同盟的選項，奧匈帝國毗鄰德國，若其與法國或英國合作，遠勝於俄國跟法國或英國合作，對德國影響來的大。奧德同盟是防禦同盟關係，主要目標為預防奧國或俄國等任何一方進行軍事侵略，條約規定：如果俄國攻擊同盟國之中的任何國家，另一個同盟國保證全力赴援；如果締約國之一受到另一國的攻擊（例如法國攻擊德國），則其同盟國應該保持善意的中立，如果俄國支援攻擊國，則適用條約中條款的規定。²⁶換言之，德國向俄國傳遞的訊息為，如果出兵攻擊奧匈帝國的話，將會遭遇德國與奧匈聯合抵抗；同時，德國亦向奧匈傳遞另一訊息，即若由奧匈先行攻擊的話，將遭遇被孤立的命運。

三皇同盟則是德國、奧匈以及俄國建立的同盟關係，德國提出奧匈以及俄國雙方都能夠接受巴爾幹妥協方案，由塞爾維亞與巴爾幹半島現行邊界向南劃一條界限，劃分巴爾幹半島成兩個區域，分別屬於奧匈以及俄國的勢力範圍，彼此亦承認其在勢力範圍內可自由行動。三皇同盟條約主要內容包括：同盟國若發生戰爭其他兩個同盟國將採取中立，維持土耳其在歐洲的領土不變，明確承認俄國對海峽的關切，如土耳其在關閉海峽採取差別待遇，將視之對受害同盟國作戰，土耳其領土完整則不受到保證，這點具有排除英國對海峽企圖的用意；奧匈帝國有

²⁵ René Albrecht-Carrié, *op.cit.*, pp. 164-166.

²⁶ *Ibid.*, pp. 177-179.

權利兼併波士尼亞及赫爾塞哥維那。²⁷簡言之，三皇同盟滿足俄國對黑海的安全需求，俄國無法於海峽駐軍，其他國家亦無法派遣軍隊進入海峽，免除俄國害怕英國藉黑海中立化而侵入領土的威脅。

至於三國同盟，乃由德國、奧匈以及義大利組成，主要是要預防義大利遭受法國侵略，但真正目的則是將義大利中立化，避免立場偏向法國或是英國。三國同盟條約規定，如果法國侵略義大利，德國與奧匈保證援助義大利。值得注意的是，義大利亦聲明三國同盟條約無論在何種情況，都不能夠用於對付英國。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義大利與奧匈和法國都有共同邊界，義大利區域在歷史上都受到這兩個國家影響，與其中之一的國家結盟相當合理。然而義大利為地中海環繞的半島國家，直接面對英國在地中海的海權勢力，額外的對英國善意宣言，有其地緣政治意義，以及不得不妥協的理由。

最後在 1887 年，德國與俄國簽署再保證條約(Reinsurance Treaty)，兩國約定除非德國攻擊法國、或俄國攻擊奧國，否則締約國與第三國發生戰爭時，另一國將堅守善意中立。此外，德國再次承認俄國在巴爾幹半島的特殊權利，以及重申關閉海峽的相關規定。²⁸德國於再保證條約的附加條款進一步向俄國保證，不阻止俄國取得君士坦丁堡，並協助俄國增加在巴爾幹的影響力。德國急於鞏固同盟關係，並且孤立法國的種種複雜作法，終究無法解決各國間地緣政治衝突，各國外交空間愈受壓縮，導致體系的瓦解與衝突的再起。

(二) 法國地緣政治困境與突破(1871-1891)

英國歷史學家泰勒(A. J. P. Taylor)認為，法國主宰歐洲的優勢在 1870 年已經終結，繼之三十年的和平時期後，德國成為歐洲潛在的征服者。德國主導的俾斯麥體系幾乎將法國排除在外，與過去英國主導的反法同盟不同，俾斯麥體系形成

²⁷ 張麟徵，前引書，頁 298。

²⁸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pp. 322-323.

陸地包圍法國之勢；由於英國選擇光榮孤立，不直接涉入歐洲大陸事務，並未對法國造成海權和陸權包夾的情勢。事實上，法國突破困境的同盟選項不算多，最佳者為英國，其次為奧匈以及俄國，德國經由德奧、三皇和三國同盟條約所建立的歐洲國家體系維持二十年，亦即，只要這些條約繼續存在，法國想要突破地緣政治的困境相當困難。不過，這些條約隨著各國間地緣政治衝突升高，而難以繼續維持，特別是德國政策的轉變使得原本隱藏在同盟條約下的地緣政治衝突浮出檯面，引發一連串骨牌效應，最後演變成英法俄對抗德奧義的兩大集團對抗，取代原有俾斯麥體系。

後俾斯麥時期，德國威廉二世政府在外交政策上轉為聯合英國與奧匈，繼續壓制法國。此時，法國國力從戰後恢復，並不願意區居二等國家，但亦無法直接和德國對抗，法國選擇從俾斯麥包圍體系中較弱的地中海突圍，而非歷史上的萊茵河區域。英國佔據地中海中部的馬爾他島，擁有地中海的制海權，法國自從佔領阿爾及利亞後，亦建立從法國到北非的地緣政治影響範圍。另一對地中海有興趣的國家為義大利，其佔據西西里島，北非亦成為義大利人民海外移民的主要區域。因此，1881年突尼西亞財政危機，法國利用阿爾及利亞毗鄰突尼西亞的地理優勢，派軍入侵突尼西亞，5月份時更與突尼西亞簽訂巴爾多條約(Bardo)，突尼西亞成為法國的保護國。法國直接對突尼西亞進行軍事佔領，擴張在北非的地緣政治影響力，衝擊義大利甚大，甚至亦引起英國的警覺。

同時，埃及亦發生財政危機，引爆法國與英國在地中海的地緣政治直接衝突。埃及的地緣戰略地位對於法國或英國，尤其對英國而言，特別重要，兩國都不希望埃及因財政危機，致使其他國家趁機控制蘇伊士運河。雖然英國維持孤立的政策，仍然相當關心法國以及俄國的動向，其海外殖民擴張，已經在遠東以及近東遭受俄國的競爭壓力，在非洲亦遭受法國的競爭壓力，甚至德國也加入殖民地競爭。英國改變孤立的外交政策，1887年和德國、奧匈以及義大利等三國簽訂地中海協定，目的在抗衡法國在北非、俄國在巴爾幹的勢力。至此，德國聯合英國以壓制法國的政策，可以說相當成功。

然而，德國選擇與奧匈密切合作，拒絕與俄國續簽再保證條約的作法，卻引起俄國擔憂是否德國將支持奧匈擴大在巴爾幹的影響力。此外，拒絕續約後不久，德國與英國簽署殖民地協定，英國自德國獲得尼羅河的源流區以及東非廣闊領土，包括現今坦尚尼亞一帶；德國則是換來連接西南非和尚比西河(Zambezi River)的土地，即卡佩維地峽(Caprivi Strip)，以及北海的赫戈蘭島(Helgoland)。²⁹ 德國的舉動雖非視俄國為敵人，但卻引起俄國地緣政治上極度不安全感，俄國無法容忍德國、奧匈、義大利以及英國聯合，並在巴爾幹與地中海對其進行陸海雙面包圍，雖然俄國對法德兩國間的地緣政治衝突區域，即亞爾薩斯、洛林兩地，並不存在直接的地緣政治利益，但當時情形唯有結合法國，才能突破困境。

1891年，法國與俄國達成政治協定，³⁰隔年，雙方將領簽署秘密草約，締結兩國軍事同盟關係，內容主要針對三國同盟，即法國遭受德國、義大利，或者俄國遭受德國、奧匈的攻擊時，雙方有義務出兵支援。易言之，倘若軍事衝突真正發生，德國將會面臨東、西兩面作戰的情況。英國在地中海的情況與德國類似，縱然英國仍具海權優勢，但無法同時對付法國與俄國，且戰爭一旦發生，蘇伊士運河必然封閉，英國船隻屆時將只能繞道好望角。整體而言，法俄兩國締結同盟關係乃是歐洲地緣政治變動下的反應，法國屬於為被動作為，俄國屬於主動作為，突破地緣政治困境則是兩國的共同點。

二、新帝國主義的地緣政治

(一) 資本主義擴張與地緣政治

無論是三國同盟或是法俄同盟均屬於防禦性同盟，這使得歐洲國家間處於短

²⁹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4), pp. 178-180.

³⁰ 主要內容包括乃針對安全威脅時，舉行雙邊會商，以及雙方任一國遭受攻擊時的措施等。

暫和平，而各國在海外的活動卻越顯活躍，開啟新帝國主義(New Imperialism)時期。「帝國主義」一詞在法國拿破崙三世即存在，內涵泛指法國第二帝國的政治制度以及法皇本身；而 1870 年後在英國開始具有不同意義，是指殖民帝國的建立與積極介入世界政治。³¹新帝國主義與古典帝國主義的差別在於，後者專指透過武力征服、殖民統治，並且掠奪殖民地經濟利益；前者則包括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文化等手段，以現代化科學技術為基礎，滲透並控制落後地區。新帝國主義國家並不限於西方國家，日本與美國於十九世紀末亦加入帝國主義國家的行列。霍布森(J.A. Hobson)認為帝國主義擴張乃受到國內政治或經濟階級的利益驅使，尤其是帝國主義的經濟根源，主要是為工業產品尋找市場、為剩餘資本尋找投資標的，對殖民地居民的文明教化成本，被視為資本開支，作為生產投資。³²

經濟邏輯解釋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乃基於工業現代化的結果，可以看到資本主義國家在爭奪銷售市場、原料市場以及投資範圍等日趨激烈，於是在殖民地建立礦冶、種植、碼頭、倉庫、工廠、鐵路、航運與銀行，這類發展以東地中海和拉丁美洲最為明顯。東地中海指的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領土，法國投資土耳其境內鐵路以及港口，例如君士坦丁堡、薩洛尼卡(Thessaloniki)、士麥那(Smyrna)以及貝魯特等港口，都掌控在法國手上，更重要的是，法國勢力主導土耳其最重要的銀行—君士坦丁堡的奧圖曼銀行。³³德國、俄國、法國以及英國等四國亦爭奪連結巴格達到喀尼亞(Konia)的鐵路承築權，最後由德國取得並建設。德國最後能夠修築巴格達鐵路，有賴於德國與英國協議，德國承諾不在巴格達以南建築鐵路，並且承認英國在幼發拉底河有水運優先權，始解決巴格達鐵路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國家熱衷承包鐵路修築，另一重要原因是獲得鐵路沿線的採礦權，取得更大的經濟利益。

另一個歐洲資本進入的區域為拉丁美洲，其重要性隨歐洲各國與美國工業化

³¹ Heinz Gollwitzer, *Europe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1880-1914*(New York: W. W. Norton, 1969), p.10.

³² J. A. Hobson, *Imperialism—A Study*(New York: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5), p.71-73.

³³ Nicholai Bukharin, 呂智明譯，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台北：南方叢書出版社，1988年），頁98。

程度成正比。例如，工業發展需要更多原料，像是皮革、棉花、羊毛等，以及新興化學與電力工業所需要的橡膠、銅、鋅、鉛和其他金屬時，拉丁美洲的豐富資源成為進口來源。歐美國家都市人口增加，此區域生產的糖、小麥、肉類、咖啡以及可可等，可以滿足食物上的需求。相反地，歐美國家所擁有的資金和工程技術，用於拉丁美洲的投資建設，滿足歐美工業化的需求。³⁴歐洲國家主要於拉丁美洲投資鐵路興建，用於改善內陸至海港的交通網絡，例如運輸阿根廷的肉類和穀物、礦產等等。英國資本集中在傳統的重工業（鐵路、礦冶），法國資本多用於政府債券，德國資本則較側重於新興工業（光學、電器、化工），歐洲的工業技術、人員和勞工亦相繼移入。³⁵

（二）法國第三共和與海外殖民地競逐

新帝國主義殖民擴張在非洲以及亞洲兩地發展迅速，直至十九世紀末，這兩地幾乎成為殖民或半殖民地。整體來說，法國、英國、俄國仍是全球殖民擴張的主要競爭者，德國雖亦開展殖民地開墾，但歐洲大陸本身仍然為其主要地緣政治的關切所在，德國與其他三國的殖民衝突並不激烈。

法國除在北非的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等地與英國的埃及衝突之外，其在剛果河右岸的發展，亦受到比利時在左岸、以及葡萄牙的競爭。德國也取得西南非沿岸領土，並在多哥(Togo)和喀麥隆(Camerouns)發展殖民。1884年11月至1885年2月的柏林會議，歐洲國家與美國、土耳其代表等共同討論劃定各國在非洲的勢力範圍，即沿岸佔有領土的國家有權向內延伸勢力範圍，領土以有效佔領為依據始擁有主權。法國對中、西非殖民地不太熱心，視剛果(Congo)與加彭(Gabon)兩地為包袱，其地緣戰略位置亦比不上北非殖民地。柏林會議後，法國試圖將勢

³⁴ Charles C. Griffin, "The States of Latin America," in F. H. Hinsley(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XI—Material Progress and World-Wide Problems 1870-1898*(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516.

³⁵ 王曾才編著，*西洋近世史*（台北：正中書局，1998），頁677。

力範圍，從剛果河流域延伸至尼羅河流域，派軍進入尼羅河上的法紹達(Fashoda)，此舉卻激起英國強烈的反彈，兩國軍事衝突一觸即發。法國的「法紹達計畫」希望連結剛果河至尼羅河，即撒哈拉至紅海的東西軸心計畫，這與英國希望打通好望角至開羅的南北軸心計畫衝突，兩國在非洲的地緣政治衝突再度回歸東地中海的埃及，最後雙方各退一步解決：法國放棄對尼羅河流域的權利；英國承認撒哈拉區域為法國勢力範圍。

在亞洲的殖民擴張當中，可以看到「法國與英國」、「英國與俄國」這兩組地緣政治對抗組合，延續到二十世紀初期。法國第二帝國時期已經將勢力延伸至中南半島，1874年，法國更迫使安南簽訂條約，同意未得到法國同意前，不得與其他國家簽約。法國的舉動嚴重危害華夷秩序，並否認清帝國為安南宗主國，導致法清戰爭(1884)的爆發，兩國戰後簽訂北京條約，安南成為法國的保護國。1887年，法國將法屬中南半島組成聯邦，並於1893年佔領寮國。法國在中南半島勢力若持續往西延伸，將會與英國發生衝突，當時印度次大陸完全為英國勢力範圍，加上英國亦佔領緬甸，勢力亦不斷向東延伸。不過，最後兩國決定維持泰國獨立現狀，成為兩國在中南半島勢力間的緩衝國。

另一組英國與俄國在亞洲的地緣政治衝突，主要發生在東亞以及中亞。俄國自從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後，地緣政治關注從歐洲轉向亞洲。俄國地緣政治擴張的特性在於尋找溫水港，無論西面、南面或者是東面都是如此，其視中亞為抗衡英國的戰略要地，但不採行對英國海權直接對抗，而是建築一條從土耳其斯坦到阿富汗邊境的鐵路，一旦與英國發生衝突，這條鐵路便成為俄軍進擊阿富汗的要道。³⁶1864年俄國取得土耳其斯坦一地後，與英國在中亞的競爭更趨激烈。英國雖擁有海權優勢，不過在陸地上的競爭卻明顯劣於俄國，英國關切印度次大陸的安全，避免俄國經波斯進入波斯灣，或者經新疆、西藏進入孟加拉灣，如此一來，俄國勢力將近入印度洋，此會危害英國殖民地安全與海權優勢。直至1907年，

³⁶ A. P. Thornton, "Rivalries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Middle East and Egypt," in F. H. Hinsley(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XI—Material Progress and World-Wide Problems 1870-1898*, p. 570.

英俄兩國在中亞的對抗和緩，兩國達成諒解並將波斯劃分為兩個勢力範圍，北部屬於俄國，東南以及波斯灣沿岸為英國範圍，中部波斯一帶以及西藏成為緩衝地帶，兩國承認清國對西藏的宗主權，俄國承認英國在阿富汗享有特殊利益。

英俄在東亞的競逐並未直接涉及安全問題，例如，黑海中立化對俄國，或者是印度海上通路對英國等，歐洲各國對東亞主要關切的是經濟利益。³⁷不過，俄國於東北亞建立海參崴(1860)，又利用日清戰爭(1894-1895)後干涉還遼事件，租借旅順港(1898)，種種舉動引起英國警戒。英國雖享有海權優勢，不過相較於俄國從北方、法國從南方中南半島經陸路進入清帝國領土，整體而言，英國在東亞的競爭優勢比不上俄國以及法國，這促使英國急於尋求盟友外，更希望將俄國的海權勢力限制在對馬海峽。英國曾計畫將俄國海軍勢力逐出旅順港，但又顧忌法俄同盟關係，一旦受到英國攻擊，法國駐紮在中南半島的海軍將會援助俄國，因此，英國這一計畫並未實現。

三、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與歐洲地緣政治變動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地緣政治根源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法國、英國、德國以及俄國等四國間，維持一微妙的平衡關係。法國與俄國雖然建立同盟關係，不過仍各具有地緣政治考量。例如，1895年時，俄國曾以軍事佔領君士坦丁堡為前提，與法國談論軍事合作的可能性，法國則提出交換條件，希望俄國亦能軍事協助法國取回亞爾薩斯與洛林。最後兩國在地緣政治利益未能交集情況下，軍事合作無疾而終。此外，因為法俄同盟緣故，英國放棄從海峽進犯俄國黑海沿海領土，避免同時與法俄兩國衝突。法國也無意

³⁷ A. J. P. Tayl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F. H. Hinsley(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XI—Material Progress and World-Wide Problems 1870-1898*, p. 563.

藉與俄國同盟關係，支持俄國挑戰英國海權，趁機擴張東地中海勢力。³⁸歐陸部分，英國與俄國與萊茵河區域並有直接的地緣政治關聯，兩國亦不願意因為支持法國取回亞爾薩斯和洛林，進而與德國為敵。實際上，法國與德國之間持續衝突，乃符合俄國與英國利益，否則若出現法國、奧匈與德國的大陸同盟，將產生足夠的權力將英國和俄國勢力從歐陸驅逐出去。³⁹

德國的世界政策破壞四國間的外交平衡關係，繼德國加強與奧匈之間關係，並將俄國推向法國後，德國在近東以及非洲南部與英國發生衝突，以及計畫建立強大海軍等作為，將英國逐漸推往法俄同盟。德國曾在土耳其境內因興建巴格達鐵路而引起英國疑慮，最後兩國協議劃分勢力範圍才解決。在非洲南部，英國與特蘭斯瓦共和國(Transvaal Republic)以及奧蘭治自治邦(Orange Free State)因黃金利益與公民權問題發生波耳戰爭(Second Boer War, 1899-1902)，而德國因在西南非擁有殖民地，在特蘭斯瓦境內亦有經濟投資，英國若擴張南非的殖民勢力，將直接影響德國在此區域的地緣政治利益。因此，在戰爭過程當中，德國反對英國，甚至倡議成立德法俄大陸同盟，以對抗英國海權，最後因法國拒絕而未成。

然而，真正讓英國倍感威脅的是德國海權不斷擴張，並與英國形成海軍軍備競賽，迫使英國將大部分駐守在馬爾他的地中海軍艦調往北海，以保障英倫三島以及海上航道的安全。⁴⁰英國在波耳戰爭後國力日益衰弱，逐漸將外交關注轉回歐洲大陸，而德國原本就相當強大的陸權，同時又發展海權的情況下，英國視其發展為破壞權力平衡態勢。實際上，英國地理位置使其陸權發展受限，縱然擁有海權優勢，但其海軍艦隊無法同時對付兩個國家海軍的聯合。亦即，英國海權在波羅地海無法對付德國結合俄國，在地中海部分，法國以及德國的海權結合，亦將對英國造成嚴重威脅。英國雖在東亞與日本締結英日同盟(1902)，有聯合日本遏阻俄國在東亞的勢力擴張之企圖。然英國軍隊受殖民地紛爭牽制，倘若英國與法國、俄國殖民地升高衝突，英國勢必難以應付，更何況實際影響英國本土安全

³⁸ *Ibid.*, pp. 561-562.

³⁹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p. 385.

⁴⁰ 張麟徵，前引書，頁 480。

的外在威脅，主要是德國，而非殖民地衝突。因此，英國在陸續與法國和俄國簽訂英法友好協約 (Anglo-French Cordial Entente, 1904) 以及英俄協約 (Anglo-Russian Entente, 1907) 後，再加上先前的法俄同盟關係，遂形成法英俄三國協約。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地緣政治根源在巴爾幹半島，部分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歐洲領土，巴爾幹半島為俄國與奧匈地緣政治衝突的核心，更是德國、奧匈以及俄國之間的緩衝地帶。土耳其帝國衰弱而無法繼續對領土進行有效的政治控制時，此半島穩定的局勢就轉為衝突的焦點。1908 年，奧匈宣布兼併波士尼亞 (Bosnia) 與赫塞哥維那 (Herzegovina) 兩地，並獲得德國支持，已經打破巴爾幹半島平衡態勢。接下來發生的兩次巴爾幹戰爭 (1912-1913, 1913)，半島內各國間的對立更為嚴重，其背後與奧匈、俄國兩大國的連結更為明顯，特別是奧匈與保加利亞、俄國與塞爾維亞之間的關聯。奧匈不希望見到塞爾維亞勢力擴張至亞得里亞海，俄國不希望見到保加利亞佔領君士坦丁堡，成立阿爾巴尼亞公國即是要隔絕塞爾維亞於亞得里亞海之外。於是，當奧匈皇太子遭到刺殺並引爆外交危機時，俄國支持塞爾維亞，法國與俄國基於同盟關係亦表示對塞國的支持，德奧基於同盟關係而採取同一立場，英國亦表示法國若涉入將無法免於衝突之外。最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便在錯綜複雜的外交關係與地緣政治衝突下引爆。

(二) 理想主義、現實主義與歐洲地緣政治

1919 年戰爭即將結束之際，各國談判者於巴黎談判戰後重建過程，對於戰後世界秩序的建立並存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版本，法國為現實主義，美國代表理想主義，兩個版本想要預防戰爭、維持和平的目標不變，但其蘊含的地緣政治邏輯並不相同。

法國的觀點代表現實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法國人員傷亡達 150 萬人，法國

東北部慘遭德軍入侵，因此對和平的看法，尤其對德國的看法，乃基於傳統權力，即剝奪德國權力恢復的條件，以及法國擁有對德國相對優勢的權力。法國的主張以總理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為代表，他不認為德國政治體制的改變能夠維持歐洲的和平，戰爭爆發雖意謂先前權力平衡、同盟關係以及軍備競賽的失敗所造成，但目前尚未有其他形式可以取代。法國版本的國際組織乃建立在勝利國家的基礎上，組織本身擁有強大軍隊，監督各國削減軍備情形，執行國際法庭的決定，以及保護成員國免受侵略。⁴¹因此，法國主張將德國排除在國際組織之外，同時，應分裂德國領土、佔領德國邊疆戰略要地、解除德國武裝，以及最後也是最直接的鉅額賠款。

英國則代表折衷主義，認為過去歐洲大國間協調體制並無不妥，只是需要做某些制度改革，英國同意削減軍備的觀念，但不認同國際組織具有行政制裁權力。事實上，英國的觀點與法國類似，不以人性本善的政治理論作假設，而是以自利為出發點，謀求最大的自我利益。換言之，歐洲外交的前提並非各國是愛好和平的，而是各國的好戰本質，必須加以抑制或制衡。⁴²歐洲傳統國家與國家間的外交關係是追求特定目標，不是抽象地維持和平。英國基於權力平衡的理由，這點跟法國相同，不贊成美國提出的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的主張。

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提出十四點和平原則，首次擘劃出美國版本的世界新秩序。這一套美國人的想法乃基於理想主義，權力是建立在正當性與正義，而非傳統物質權力基礎，國家仍是主要行為者。然而，與過去和平是建立在勝利國家聯盟不同，美國提出需要成立新的國際組織以維持和平，並且透過削減各國軍備，徹底根除戰爭再起。⁴³美國孤立於歐洲大陸的地理位置，使其能夠置身於歐陸事務之外，參與大戰後世界新秩序的安排，美國也較能以全球，而非歐洲的角度，設定一維持世界和平的普世原則。

⁴¹ Kaleve J. Holsti, *Peace and War—Armed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1648-1989*(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90-192.

⁴² Henry Kissinger, *op.cit.*, pp. 221-222.

⁴³ Kaleve J. Holsti, *op.cit.*, pp.185-186.

法國的地緣戰略目標明顯與美國不同，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和平原則，使用原則取代權力，講求法律取代利益，這與歐洲各國的歷史經驗和經驗法則格格不入。於是乎，和平原則對於亞爾薩斯與洛林歸還法國就不列入強制性目標，嚴重違反法國 1871 年以來的地緣政治利益。法國在五十年內兩次遭遇德國大規模攻擊（普法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於萊茵河區域的重要性，關切程度甚於過往，對法國而言，德意志地緣政治問題，即向外追求最適當的疆界，將會是戰後和平的首要解決要務。因此，法國就必須推動一系列，並且常常不一致的戰略，來處理德意志問題。法國對德意志的地緣戰略可以區分成三方面：首先是公開談判部分，透過瓜分領土、賠償，以及解除武裝的方式，減弱德國的國家權力，甚至支持德意志回到分裂狀況；其次，對德國採取某些和解政策，以及政治上的接觸，亦即，參與盟國和平方案的討論，但法國應導正討論而使之不會偏離主題（德意志問題）；最後，再次回到權力平衡的基礎上，法國提出集體安全概念，藉由同盟國或是聯盟關係，來壓制、對抗德國的安全威脅，法國提議組成法美英軍事同盟，設置國際軍隊以及國際參謀總部，不過遭美國拒絕。⁴⁴

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奧匈帝國解體，俄國國內引爆布爾什維克黨革命以及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瓦解。奧匈自此退出大國行列，國際影響力消失；俄國亦退出國際舞台將近二十年，直至希特勒德國的再次崛起；土耳其帝國瓦解，各分裂領土依據民族自決原則，紛紛成立新國家。然而，就歐洲地緣政治變動來看，俄國、奧匈以及土耳其帝國瓦解，再加上法國勢力衰微，歐陸無法形成有效的反德聯盟，圍堵以及壓制德國。因此，不到二十年世界大戰再度引爆。

⁴⁴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32-134.

第三節 兩次大戰期間與第二次世界大戰(1918-1945)

一、歐洲地緣政治變動與法國對德地緣戰略

(一) 歐洲地緣政治變動

戰後巴黎和會在美國理想主義與法國現實主義之間折衷妥協，1919 至 1920 年，勝利國分別與敗戰國簽署五個條約，⁴⁵ 建立一次戰後的國際新秩序。歐洲地緣政治於戰後最大的改變為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以及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瓦解，原領土版圖成立許多新興獨立國家。新秩序締造者重新界定歐洲以及敗戰國海外殖民地的政治疆界，與過去歐洲協調體制不同的是，戰後新秩序不全然依循現實主義權力平衡原則來維持，而嘗試以國際組織——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 的形式，實踐理想主義的國際和平計畫。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政治疆界主要調整如下：

1. 法國取得亞爾薩斯、洛林兩地。
2. 波蘭復國，領土包括東加里西亞和但澤港。
3.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南斯拉夫獨立，捷克斯洛伐克取得蘇德台區(Sudetenland)，奧地利成為純日耳曼國家，奧德禁止合併。
4. 保加利亞將色雷斯(Thrace)割給希臘，同時將多浦路加割讓給羅馬尼亞。⁴⁶

國際聯盟在美國倡議下成立，主要目的是要維護和平，戰後除調整歐洲大陸

⁴⁵ 這五個條約分別是：與德國的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與奧地利的聖日耳曼條約(Treaty of Saint-Germain-en-Laye)、與匈牙利的特亞農條約(Treaty of Trianon)、與保加利亞的涅宜條約(Treaty of Neuilly)，以及與土耳其的色佛爾條約(Treaty of Sévres)。土耳其在凱末爾(Kemal)拒絕條約的情況下，各國於 1923 年跟土耳其另行簽訂洛桑條約(Treaty of Lausanne)。

⁴⁶ 蔡東杰，西洋外交史(台北：風雲論壇有限公司，2006 年)，頁 192-193。

政治疆界之外，國際聯盟亦設置託管委員會(The Mandates Commission)，負責託管敗戰國的海外殖民地行政事宜。國際聯盟將殖民地委由其他國家託管，例如，法國託管敘利亞，並且取得毗鄰的西西里；英國託管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德國西南非殖民地多哥與喀麥隆則是由法國跟英國共同託管。這項措施撤銷德國與土耳其對殖民地的宗主權，理論上，託管國的任務為輔導託管地直至獨立，並向託管委員會報告，然而在作法上，託管國皆將這些託管地視為殖民地的部分。⁴⁷

國際聯盟在協調英國與土耳其的條約內容糾紛、希臘與保加利亞邊界衝突，以及波蘭與立陶宛的邊界衝突等三個事件，獲得成功。這三個事件的共同點是針對巴黎和會修正的政治疆界不滿所引起，根據學者卡爾(E. H. Carr)的研究，這三個衝突事件特點為，若是雙方權力不對稱的情況，最後的結果明顯有利於權力優勢的一方（英國和波蘭）；假如為兩個實力較弱的國家發生衝突（希臘與保加利亞），且衝突未直接涉及理事會成員利益，國際聯盟較能主導衝突調解，並獲致成果。⁴⁸

然而，國際聯盟最終仍未能阻止另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美國沒有加入是其中一項原因，但戰後新秩序安排導致歐洲地緣政治變動，成為下次軍事衝突的導火線。

（二）法國對德國的地緣戰略

1919 年後，法國地緣戰略最重要的課題，是如何確保自身國土的安全。1871 年前，法國地緣政治擴張必須由歐洲各國組成反法聯盟才能抗衡，德國卻僅憑一國之力造成法國莫大損失，法國與德國毗鄰的地理現實，反成為法國安全上最大的威脅。法國於戰後奉行的戰略路線有二：一是通過凡爾賽條約和國際聯盟追求

⁴⁷ René Albrecht-Carrié, *op.cit.*, pp. 375-377.

⁴⁸ E. H. Car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1919-1939*(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4), pp. 104-108.

集體安全，另一為通過軍事協定和軍事同盟追求國家安全。⁴⁹法國在凡爾賽條約中得到的為：(一)協約國軍隊佔領萊茵河西岸 15 年，並規定此區為永久非軍事區，禁止在萊茵河西岸駐紮軍隊或修建工事；(二)法國與美國分別簽訂條約，其中規定，法國沒有挑釁的前提下，德國若侵略法國，美國與英國立即援助法國，此兩款條約與凡爾賽條約同時生效。⁵⁰事實上，凡爾賽條約是法國與美國、英國妥協下的產物，法國主張恢復路易十四時期對德意志區域的政策，即佔領萊茵河西岸，並在萊茵河東岸建立三座碉堡，且建立數個萊茵自治邦，成為法國與德國之間的緩衝地帶，同時亦可削減德國的經濟實力以及人口優勢。⁵¹不過，法國分裂德國的主張並未被其他國家所接受，於是採取另一項戰略路線。

透過軍事協定以及軍事同盟追求國家安全的戰略，就必須先界定誰是潛在的敵人。影響法國在歐洲地位的國家為英國和德國，英國在海權、德國在陸權勝過法國。普法戰爭以後，法國即視德國為國家安全最大威脅，法國無論在經濟、資源和人口數量上均不及德國，法國若欲避免德國再次成為威脅，亦需仰賴盟國，特別是德國與法國周遭國家的合作。

法國對德國的地緣戰略乃是藉締結軍事同盟，對德國進行包圍。萊茵河西岸，法國與比利時建立軍事同盟(1920)，承諾共同回應對德國的侵略；法國亦與戰後所復國的波蘭建立軍事同盟(1921)，使得德國同時面臨東、西兩條戰線；此外，法國跟小協約國，即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等三國，簽訂軍事互助條約。⁵²德國南邊的義大利是法國試圖結盟的重要對象，義大利的樞紐位置為連結法國與中東歐國家的橋樑，經過北部義大利鐵路運輸，法國軍隊可以在三天內到達多瑙河區域，而且三週即可運輸整團兵力，義大利空軍和海軍亦可協助

⁴⁹ Williamson Murray, Macgregor Knox and Alvin Bernstein (eds), 時殷弘等譯, 締造戰略：統治者、國家與戰爭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4 年), 頁 495。

⁵⁰ E. H. Carr, *op.cit.*, pp. 26-27.

⁵¹ Williamson Murray, Macgregor Knox and Alvin Bernstein (eds), 前引書, 頁 500。

⁵² E. H. Carr, *op.cit.*, p.30, 42; Williamson Murray, Macgregor Knox and Alvin Bernstein (eds), 前引書, 頁 504-505。

巴爾幹半島的軍事任務。⁵³法國若欠缺義大利的合作，對於小協約國的戰略物資補給將受到限制，並可確保法國—北非殖民地的海上交通線安全。

整體而言，法國的作法除認定德國為潛在威脅外，更是承認法國國力有限，無法單獨對抗德國。戰後法國對德國的戰略基於地緣政治現實，雖試圖與他國締結軍事同盟方式圍堵德國，然而欠缺英國與蘇聯的參與，義大利的立場搖擺不定的情況下，法國所規劃的軍事同盟仍因希特勒德國崛起而失效。爾後德國退出國際聯盟並且進行擴張政策，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二、德國重新崛起(1933-1939)

(一) 英國與法國的地緣戰略歧異

戰後英國的政策是要預防德國重回世界政策，只要限制德國海軍的發展，重新分配德國在非洲以及大洋洲的殖民地，亦即，不威脅英國海權和帝國生命線，使德國回到俾斯麥時期的大陸國家，即符合英國傳統對歐洲大陸的權力平衡政策。⁵⁴因此在 1925 年，英國主導歐洲各國和德國的談判，最後簽訂羅加諾條約 (Locarno Treaties)，主要簽約國為德國、法國、比利時、英國以及義大利等五國，前三個國家保證互不侵犯，後兩個國則以此作保，倘若前三國攻擊任一方，所有國家有責任保護被攻擊國。此外，法國與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簽訂雙邊相互保證條約，德國與其他國家簽訂一系列仲裁條約。羅加諾條約簽訂後幾年，德國成為國際聯盟常任理事國之一，協約國軍隊亦從萊茵河區撤出，然而，和平氣氛仍無法解決地緣政治變動所導致的衝突。

英國與法國對德國的地緣戰略歧異越趨明顯，或者更精確地說，兩國對戰後

⁵³ Williamson Murray, Macgregor Knox and Alvin Bernstein (eds), 前引書, 頁 506。

⁵⁴ William R. Keylor, 蔡百詮譯, 二十世紀國際史 (台北: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1989 年), 頁 99。

歐洲新秩序的看法原來就不同，英國折衷主義的心態在羅加諾條約中顯露無疑。英國清楚表示願意維持法國、比利時和德國邊界和平，三國間改變現狀或者是侵略的發生，都將導致英國的軍事介入；不過相反地，至於多瑙河流域國家，即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以及匈牙利等五國，英國顯然漠視且不願意介入此區域可能的軍事衝突。簡言之，英國的作法凸顯，除非各國自願簽署雙邊條約，否則巴黎和會所建立的和平秩序，仍然是不穩定和不確定。⁵⁵英國重回過去光榮孤立，對歐洲事務的介入則以是否破壞權力平衡為首要考量，這種情況下，法國或德國主宰整個歐洲大陸都不符合英國國家利益。

英國對法國的顧忌依然存在，德國與俄國因戰爭結果而減弱對其海權的威脅，反而是法國積極提升對歐陸國家的影響力，使英國擔憂歐陸權力平衡受到破壞。依據巴黎和會的安排，德國的海軍軍艦數目被限制在六艘（驅逐艦、巡洋艦各六艘），且不能擁有潛水艇、陸軍人數受限及空軍被解散，其非洲與太平洋的殖民地遭到託管，殖民帝國亦已瓦解。亦即，德國無法將權力投射到歐洲大陸之外，且無能力維持世界政策。另一個英國全球地緣政治的對手——俄國，戰後內部動盪不安，無力與英國繼續進行海外競逐情況，因而解除英國印度殖民地的陸路威脅，以及對南歐的威脅。⁵⁶法國在歐陸享有軍事優勢，於外交、軍事上聯合比利時、波蘭和小協約國家，以形成地理包圍德國的積極作為，英國並不樂見。因此，英國在羅加諾條約對戰後邊界的不同立場，其實是間接默認德國對其東部邊界的主張，以及抗衡法國的用意。

英國不同的地緣戰略立場亦於裁減軍備議題顯現。在凡爾賽條約當中，協約國曾宣布，嚴厲裁減德國軍備的目的，是要推動所有國家裁減軍備。國際聯盟條約內承諾，為維持和平要求把國家的軍備減至足以保衛國家安全的最低限度。⁵⁷英國與美國立場一致，願意推動普遍裁減軍備，即所有國家維持固定比例的軍事力量，以避免軍備競賽而導致戰爭再起。不過，法國於軍備談判過程中強調國家

⁵⁵ E. H. Carr, *op.cit.*, pp. 96-97.

⁵⁶ William R. Keylor, *前引書*，頁 131。

⁵⁷ E. H. Carr, *op.cit.*, pp. 175-176.

安全優先，即任何的軍備裁減，應該在國家安全確保後才能夠進行。前面提到，法國地緣戰略以地理包圍德國為主要考量，若是所有國家均裁減軍備，法國以及波蘭、小協約國等軍事實力將被削減，就法國的觀點而言，這舉動非但不能確保安全，中東歐國家更難以維持獨立，反讓歐洲陷入不穩定。

1815 年維也納會議所建立的歐洲協調體制，其特色是各國團結對抗法國，半個世紀後德國建立的俾斯麥體系，亦持續反法同盟。然而，1919 年的巴黎和會，在英國與美國反對下，法國無法組成有效的反德同盟，僅能與中小型國家締結軍事同盟條約，對德國進行包圍成效有限。法英兩國地緣戰略歧異遲遲未能獲得妥協，反給予德國再次擴張的契機。

（二）德國地緣政治學興起

威廉二世德國的世界政策受到陸權與海權地緣政治思想的影響，支持陸權者強調德國應建立一支強大陸軍，鞏固德國與奧匈帝國兩國間的同盟關係。東方是國家權力的來源，前進東方(Drang nach Osten)並且與東歐國家發展密切的外交關係，成為德國陸權派的重要主張。例如，德國修築柏林到巴格達的鐵路計畫，目的在連結德國、巴爾幹到土耳其的陸路通道。⁵⁸支持海權者則是受到美國學者馬漢的影響，第一次大戰戰前德國積極建立海軍，並且開始在非洲拓展殖民地，引起英國警覺並導致海軍軍備競賽。

然而，德國選擇發展海權和陸權的作法，卻在戰爭遭遇挫敗，並激起地理學者的討論，其中郝斯霍佛(Karl Haushofer)影響當時德國最甚。郝斯霍佛的地緣政治理論基礎是生物進化論，將國家視為有機體，一個遵循生物法則的超越個體的生命體。國家存在於空間當中，其發展與成長需要生存空間(Lebensraum)，國家成功的地理意義即是獲得巨大空間(Grossraum)，強大國家得以超越空間

⁵⁸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London: Pinter, 1998), p. 27-28.

(raumüberwindende), 併吞弱小國家, 弱小國家則受限於空間(raumgebundene)。⁵⁹簡言之, 此時期德國地緣政治學充滿地理決定論, 或是環境決定論的思想, 給定的空間決定人類的未來命運, 而非人類本身自行決定。

赫斯霍佛的地緣政治擴張邏輯在於生存空間, 德國的關鍵利益在陸權, 東進以及中歐雙重政策, 皆是德國強大所必須爭取的空間。赫斯霍佛與同事共同發行地緣政治期刊(*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 並於慕尼黑大學成立地緣政治研究所, 鼓吹德國政治領導者應理解德國地理位置, 制訂符合德國的地緣戰略。他為德國選擇陸權以及向東擴張路徑, 且更進一步提出泛區域論, 將全球主要區分成泛歐洲(PanEuropa)、泛亞洲(PanAsien)和泛美洲(PanAmerika)三個大型區域, 德國將主導歐洲、日本將主導亞洲以及美國將主導美洲。德國若要主導世界島, 就必須擊敗英國的海權, 並且支配蘇聯。⁶⁰除陸權的生存空間外, 赫斯霍佛亦強烈渴望佔領海洋, 因為海洋所帶來的商業財富, 是國家力量重要的來源, 國家佔領海洋是擴張的進一步跳板。對其而言, 陸權的勢力通常限制在領土疆界, 但是海權的勢力可以擴展到整個地球, 兩者的順序為, 先鞏固陸權並以此為基礎, 然後再拓展海權勢力。⁶¹

德國地緣政治學受到當時英國地理學者麥金德影響甚大, 尤其對於世界島心臟地帶的關注。德國的擴張非限於中歐與東歐等人口擁擠區域, 而是更遠的烏克蘭以及俄羅斯大草原地帶。這區域具有生產糧食、能源和工業原料的潛力, 寬廣的土地亦可容納德國本土過多的人口。然而, 赫斯霍佛不同意以武力征服心臟地帶, 而是鼓吹歐亞結盟, 即德國與蘇聯結盟的形式, 或者是外交以及秘密手段來完成。⁶²德國地緣政治學被批評是偽科學, 目的是替希特勒德國的擴張行徑, 尋找正當理由, 仔細對照德國地緣政治論述與德國政府作法, 確實十分相近, 不同

⁵⁹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p. 32-33.

⁶⁰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p. 33-34; 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9, Second Edition), p. 21.

⁶¹ Geoffrey 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Beckenham: Croom Helm ,Ltd., 1985), p. 60-61.

⁶² *Ibid.*, pp. 70-72.

的是，德國最後出兵蘇聯，將德國陷於雙面作戰的困境，反而違背德國地緣政治學的主張。

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地緣政治根源

（一）希特勒德國的地緣政治擴張

前面提到，法國透過結盟方式與比利時、波蘭和小協約國共同包圍德國，然而這些國家僅是法國次要的選擇，真正能夠協助法國壓制德國的國家是英國和美國，而後兩者卻不認同法國提議。實際上，第一次大戰戰後歐洲地緣政治的變動反而有利於德國，戰爭爆發前，德國的東西兩面均有強國壓境，只要往外擴張，就會遭遇到法國、奧匈帝國或者是俄國的阻擾。戰後凡爾賽條約簽訂，在東歐已無能夠制衡德國的國家，西歐法國勢力衰弱，奧匈帝國以及俄國解體，波蘭復國成為德國與俄國的緩衝國等條件，使歐洲無法回到往昔的權力平衡。而且，英美兩國都認為條約對德國過於嚴苛，並且不肯保證執行凡爾賽條約的情況下，歐洲地緣政治的特性呈現出法國的脆弱，以及德國從中反而取得地緣戰略優勢。⁶³

德意志地緣政治邏輯在於追求更多的生存空間，容納更多的德國人口，否則無法維持其生活水準。德國沒有那麼多糧食，外匯不足的原因，也不可能僅靠國外進口方式滿足需求。而且，德國想透過貿易提高地位的機會，也受限於各國的關稅壁壘。往東歐尋找「農業有用空間」，成為德國生存發展的出路。⁶⁴1933年希特勒出任德國總理，開始進行擴張政策，不過在往東尋求生存空間之前，德國必須面對傳統敵人——法國和英國。因此，德國與波蘭簽訂十年期限的和平協定，約定兩國彼此互不侵犯，德國的舉動主要在保護東面的側翼，使其能在無後顧之

⁶³ Henry Kissinger, *op.cit.*, pp. 242-244.

⁶⁴ B. H. Liddell-Hart, 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一冊（台北：城邦文化事業，1998年），頁35-36。

虞情況下，重新軍事佔領萊茵河地區。此外，德國與義大利合作介入西班牙內戰，支持佛朗哥將軍推翻共和政府，伊比利半島的變局對法西兩國邊界以及法國與英國的海上交通線產生威脅。德國採間接路線戰略，攻入英法兩國的戰略性後方為目的，構成一種牽制作用。當英法兩國在西面的地位削弱後，比利時重回中立政策，德國又在萊茵河建立要塞，鞏固西側翼的齊格菲防線(Siegfried line)，使德國能夠往東發展，且戰時切斷法國與東方盟國的聯繫。⁶⁵

德國逐步擴張的行徑，顯露法國、英國陷入地緣政治困境。法國在比利時宣布中立以及萊茵河區重新武裝後，將大部分的軍事資源挹注在橫越洛林北部的馬其諾防線(Maginot line)，龐大軍隊守在防線後，等著阻止德軍的進犯。法國在西線（法德邊界）採取守勢，希望與蘇聯、義大利兩國密切結合，共同壓制德國。然而，法國與蘇聯雖達成政治聯盟，但未能升級至軍事合作，除顧忌英國反彈外，法國的東歐盟國位於蘇聯與德國中間地帶，是不會允許蘇聯軍隊進入領土。⁶⁶此外，義大利位居法國對德國的地緣戰略的重要位置，法義兩國對維護奧地利獨立享有共同利益，法英義三國幾乎結盟，但因義大利出兵征服非洲阿比西尼亞(Abyssinia)，致使義大利疏遠其他兩國。⁶⁷

英國的困境在於無法維護殖民地安全，同時又涉入歐洲大陸的軍事衝突。當日本在 1931 年入侵滿州，並且威脅英國在上海的利益時，英國擔心海外殖民地利益遭受威脅。因此，英國必須盡力與德國就限武以及和平修改疆界等問題達成協議。在東亞，英國海軍並無法單獨對抗日本海軍，以保護殖民地利益，唯一能夠合作的海權國為美國。然而，美國在 1935 年國會通過中立條款後，並無願意捲入任何軍事衝突。英國的目的是要維護歐洲大陸穩定，允許德國向東擴張，將其轉向蘇聯方向，以便減輕德國對西方的威脅，這樣的作法符合英國利益。

法國、英國兩國的困境，使德國在歐洲的擴張進展順利：合併奧地利(1938)、

⁶⁵ B. H. Liddell-Hart, 鈕先鍾譯, 戰略論—間接路線 (台北：城邦文化事業，2008 年，二版)，頁 278-279。

⁶⁶ Henry Kissinger, *op.cit.*, pp. 296-297.

⁶⁷ 義大利出兵非洲破壞和平的舉動違反法英兩國的主張，兩國最後認許義大利的行為，然義大利認為兩國並非真正支持其立場，使其立場逐漸轉向德國。

佔領蘇德臺區(Sudetenland, 1938)、鼓動斯洛伐克獨立(1939)、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39)、佔領立陶宛的梅默爾港(Memel)。德國願意讓波蘭獲得一塊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土，交換但澤港(Danzig)回歸德國，以及取得自由到達東普魯士的「波蘭走廊」(Polish Corridor)，但遭致波蘭拒絕。英國在未取得蘇聯承諾支援和波蘭是否願意接受的情況下，表示願意支持波蘭對抗任何威脅獨立的行動。蘇聯是唯一能夠給予波蘭直接軍事援助的國家，但德國與蘇聯協商進度快過英國與蘇聯協商，德國同意蘇聯在波羅地海享有自由行動的權利，並且兩國約定瓜分波蘭。⁶⁸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9月3日，法國與英國向德國宣戰，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二）戰後歐洲新秩序安排

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美國、英國以及蘇聯便針對戰後秩序交換看法，三國均公開發表支持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主要內容為民族自決、維持和平與經濟合作，以及倡議成立國際安全體制等。法國雖勉強擠進大國行列，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但其對戰後歐洲新秩序的影響力遠不如其他大國。美國、英國和蘇聯等三國因地緣戰略歧異，對於歐洲新秩序看法不同，美國部分延續威爾遜理想主義思想，英國和蘇聯的地緣政治關注點在於德國，不過兩國的主張迥異。

鑑於國際聯盟失敗的經驗，美國修正先前理想主義方案，改以權力託管與威嚇的模式，由四個主要國家（美英中蘇）與國際組織（聯合國）負責維持和平。世界其他較弱小國家將軍事以及經濟制裁權力讓渡給這些大國，換取自身的安全保障。此看法的基礎在於，現代化戰爭耗費鉅資，小國為阻止或反抗大國的侵略而武裝自己，沈重的軍備負擔將產生嚴重的後果，如果大多數國家不再將資源用

⁶⁸ B. H. Liddell-Hart, 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一冊，頁 45。

於生產軍備，和平將更容易維持。小國則是參與國際組織運作，以監督大國的聯合行動。⁶⁹美國更加積極運作成立新國際組織取代國際聯盟，藉此建立自由貿易和投資制度，並在全球範圍內推動民族自決。然而，美國亦考量現實權力關係，即美國若缺乏蘇聯合作，其主張難以完成。

蘇聯則完全站在自身地緣政治利益考量戰後安排，甚至戰爭尚未結束，蘇聯即以佔據領土方式，取得戰略優勢。簡單地說，蘇聯優先考量自身的國家安全，德國為地緣戰略主要敵人，如何削弱德國實力，避免再次遭受德國軍事威脅，是蘇聯主要關切議題。戰爭期間，蘇聯藉機擴張在波羅地海以及波蘭的領土範圍，就安全邏輯來看，控制波羅地海三國主要保護為列寧格勒，而佔領波蘭部分領土，可使蘇聯在西線部署更多守軍。國際組織除非對蘇聯有直接的安全幫助，並且削弱德國的實力，否則蘇聯仍不信任國際組織能夠發揮功能。⁷⁰直至戰爭結束，蘇聯的作法依循安全邏輯，即在蘇聯與德國之間建立一系列附庸國家，成為兩國之間的緩衝地帶，並且持續性弱化、甚至分裂德國，最終與美英產生嚴重衝突。

英國雖與美國共同推動成立新國際組織，不過仍認為這無法取代戰勝國之間的結盟，對於戰後歐洲新秩序，英國仍舊維持歐洲權力平衡思維。戰爭期間，蘇聯勢力逐漸佔據中東歐區域時，英國感受到蘇聯支配歐洲的企圖，於是提出以下幾點，避免歐洲發生權力失衡：首先，英國建議盟軍應在巴爾幹半島開闢第二戰線，英國用意在於與蘇聯爭奪中東歐主導權，不過此提議遭美國與蘇聯的反對，最後在大西洋海岸開闢；其次，建立東歐聯邦，避免此區國家成為蘇聯附庸國；第三，恢復法國的大國國際地位，填補英蘇之間的權力真空；第四，考慮建立永久的英美聯盟；最後則是與蘇聯達成協議，劃定兩國對巴爾幹半島的責任範圍（希臘屬於英國、羅馬尼亞屬於蘇聯）。⁷¹

二戰後，法國陷入實力衰退的困境。雖然雅爾達會議裡英國要求關於德國議

⁶⁹ Kaleve J. Holsti, *op.cit.*, pp. 246-247.

⁷⁰ *Ibid.*, pp. 253-263.

⁷¹ *Ibid.*, p.252.

題，法國有平等的發言權，同時也參加對德國的佔領，不過在波茲坦會議，法國則被排除在東歐事務之外。法國、英國與德國這三個傳統歐洲強國無法繼續主導歐洲，國際體系轉為以美國和蘇聯為主的兩極體系，受限於戰後歐洲地緣政治困境，法國力圖恢復大國地位仍然困難重重。

第四節 小 結

後拿破崙時期，法國地緣政治受到國際因素限制，從 1815 年後建立的梅特涅體系，以及 1871 年後的俾斯麥體系，都是戰勝國形成反法聯盟，目的為壓制法國的再次崛起。法國於拿破崙三世執政時期，主張找回法國的光榮與秩序，不過其在全球層次或者是海權方面，不再是對抗英國海權的模式，轉而嘗試英法海權合作模式，共同應付主要的地緣政治威脅。最典型的事件為克里米亞戰爭，英國與法國共同維護東地中海的利益遏阻俄國勢力擴張。在歐陸層次或者是陸權方面，奧國勢力逐漸衰微，普魯士統一德意志區域成為法國東疆最大的安全威脅。德國統一並主導反法聯盟的歐洲地緣政治情勢，而法國則體認到單憑法國自身力量無法突圍，必須有盟國的合作。法國最後能與英國、俄國結盟，相當大程度是因為德國擴張政策導致英俄兩國不安，歐洲各國的地緣政治衝突，使得法國再度受到重視，成為平衡德國的重要國家。

這段歷史發展突顯出法國地緣政治的幾點特性：(一) 地緣政治利益優先於意識型態；(二) 德國統一帶來的衝擊，成為法國地緣政治的德國問題；(三) 法國積極尋求盟國合作，共同壓制德國；(四) 同盟關係勝過集體安全制度。

首先，從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以來，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思想擴散至歐洲各地，為防止革命勢力推翻王權政府，俄普奧三國結成神聖同盟，以軍事手段介入各國革命。法國與英國雖未結盟，但其立場偏向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通常被歸為自由主義陣營。因此，發生在比利時以及義大利半島革命，英法干涉前者，

法國干涉後者，以避免其他國家軍事干預內政，看似合乎意識型態主張，但卻違背神聖同盟主張。依意識型態的邏輯推論，法國以及英國應當對匈牙利或者是波蘭革命表示同情之外，理應積極介入才對，不過法英兩國卻是漠然回應，任由俄國軍事鎮壓革命。二十世紀兩次大戰期間，德國法西斯主義與蘇聯共產主義相互攻訐，最後兩國竟能締結條約，默許德國的擴張行為。這些歷史事件僅用意識型態解釋稍嫌不足，若依據地緣政治途徑來看，各國的行為也就不難理解。

其次，1871年德國統一嚴重衝擊法國地緣政治。法國從路易十四時期以來，對德意志區域採取權力平衡政策，避免此區政治整合成新國家，阻礙法國向東擴張的地緣政治路徑，並且威脅法國國家安全。雖然普魯士從拿破崙戰爭開始，已展露國家軍事實力，然其人口、經濟實力和資源尚未足與法國抗衡，再加上法國與普魯士之間的德意志諸邦為緩衝地帶，普魯士與奧國間的地緣政治衝突等等因素，普魯士對法國未能產生直接安全威脅。然而，德國崛起、奧國相對勢力衰微等現象，導致法國無法忽視這陸續帶來兵戎災禍的國家，地理位置毗鄰和國家實力不如德國的雙重現實，使得法國在歷次大戰後都得面對德國問題，害怕德國再次威脅自身安全。

第三，德國主導聯盟圍堵法國的情況，隨著德國採取擴張政策，激起德國與俄國、英國間的地緣政治衝突，法國才得以突圍外，法國囿於地緣政治困境，積極尋求盟國，共同壓制德國。法國對德國問題的處理為，和平時期尋求同盟對其進行圍堵，邏輯跟德國對法國的圍堵政策相同，第一次世界戰爭前法國聯合英國與俄國，戰後則是聯合中東歐國家，遂行法國對德國的地緣戰略。簡言之，德國成為法國最關切的地緣政治問題，過去數世紀一直視為敵人的英國，至此成為法國合作的最佳選項，而英國的海權角色到第二次世界戰後也被美國取代。

最後，大戰後美國倡議成立國際聯盟，希望透過集體安全來保障會員國的安全，法國仍舊信任傳統同盟關係，勝過集體安全制度。實際上，集體安全與同盟(alliance)是正好相反的兩個概念。傳統同盟是針對特定的威脅，由特定國家依據相同的國家利益，或者相互安全考量而結合在一起，定有明確的權利義務關係。

集體安全則不以特定威脅為對象，不保證個別國家的安全，對各國一視同仁。理論上，集體安全的宗旨在對抗任何危及和平的威脅，無論攻擊者或攻擊對象是誰。同盟一定有一個假想敵，不像集體安全是抽象的維護國際法。⁷²因此，法國清晰的地緣戰略目標和集體安全制度，兩者之間產生落差。從歷史來看，法國並不熱衷國際聯盟，反而在分裂德國的計畫失敗後，便與德國周遭國家建立傳統軍事同盟關係，以圍堵德國。

整體而言，拿破崙三世雖嘗試擴張法國地緣政治勢力，但實際成效已明顯不足，尤其德國統一後，更成為法國地緣戰略的核心關切議題。此時期法國地緣政治密碼逐漸轉向為：

全球層次與英國合作；區域層次與英國及俄國合作；雙邊層次則是壓制德國。

⁷² Henry Kissinger, *op.cit.*, pp. 247-248.

第四章 大戰後的法國地緣政治—困境與突破

法國政府執行的戴高樂主義外交政策，乃是延續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將軍任職總統時(1959-1969)，追求法國「獨立」與「偉大」為主軸的政策。法國強調國家自主性的政治傳統，根植於過去歷史體驗。十九世紀，法皇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馳騁歐洲大陸，法國帝國疆域幾乎涵蓋全部歐洲國家；二十世紀初的兩次世界大戰，法國歷經慘勝後又近乎滅國的痛苦。這種從世界霸權變成敗戰次等國家的極端歷史體驗，讓法國在二戰結束後，深怕處在美、蘇兩強所建立的兩極國際體系下，再次喪失國家主權。所以，基於維護國家自主性，前總統戴高樂任內奉行外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成為冷戰時期歷任總統遵循的「戴高樂傳統」(Gaullist tradition)。

本章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主要區分成兩個歷史時期：1949-1991年與1991-2009年進行討論。冷戰時期，法國尋求美蘇兩極體系下恢復大國地位，歐洲地緣政治現實使法國不得不重視德國以外的另兩大超強—美國與蘇聯。德國分裂使法國取得相對優勢地位，以主導國家的身份進行歐洲整合，然而在北約組織部分，法國與美國地緣戰略歧異，使得法國與美國漸行漸遠，並且退出北約軍事指揮體系。後冷戰時期，法國試圖藉由歐洲整合以提升全球地緣政治影響力，但遭遇統一後德國的挑戰，加上美國是全球唯一霸權的現實，法國最後調整對北約政策。本章第三節則以地緣政治角度，觀察法國在全球層次以及區域層次內，與美國、德國以及俄羅斯的關係。

第一節 戴高樂主義—現實的困境(1949-1991)

法國外交上的戴高樂主義，會使人聯想從路易十四、拿破崙至拿破崙三世所追求的恢復法國光榮。法國經歷兩次世界大戰，戰後又遭逢殖民地獨立運動，其

國家實力與戴高樂主義對照下，會讓人對法國產生自不量力之感。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凸顯出法國地緣政治的困境，最後表現作為是：法國政府一方面藉國際體制(international regime)壓抑西德，避免德國問題困擾；¹另一方面則退出北約軍事指揮體系，成為北約「半會員」狀態，藉此創造法國的外交空間。

一、優先處理德國問題

法國為歐洲大陸傳統強權，地理位置毗鄰地中海與大西洋，歷史上為海上貿易與殖民國家之一。無可避免地，法國歷史發展需同時考量海權與陸權，但亦容易陷入資源分配問題。²本文前兩章所描述的法國地緣政治歷史，即看出法國的這項困境，歷史發展亦呈現出法國並無法同時負載海權與陸權的競逐，縱然是路易十四以及拿破崙時期亦是如此。然而，二戰結束後法國受到冷戰兩極體系限制，海權與陸權的發展受到美國和蘇聯的制約。對法國而言，相對於西南部庇里牛斯山(Pyrenees)、中南部阿爾卑斯山(Alps)等天然險阻，其地緣政治的核心關注在東方。從路易十四到拿破崙，法國政治權力擴張的地理路徑從西往東，橫越北歐平原(North European Plain)、³直搗俄羅斯。北歐平原為權力真空地帶，由眾多小公國組成，並不會嚴重危害法國東疆，因此法國能將資源與注意力放在大西洋歐洲國家，像是西班牙與英國。但在 1871 年德國統一後，法國不得不嚴肅看待東邊統一的德國，及其可能對法國的傷害。⁴

¹ 本文所指的國際體制乃指國家之間的合作機制，包括國際組織以及國際制度。法國在戰後對德國外交的主軸即利用國際體制，特別是北約組織以及歐洲共同體（歐洲聯盟），來約束其外在行為，避免戰爭再次發生。

² Hugh Farington, *Strategic Geography: NATO, the Warsaw Pact, and the Superpowers* (New York: Routledge, 2nd Edition, 1989), p. 253; Geoffrey 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Groom Helm Ltd, 1985), p. 88.

³ 北歐平原位於德國與波蘭北部，地理範圍西起萊茵河口，向東延伸至波蘭東部，南接中歐山地，北鄰北海與波羅地海。歷史上北歐平原常成為歐洲強權競逐之地，像是三十年宗教戰爭、瑞典與俄國的大北方戰爭、拿破崙征服等，德意志統一改變此區域的權力平衡態勢。

⁴ 從 1870 年代開始，法國甚至認定德國的威脅勝過俄羅斯，將重兵戍守在東北邊疆，以機動部隊、河岸堡壘以及壕溝等形式部署，預防德國的軍事侵略；另外軍事工業則遠離東北，避免受到衝突影響。請參閱 Jean-Dominique Merchet, “Les Transformations de l’armée française,”

二戰結束後，法國在歷史上首次不受鄰邦威脅，像是義大利、英國、西班牙、比利時、瑞士等國，均與法國維持友善的外交關係。關於德國的威脅，也因為德國分裂，以及法國—西德關係改善而減輕。⁵不過，法國仍得面對戰後歐洲地緣政治的現實：美國與蘇聯在歐洲大陸的對峙。雖然法國並非處於衝突前線，但是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以及西德等國，並無法獨立對抗蘇聯及其東歐集團，所以美國與英國軍事力量介入歐洲大陸，能夠達到權力平衡態勢，亦符合歐洲安全考量。⁶1949年，法國以創始會員國的身份簽署北大西洋條約(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實踐集體防禦(collective defense)的概念，目的在於歐洲大陸建立新的權力平衡。⁷

法國處理德國問題的態度相當明確，戴高樂戰後強調歐洲問題的核心為德國，法國對德國未來的主張為：(一)維持邊界現狀，即不得回到戰前邊界，包括接受德國、波蘭邊界、不得再要求捷克領土，以及不得合併奧地利；(二)不得保有或製造核子武器，如此才能夠保證大西洋東岸到烏拉爾山以西之間的區域安全；(三)促進法國與德國兩國人民的交流溝通，增進兩個民族的相互理解。⁸易言之，法國希望看到未來統一的德國，能夠放棄領土野心以及核武，最重要的是，根絕德國向外侵略的意圖與實力。冷戰時期德國分裂的事實使法國處於相對優勢，能主導並推動軍事與經濟等兩個途徑，將西德納入歐洲整合體制。軍事整合途徑部分，西德所擁有人力、工業資源，無論對美國或是蘇聯，都極具關鍵意義，倘若喪失西德，即意謂喪失潛在的財富、技術與工業資源，而北約如果增添西德實力的話，則有助於抗衡蘇聯。西德地緣政治優勢地位，更為法國爭取戰

Hérodote, No. 116 (2005), p. 64.

⁵ Hugh Farington, *op. cit.*, pp. 252-3; Charles de Gaulle, 尹國祥、郭彥譯，戴高樂從政回憶錄（台北：黎明文化事業，1975），頁159。

⁶ Michael Creswell, *A Question of Balance—How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reated Cold War Europ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7.

⁷ 北大西洋條約共十四條，其中第五條關於集體防禦的內容為：「任何締約國在歐洲或北美洲受到武力攻擊時，應視為對全體會員國的攻擊，每個締約國得依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所承認的個別或集體的自衛權，立即以個別或集體方式採取其認為必要的行動，包括使用武力在內，以維持北大西洋地區的安全。」這項集體安全的保證，賦予北約會員國軍事行動的合法性，並運用軍事威嚇方式，減少東、西陣營可能的軍事衝突。

⁸ Charles de Gaulle, 戴高樂從政回憶錄，頁165-166。

略反應空間，使法國免於直接對抗東歐集團。

因此，對法國來說，軍事途徑最佳選項有二：將西德納入既有的北約架構下，或者是成立新的歐洲軍事整合體制。

事實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國即思索如何透過軍事途徑預防軍事衝突再起，當時主流的想法是希望藉由各國軍備裁減，根絕大規模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法國當時就提出在國際聯盟的架構下，成立一支國際警察部隊，主要大國將攻擊部隊納入國際聯盟管轄，用以遏止與懲戒戰爭行為。⁹法國的提議雖受到小型國家支持，但在美國、英國以及德國的反對下而作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地緣政治發生鉅變，法國對德國的安全關切依然不變，然而中東歐國家成為蘇聯共產陣營的成員，與美國領導的西方陣營對峙，法國過去慣用的外交槓桿不復存在。此時期不同的是，兩次戰爭損失慘重的教訓，美國和英國放棄過去外交孤立的傾向，積極介入歐洲大陸事務。法國的困境在於，無法忽視美國在西歐的軍事優勢，以及蘇聯對西歐的軍事威脅。西歐國家至今能避免蘇聯勢力侵入，美國以及主導的北約組織扮演關鍵角色，分裂的德國雖未能對法國安全造成立即危險，繼續壓制符合法國對德國的地緣戰略，不過若是美國支持且要求西德在歐洲扮演更重要的政治、軍事角色時，法國勢必得重新調整對德國的地緣戰略。

1950 年開始，美國即要求北約在歐洲多國部隊架構下，允許西德重新武裝並且加入北約。美國對西德的這項政策意涵，除具備圍堵蘇聯勢力的地緣政治外在考量、分擔軍事成本外，北約亦能透過內部機制管控西德軍隊，免除其他歐洲國家的疑慮。¹⁰從這觀點來看，法國與美國的立場一致，差異點在於，究竟是由美國主導？還是法國主導？

不過，從法國總理普列文(René Pleven)提出「普列文計畫」(Pleven Plan)，呼籲成立歐洲防衛共同體(The European Defence Community, EDC)¹¹的反應來看，法

⁹ E. H. Car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1919-1939*(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4), p. 184.

¹⁰ Michael Creswell, *op. cit.*, pp. 2-3.

¹¹ 歐洲防衛共同體的目的，是要建立一歐洲聯軍，包括法國、西德、義大利、荷比盧等國軍隊

國政府想要建立新軍事聯盟，進行主導的意圖明顯。歐洲防衛共同體的原始建議來自莫內(Jean Monnet)，用意在於將西德軍隊納入共同防衛體系，避免西德擁有本國軍隊，並於共同體內設置超國家的決策機制。但因顧忌國防自主權受影響，將限制法國的海外軍事行動，並且增加軍事成本等原因，1954年8月法國國民議會否決此項提案，歐洲防衛共同體宣告失敗。法國並不相信美國以及英國對歐洲的安全保證，歐洲防衛共同體亦牽涉到法國與蘇聯雙邊關係，蘇聯雖是西歐國家最大的安全威脅，法國仍希望與蘇聯進行和平對話，成立歐洲防衛共同體，將可能傷害巴黎與克里姆林宮之間關係，加劇彼此間的軍備競賽。

同年9月，法國外交官法蘭斯·彭謝(André François-Poncet, 1887-1978)提出法國接受西德重新武裝以及加入北約的條件為：(一)西德不得在此架構外，逕自發起軍事行動；(二)西德軍隊與盟國軍隊混合編隊；(三)西德不得使用武力，奪取失去的領土；(四)美國與英國應在歐洲大陸以及西德境內，部署最大程度的軍力；(五)加強北約最高指揮部的權力。¹²簡言之，歐洲防衛共同體失敗後，法國更沒有理由阻擋西德加入北約，而且除了北約外，法國也找不到更適合的軍事體制來規範西德，處理東邊的德國問題。

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德國重新武裝並且加入北約，能夠和緩來自蘇聯的壓力，而且美國和英國承諾增加駐守西德的地面部隊，亦能夠減輕法國對西德的疑慮。更重要的是，當時法國擠進核武擁有國家，雖然數量遠不及美國和蘇聯兩國，不過相較於西德，法國的核武優勢能夠增加安全感。¹³1948年發生捷克布拉格之春事件後，法國亦開始注意到蘇聯主導歐洲的企圖，認知到處理德國問題與避免蘇聯勢力威脅必須同時進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國能夠運用國際聯盟以及軍事同盟方式，對德國進行圍堵；然而此時期法國外交選擇空間更狹窄。嚴格說來，法國不算是戰勝國，戰後經濟仍待復甦，中東歐過去的盟國已成為蘇聯的附庸國，法國並無能力主導歐洲，甚至被視為二等國家。法國只能選擇與美國以及英

組成。1952年5月這六國簽署條約，但在1954年8月，法國議會以264對319票否決此案。

¹² Michael Creswell, *op. cit.*, p. 161.

¹³ Michael Creswell, *op. cit.*, p. 5.

國合作，接受集體安全模式，維護歐洲乃至於法國的安全。

另一方面，法國則是從控制煤礦與鐵礦等戰略物資，開始主導歐洲經濟整合。1950年5月9日，法國外長舒曼(Robert Schuman)提出「舒曼計畫」(Schuman Plan)，包括法國、西德、義大利、荷蘭、比利時與盧森堡等六國簽署「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由莫內擔任首屆主席。舒曼主要目的為，整合法國洛林區(Lorraine)的鐵礦，以及西德魯爾區(Ruhr)與薩爾區(Saar)的煤礦，將其置於超國家機構管理。法國的歐洲經濟整合構思於1929年法國外長布里安(Aristide Briand)在國際聯盟發表演說時，所倡議的歐洲成立超越主權國家的歐洲聯邦(federation)。其想法結合政治與經濟整合，即建立歐洲政治機構，負責仲裁以及維護歐洲安全，並且建立人員、貨物和資金都能自由流通的共同市場。法國的動機仍是針對德國，希望能制約德國，將德國嵌入政治與經濟相互依賴的歐洲。¹⁴

從地緣政治觀點來看，法國東部洛林—亞爾薩斯(Lorraine-Alsace)地區、德國西部萊茵河地區，以及荷比盧南方地區，為歷史上的邊疆(frontiers)區域，邊疆乃指相鄰國家之間的區域，政治邊疆常隨歷史發展而變動，非限於自然的地理環境。弗列德曼(George Friedman)使用「邊境地」(borderland)描繪不同時間由兩國分別輪流佔領的區域，除法、德間洛林—阿爾薩斯地區外，世界上的邊境地尚包括：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的喀什米爾、英國與愛爾蘭之間的北愛爾蘭、塞爾維亞與阿爾巴尼亞之間的科索沃等。此區域混合不同文化、語言，甚至居民對國家的認同亦不同。換言之，此區域的複雜性為歷史發展的結果，並且蘊含地緣政治衝突的潛在可能。¹⁵像洛林—亞爾薩斯地區就因法、德兩國的權力消長而多次易手，成為地緣政治衝突的核心。此區域亦是西歐的重工業密集區，煤礦及鐵礦為重要的戰略物資，發展工業化與發動戰爭的基礎，亦成為德國發起兩次世界大戰的根源。所以，推動此邊疆區域的經濟整合，將有助於降低衝突發生。莫內在推

¹⁴ William R. Keylor, 蔡百詮譯, 二十世紀國際史 (台北: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1989年), 頁147。

¹⁵ 請參閱 John O'Loughlin (ed.), *Dictionary of Geopolitics*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4), p. 84; George Friedman, *The Next 100 Years* (New York: Doubleday, 2009), pp. 83-84.

動歐洲煤鋼共同體時便強調，德國問題是歐洲經濟整合的核心，如果不迅速控制其工業生產與競爭能力，最終將危害法國經濟復甦。¹⁶此外，1957年法國推動另一經濟整合體制「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更緊密地嵌入西德。

戰後初期，無論是軍事或是經濟整合途徑，法國想運用制度來約束西德的意圖甚為明顯。法國政府優先處理德國問題，就地緣政治的觀點來看相當合理，而這些措施也透露出以下訊息：蘇聯及東歐集團的威脅甚於西德，以及法國權力已經衰退的認知。如何調整並且面對冷戰的新情勢，將會影響法國與北約之間的關係。

二、法國與北約

法國將西德嵌入多國組成的國際體制，特別是北約以及歐洲經濟共同體，固然能夠減輕對西德的不安，但緊接著擔憂受美國控制，喪失國家自主性的惡夢，又考驗著法國與北約的關係。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 1945)後的兩極體系，使得歐洲國家成為美國以及蘇聯的附庸國，這種情況與法國全球影響力衰退的窘境，共同構成戴高樂主義形成的背景，最後促使法國退出北約軍事指揮體系，並執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法國退出北約軍事指揮體系可以解釋為戴高樂政府試圖恢復法國光榮所做的努力，但更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乃突顯法國全球地緣政治影響力在兩次世界大戰後迅速衰退，以及法國與美國基於地理位置不同，而顯現兩國地緣戰略的差異。

¹⁶ Jean Monnet, 孫慧雙譯, 歐洲之父—莫內回憶錄(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89), 頁 96-97。

（一）法國全球地緣政治影響力的迅速衰退

縱然法國成功地制約西德，暫時解決德國問題，不過，這並非代表法國已從戰後迅速復甦，相反地，法國卻得面臨全球影響力衰退的現實。戰爭結束後，法國第四共和政府制訂的法國大戰略(*la grande stratégie française*)，主要三點目標為：(一) 面對德國不確定性的威脅時，保證法國的國家安全；(二) 確立法國為西歐主要強權，與蘇聯維持在 1945 年的關係；(三) 維持法國聯盟(*Union française*)，並且維護法國的全球性角色，¹⁷這三點目標彼此關聯，德國為法國地緣政治首要考量。法國藉由戰後國際體制的安排暫時完成首要目標，不過在維持強權地位以及保持全球影響力部分，卻遭受嚴酷的考驗。法國除戰後國內政治經濟混亂仍待恢復外，仍須面對國外殖民地追求獨立的問題。

二戰之前，法國為僅次於英國的海外殖民帝國，其全球地緣政治影響力主要在地中海區域（北非、西非、中東）以及中南半島。法國第四共和憲法中的法國聯盟，主要仿效大英國協模式，規範法國帝國與殖民地自治政府之間的關係，使法國的全球影響力能夠繼續維持。戰後全球殖民地獨立運動在全球各地不斷發生，法國首要面對中東殖民地獨立運動，在英國干涉下，敘利亞與黎巴嫩在戰爭結束後不久即宣佈獨立(1946)，並且獲得國際承認，兩國的獨立削弱法國對東地中海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其次，在中南半島的危機，歷時長達八年的越南戰爭(1946-1954)，最後以法軍撤退的方式結束。法國越戰對其財政造成嚴重負荷，內部上對是否加稅或增加軍備支出爭論不休，此時西德若能夠重新武裝，將可以減輕法國在歐洲的防衛負擔。因此，法國戰後困境，間接影響法國對西德重新武裝的立場。

從地緣政治的意義來說，法國正式宣告其影響力從西太平洋消退。緊接著越戰結束後，北非阿爾及利亞爆發獨立戰爭(1954-1962)、突尼西亞與摩洛哥宣告獨

¹⁷ Jean-Sylvestre Mongrenier, *La France, L'Europe, L'OTAN—Une Approche Géopolitique de l'atlantisme Français* (Paris: Editions Unicomm, 2006), p. 25.

立(1956)等事件，間接導致法國第四共和政府下台，法國聯盟亦隨之宣告解體。

法國對北非殖民可追溯至十九世紀，當法國征服馬格里布(Maghreb)，即阿爾及利亞與鄰近摩洛哥、突尼西亞所構成的區域時，可以說西地中海已經成為法國的行動區域。¹⁸法國從馬格里布獲得可觀的農業財富，例如酒、小麥、柑橘等產物，其亦提供法國所需的鐵礦沙和硝酸鹽。隨著該區發現石油和天然氣，法國同樣從中獲得能源供應。¹⁹然而，隨著突尼西亞與摩洛哥獨立，法國最後依據全民公投結果，允許阿爾及利亞獨立(1962)。戴高樂於回憶錄當中論及阿爾及利亞問題時，曾提到使用同化方式融合伊斯蘭人民和法國民族的解決方案，即法國本土與阿爾及利亞交換大量移民，政治上享有平等權利；或者，建立阿爾及利亞自治政府，再以聯邦或邦聯方式逐步和法國政府政治整合。然而，這些解決方案在現今並不適當，主要因為兩地人民宗教、文化、種族、政治權利等差異過大，強制同化將會導致更大反彈。²⁰

戴高樂對阿爾及利亞獨立問題的解決方式，對照他常談論的法國光榮，似乎產生矛盾，而這其實僅僅反映戰後法國權力受限的窘狀。科恩(Saul B. Cohen)對此評論為，法國無法獨立支配北非，而需要其他歐洲國家的協助，透過大西洋、地中海航線與地中海島嶼，進行戰略支配北非的目的，並且遏阻共產勢力經北非侵入歐洲的可能性。²¹的確，戰後殖民地獨立過程往往給予共產勢力滲透的機會，越南即為一例。阿爾及利亞和歐洲大陸僅隔地中海，假如落入共產陣營，將可能危害歐陸西方國家的安全。因此，法國與新阿爾及利亞與突尼西亞進行經濟和軍事協議，確保法國在撒哈拉區域的石油利益與核武試驗權利。

戴高樂希望法國能夠在國際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並且維持強權的地位，不過，其主張與作法與美國差異頗大，導致後來大西洋聯盟出現裂痕。

¹⁸ Saul B. Cohen, *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a World Divid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nd Edition, 1975), p. 183.

¹⁹ *Ibid.*, p. 185.

²⁰ Charles de Gaulle, *戴高樂從政回憶錄*，頁 41。

²¹ Saul B. Cohen, *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a World Divided*. pp. 183-184.

（二）美、法兩國的地緣戰略差異

歐洲在戰後經歷權力重組，對照美國和蘇聯的情況，西歐國家的地緣政治明顯處於劣勢。例如，軍事層面上，西歐國家過於依賴美國提供安全保障；第二，陸地上面臨蘇聯的威脅，而且欠缺發動軍事行動的地緣戰略縱深；第三，跨大西洋的海上供應鏈，遭受蘇聯軍事投射能力的潛在威脅；第四，依賴不穩定與不受控制的第三地區（中東），進口所需的能源；最後則是歐洲欠缺政治聯盟，以及獨立自主的防衛共同體。²²如此的地緣政治現實，使得大西洋聯盟產生不平衡現象，美國主導北約軍事指揮體系，對盟國享有極大的政治影響力，法國則積極努力試圖去打破如此現狀。

北約創立前，戴高樂就建議北約任務應適用全球範疇，分別由美國、英國以及法國等三國負責：美國主要負責遠東區域；英國負責東非以及中東區域；法國則負責北非區域。²³1958年，戴高樂向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與英國首相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提出著名的備忘錄，內容建議法國、美國及英國代表組成三邊委員會，成為北約的最高決策機構。²⁴然而，法國卻從兩國得到否定的回覆。此外，法國極力維持全球地緣政治影響力，美國未能提供支援，甚至打壓法國。例如，法國在越戰時發生的奠邊府戰役，美國並沒有提供軍事援助，以及蘇伊士運河危機(1956)，美國與蘇聯聯合對法國施壓等作法，讓法國無法相信美國的立場。²⁵這些事件致使法國政府與北約間關係，從積極參與轉變為逐漸疏離，最後退出軍事指揮體系。

²² Panayiotis Ifestos, *Nuclear Strategy and European Security Dilemmas—Towards an Autonomous European Defence System?* (Brookfield: Gower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88), p. 77.

²³ Michael M. Harrison, *The Reluctant Ally—France and Atlantic Security*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62.

²⁴ *Lettre et Memorandum du General de Gaulle au General Eisenhower* (17 septembre 1958), <http://www.ena.lu>

²⁵ 1956年，埃及將境內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的舉動，引起英國及法國強烈不滿，在密會以色列後，三國發起對西奈半島的軍事攻擊，最後，英、法、以三國在美國與蘇聯的強大壓力下撤軍。對法國來說，此事件的結果不僅代表法國在中東區域的勢力衰微，更強化法國對美國的不信任感。

法國名義上雖然支持北約這一集體安全組織，但實質上仍希望建立組織內的聯盟，即透過主要國家間的特殊權力關係，主導並處理國際事務。戴高樂主義外交政策將同盟或聯盟關係，視為國家達成目標的靈活工具。遇到國家間利益衝突時，國家應當享有行動自主性，國防除防衛的意義外，特別是國家獨立自主的象徵，也是國家理性的基本條件，才能達到國家目標。因此，無論是雙邊或是多邊的國家合作，法國希望藉此提升國家地位，恢復並成為國際重要的平衡者角色。²⁶法國全球地緣政治影響力迅速衰退，戰後雖仍是戰勝國且擔任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但其國家實力與國際地位顯然有落差。冷戰時期，美國對共產國家採取圍堵戰略，避免共產勢力擴張的骨牌效應，法國在西歐區域固有其重要性，但並不意謂在全球層次上法國依然是美國重要的合作國家。

法國與美國均視蘇聯為主要的安全威脅，不過，法國並不相信美國捍衛歐洲安全的決心，其中最大的地緣差異在於：蘇聯是歐洲強權(a European power)；美國則是在歐洲的強權(a power in Europe)。法國領土直接面對蘇聯侵略的威脅，而美國本土遠離歐洲大陸，隨時可將軍隊撤回，重回過去的孤立政策。甚至，歐洲大陸果真爆發軍事衝突，美國在軍事戰略的考量，主要為投射武力；但對西歐國家而言，則是直接在領土前線作戰。²⁷特別地，針對美國的核子嚇阻戰略(nuclear deterrent strategy)，法國不認為美國能像古巴危機，展現不惜毀滅的決心，來處理歐洲軍事衝突。1960年代，美國的核子戰略從「巨型報復」(massive retaliation)轉變為「彈性反應」(flexible response)後，更加深法國的疑慮，堅定其發展並且擁有核武的決心。²⁸法國人的思維可由當時的國防部長德布雷(Michel Debré)發表在美國外交事務的文章看出，他認為核武殺傷力強大，對歐洲而言，核子戰爭意謂決定性毀滅，若是缺乏保證毀滅的決心，是無法真正遏止核戰爆發。因此，

²⁶ Michael M. Harrison, *op. cit.*, pp. 51-57.

²⁷ Jolyon Howorth, "La France, l'OTAN et la Sécurité Européene: Statu Quo Ingérable, Renouveau Introuvable," *Politique Étrangère*, Vol. 67, No. 4 (2002), p. 1003.

²⁸ Panayiotis Ifestos, *Nuclear Strategy and European Security Dilemmas*, p. 276; Michael M. Harrison, *op. cit.*, p. 75; Charles de Gaulle, 戴高樂從政回憶錄，頁 202。

法國擁有核武，符合所有歐洲國家的安全利益。²⁹

法國與美國之間的地緣戰略歧異直接反映到美國的歐洲政策。1965年3月，當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總結美國的歐洲政策為：(一)增加北約依賴傳統軍事武力的程度，提高擁有核子武器的門檻；(二)無論傳統武力或是核武方面，美國應加強對北約軍事行動的控制；(三)獲取更多美國戰略核武在全球使用的自由；(四)除美國部署在歐洲的傳統武力外，避免歐洲得以否決使用、控制或者管理美國核武力量；(五)增加美國對歐洲國家的核武控制，不鼓勵其發展獨立的核武力量。³⁰法國與美國的相同點為，兩國皆不希望自己擁有的核武受到國外控制，亦即，核武使用與否端賴本國政府決定。這對美國在歐洲的核武政策產生一連串疑問：西歐若面臨蘇聯的核武威脅，美國將如何回應？從哪裡回應？何時回應？於是，美國調整核子戰略為彈性反應時，更引起法國的質疑，並堅定其獨立自主的核武政策。

(三) 法國退出北約軍事指揮體系

1966年3月7日，戴高樂宣布法國退出北約軍事指揮體系，開啟法國外交政策的第三條路。法國與北約關係的疏離早在1959年就有跡可循，當時法國地中海艦隊退出北約指揮部，拒絕美國在法國境內儲存核武，以及宣布發展核武等作為，即反映美、法兩國的地緣戰略殊異。³¹法國承認聯盟的重要性，但又強調國家自主決策，以維持法國海外軍事行動，尤其是大西洋與地中海的自主能力。³²這導致法國雖然退出北約軍事指揮體系，但亦維持會員國身份的奇特現象。法國藉此特殊身份，試圖扮演歐亞大陸的新權力平衡者角色，並且拓展與第三世界的外交關係。

²⁹ Michel Debré, "France Global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 49, No. 3 (Apr, 1971), pp. 397-398.

³⁰ Michael M. Harrison, *op. cit.*, p.74

³¹ Jean-Sylvestre Mongrenier, *op. cit.*, p. 33.

³² Michel Debré, "France Global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 49, No. 3 (Apr., 1971), pp. 399-400.

法國終結與北約的軍事關聯直接作為是，三軍不再受北約軍事指揮，並要求原位居法國境內的司令部、北約軍事學院撤出，外國軍隊不得駐紮法國領土。

³³1966年以前，法國已經開始減少參與北約的相關軍事活動，並且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例如，拒絕美國在法國境內部署戰術核武，限制法國軍隊整合進入北約軍事體系，法國原意圖掌握北約地中海艦隊，但因美國以及英國反對，最後法國從北約撤走海軍以及軍事人員。法國對北約政策的轉彎，使其不再成為北約後勤補給基地與歐洲指揮中心，迫使北約盟國得從荷比盧以及西德等港口進口戰略物資，並遷移司令部與軍事人員。不過，在領空權部分，北約的航空器若要尋找替代航線，以避開法國領空的話，則需要飛過比斯開灣(bay of Biscay)，經過直布羅陀海峽（或直接飛越西班牙領空），替代航線的距離不但較長，而且途中亦需要加油補給，對北約的空權將產生不便。因此，法國能藉領空權的籌碼跟北約談判，持續保留法軍駐紮在西德，建立與北約的軍事合作架構。³⁴

整體而言，法國退出北約軍事指揮體系，締造與蘇聯以及東歐國家更廣的外交空間，從地緣政治來看，乃是理性選擇的過程。³⁵然而，法國維持北約半會員的身份，亦是地緣政治困境下不得不做出的妥協。戴高樂主義並非反對北約，而是要維護國家主權，法國既承認國家權力的侷限，無法獨立主導北約，但又害怕從此受到美國霸權支配，喪失國家自主性。此種外交困境，赤裸裸地體現在法國與北約的關係當中，並影響法國推動歐洲整合的進程，希冀成為抗衡美、蘇的第三勢力。

³³ 位居法國境內的北約組織，包括歐洲盟軍司令部(SHAFE)、轄下的中歐司令部(AFCENT)，以及北約軍事學院等，均需撤離法國。此外，當時美軍駐紮法境內數目約 26000 人、軍眷 37000 人，以及 30 座軍事設施，也一樣撤出法國。請參閱 Michael M. Harrison, *op. cit.*, pp. 144-148.

³⁴ Michael M. Harrison, *op. cit.*, pp. 150-151.

³⁵ 龐畢度(Georges Pompidou)與穆希勒(Couve de Murville)認為，法國退出北約軍事體系是理性行為，此舉能讓法國在危機時刻，享有軍事的獨立決策權。若法國仍在指揮體系內的話，縱然不牽涉到第 5 條的規定，任何東 西陣營之間的衝突，法國都將無法避免而涉入。請參閱 Panayiotis Ifestos, *op. cit.*, p. 278.

第二節 後冷戰時期歐洲地緣政治變動與法國地緣戰略

(1991-2009)

法國戴高樂主義外交政策其正當性建立在對抗雅爾達體系，意圖擺脫美、蘇霸權的束縛。然而，歐洲大陸爆發連串地緣政治事件：中東歐共產政權垮台(1989)、德國統一(1990)以及蘇聯解體(1991)等。促使法國重新審視其歐洲政策，特別是德國及中東歐的戰略真空，對法國將造成的影響。此外，法國與美國、北約的關係，在歷經巴爾幹半島危機、阿富汗軍事行動(2001)及兩次伊拉克戰爭(1991, 2003)後，法國對北約的政策趨向積極，並且視美國與歐洲、北約與歐盟為互補關係，認為雙方應共同合作來面對全球威脅。最後，薩科茲政府選擇全面性重返北約，不僅意謂法國從反美到親美的政策轉變，同時也顯露法國藉著北約重返全球地緣政治的意圖。

從巴爾幹半島危機與美國拒絕法國重返軍事組織的提議等兩個事件，可以劃分後冷戰時期法國與歐盟、北約組織關係為三階段：1989 到 1992 年，法國試圖主導歐洲防衛自主，以抗衡美國主導的北約；1993 到 1997 年，巴爾幹半島危機使法國體會到歐洲防衛自主尚嫌不足，而且德國統一後具備挑戰法國在歐洲的地位，促使法國政府轉向積極與北約合作；1998 年到 2009 年，則是維持法國與北約的密切合作關係，並於 2009 年正式重返北約軍事組織。

一、 抗衡：主導歐洲防衛自主(1989-1992)

美、蘇兩超強體系的瓦解，對法國而言是機會也是威脅。機會在於，前共產集團的軍事威脅消失，美國與北約在歐洲的軍事角色，不再具備正當性。法國能透過歐洲整合，從經濟擴及到政治和軍事層面，以主導國姿態帶領歐洲站上國際

舞台，發揮法國的國際影響力，實現戴高樂的目標；威脅則在於，地緣政治變動後導致的權力版圖重組，法國東邊需再次面對統一、強大的德國，同時也要面對蘇聯勢力消退後產生的戰略真空，及其導致的潛在區域衝突與紛爭。顯然地，法國在後冷戰初期，積極推動歐洲自主防衛，想要利用這機會來克服可能的威脅。

德國統一後衝擊法國的地緣戰略，法國與德國的權力關係改變，³⁶讓法國驚覺歐洲的整合，包括政治、經濟與軍事，將可能轉由德國來主導。³⁷此情景類似1871年普魯士統一德意志時，發生法國與德國權力消長情況，德國主導歐洲發展數十年。冷戰低盪時期(détente)，法國的軍事地位隨著軍備管制，蘇聯從中東歐大規模撤軍後，逐漸喪失價值。法國害怕德國重燃對中歐(Mitteleuropa)的興趣，無論德國自己對中東歐進行支配，或者是與蘇聯（俄羅斯）合作，法國都將遭受孤立和被邊緣化，甚至被迫與其合作。³⁸蘇聯解體遺留的中東歐戰略真空，法國雖可趁機拓展與這些國家的外交關係，恢復二戰前的法國以及小協約國的關聯，然而德國因地理毗鄰之便，對此區域的政治和經濟關係遠勝過法國。法國與德國雖不太可能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但德國國家整體實力勝過法國的客觀事實，令其不免擔憂歐洲將會受到德國支配。

法國對德國統一的擔憂，影響其對北約的存續考量，產生的矛盾點在於：首先，希望美國軍隊以及核武繼續留在歐洲，但排除在法國領土之外，以平衡歐洲新秩序；其次，支持德國繼續留在北約架構，避免其尋求中立，或者與俄羅斯合作；第三，法國亦希望單靠己力，推動歐洲安全新秩序。³⁹三點矛盾內容表現出法國的困境，一方面，法國希望在維持國家自主性前提，美國軍事勢力繼續留駐歐洲，以制約德國崛起；另一方面，法國卻又希望利用歐洲戰略真空，推動歐洲

³⁶ 1990年9月26日SOFRES所做的民調顯示：79%法國人、82%德國人認為德國統一後在經濟上將超越法國；42%法國人、49%德國人認為德國政治將強過法國（30%法國人、23%德國人則選擇法國）。此外，62%法國人認為統一後的德國將支配歐洲共同體。請參閱 Steven Philip Kramer, "La Question Française," *Politique étrangère*, Vol.56, No. 4 (1991), p. 962.

³⁷ Stanley Hoffmann, "Dilemmes et Stratégies de la France Dans la Nouvelle Europe (1989-1991)," *Politique étrangère*, Vol.57, No. 4 (1992), pp. 881-884.

³⁸ David S. Yost, "France in the New Europe," *Foreign Affairs*, Vol. 69 (1989), pp. 113-115.

³⁹ *Ibid.*, p. 122.

自主防衛。總的來說，除非德國分裂或消失被佔領，否則其將一直是法國地緣戰略主要對手。所以，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執政時期(1981-1995)才會重申無意願改變北約軍事指揮體系與戰略，維持法國與北約的關係現狀。⁴⁰法國仍需要美國勢力繼續待在歐洲，不過認為北約的重要性將會逐漸消微，最後由歐洲人建立的安全體制取代。

1990 年代開始，法國積極推動歐洲防衛暨安全倡議(European Defence and Security Initiative)，鼓吹西歐聯盟應該扮演更重要角色，而非僅是北約的輔助機構。實際上，缺少德國的參與，歐洲防衛自主計畫不可能達成。從 1987 年開始，法國與西德開始嘗試建立人員混編而指揮共同的「法德混合旅」，作為未來歐洲聯軍的基礎。1991 年，法德宣布成立歐洲聯軍，比利時、西班牙以及盧森堡等國軍隊陸續加入。法國無法忽視德國強大的實力，同時也需考量如何進行管理，因此，強化「法德軸心」的歐洲整合進程，最能夠符合雙層目的：歐洲層次部分，延續過去法國的整合途徑，更深入地將德國鑲嵌在政治、經濟與軍事的體制內，並且維持法國領導的地位；全球層次部分，歐體（歐盟）將隨著德國統一，能夠增加全球影響力。此外，法國亦鼓吹在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Conference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SCE)架構下，⁴¹與俄羅斯、前蘇聯共和國以及中東歐國家進行安全對話，盡量稀釋北約的影響力及其存在的正當性。

法國不希望北約立即解散，並且利用冷戰結束的契機，加緊推動歐洲政治整合。1990 年的北約倫敦高峰會，法國反對北約政治化，不希望其轉型為政治合作組織，堅持北約為純粹的軍事組織，任務限制在第 5 條範圍內即可（請見註 13），其餘的任務則交給歐洲人自行處理。法國並在 1990 以及 1991 年的政府間會議(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中，促使歐體會員國以西歐聯盟(West European Union)為主體，採取共同防禦政策。此外，法國與德國在歐洲聯軍基礎下，共同

⁴⁰ *Ibid.*, p. 119.

⁴¹ 該會議於 1973 年首次召開，主要提供冷戰東、西陣營之間的對話場域。1995 年，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改名為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目前包括來自歐洲、北美、高加索、中亞等 56 個國家成員。

宣布將加強雙邊軍事合作，並且歡迎其他西歐聯盟會員國參與。⁴²1993年11月，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n the European Union, TEU)正式生效，內容當中除實現貨幣聯盟外，並賦予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內涵。⁴³到目前為止，法國擘畫的歐洲藍圖完成架構，接下來才是實際運作的挑戰。

後冷戰初期，法國理想中的歐洲願景為：法國領導的歐盟扮演全球性角色，取代蘇聯成為全球權力平衡的關鍵行為者，以及成為區域與全球層次的衝突調停者、和平締造者。伊拉克戰爭期間(1990.8-1991.2)，法軍接受美國的指揮，並且允許盟軍 B52 型轟炸機使用境內基地，此轉變已透露出法國的全球意圖，準備在歐洲區域外，並不限於非洲大陸，進行軍事任務。⁴⁴南斯拉夫內戰導致的地緣政治衝突，正好考驗歐盟的衝突處理能力，當時部長理事會主席包斯(Jacques Poos)，在內戰爆發數個月後，甚至自信地認為「現在正是歐洲時刻」(this is the hour of Europe)。⁴⁵然而，歐盟的軍事干預以失敗收場，最終仍待美國以及北約軍事介入後，巴爾幹衝突才算是受到控制。⁴⁶如此與期望落差的結果，影響法國對北約的態度，使其轉向積極參與北約的事務。

⁴² Anand Menon, "From Independence to Cooperation: France, NATO and Europe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1, No. 1(1995), p. 22-23.

⁴³ 重要的部分包括：以部長理事會一致決為基礎，輔以條件多數決；將西歐聯盟納入歐洲聯盟架構內，作為歐盟的防衛工具，並與北約進行合作。請參閱 <http://eur-lex.europa.eu/en/treaties/dat/11992M/htm/11992M.html#0104000047>

⁴⁴ Steven Philip Kramer, *op. cit.*, pp. 960-963.

⁴⁵ Christopher Hill, "Closing the Capabilities-Expectations Gap?" John Peterson and Helene Sjurgen (eds), *A Common Foreign Policy for Europe? Competing Visions of the CFSP* (New York:Routledge, 1998), p. 20.

⁴⁶ 巴爾幹危機凸顯美國與歐洲國家之間軍事力量的鴻溝，除武器、人員運送皆仰賴美國外，軍事行動所需情報幾乎(99%)來自美國情報單位。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就算是地理位置相鄰，歐洲盟軍所能部署的軍事能力相當有限，縱然是貢獻最多的英國，也不過提供4%的飛機，以及4%的炸彈。請參閱 Robert Kagan, 蕭蓉、魏紅霞譯，*天堂與實力*，(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頁70-71。

二、 轉變：積極參與北約事務(1993-1997)

法國特殊的國際地位是建立在以下條件：對德國享有政治優勢；擔任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核武嚇阻能力。然而，隨著德國統一、聯合國功能不彰，以及蘇聯解體後，構成法國獨特性的條件不復存在。⁴⁷密特朗政府原冀望歐洲整合，能夠維持法國的國際地位，繼續限制德國的影響力，並最終取代北約的軍事角色。不過，南斯拉夫內戰不僅彰顯歐盟能力欠缺外，更顯示地緣戰略的歧異仍待克服：德國率先承認克羅埃西亞與斯洛維尼亞的獨立，與其他會員國產生嚴重分歧，這意謂西歐國家雖站在同一陣線，但並未形成歐洲共同利益，個別國家的外交政策仍優先於歐洲整體考量。⁴⁸而且，美國剛開始的消極作為，反而凸顯歐洲安全的脆弱性，美國軍事權力仍有存在歐洲的必要性。

因此，法國最務實的方式為繼續推動歐洲的政治整合，並且重新思考與北約的關係。冷戰結束後，檢討過去戴高樂對北約政策的聲音不斷，例如，前國防部長喬斯(Pierre Joxe)認為法國的地緣戰略位置正在改變，需要改變對北約的關係，增加法國與北約的政治和軍事對話。⁴⁹席哈克擔任巴黎市長時，評論歐盟處理南斯拉夫衝突的失敗經驗時強調，法國若想在歐洲防衛上扮演決定性角色，就必須考量同盟國的想法，並且重新審視大西洋同盟關係。⁵⁰1993年，密特朗政府改變過去重歐盟輕北約的政策傾向，支持美國在歐洲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並開始參與北約軍事委員會。⁵¹法國在席哈克執政期間(1995-2007)更積極重返北約，幾乎達到全面參與的程度。簡言之，法國的戰略思維也同樣轉變，選擇與北約合作

⁴⁷ Daniel Vernet, "The Dilemma of French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8, No.4 (Oct. 1992), p. 656.

⁴⁸ John Peterson and Helene Sjursen, "Conclusion—The Myth of the CFSP?" John Peterson and Helene Sjursen (eds), *A Common Foreign Policy for Europe? Competing Visions of the CFSP*, p. 172.

⁴⁹ Frédéric Bozo, "France," Michael Brenner(ed.), *NATO and Collective Security*(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INC, 1998), p. 43.

⁵⁰ Hans-Georg Ehrhart, "France and NATO: Change by Rapprochement?" Heft 121, Hamburg, (Januar 2000), p. 15, <http://www.ifsh.de/pdf/publikationen/hb/hb121.pdf>

⁵¹ *Le Figaro*, 13 Mars, 2009, <http://www.lefigaro.fr/international/2009/03/11/>

的方式來增加法國的影響力。

從密特朗到席哈克執政期間，法國積極參與北約委員會，並且加入北約的軍事任務。北約三十八個委員會當中，除核子計劃組(the nuclear planning group)與防衛計劃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defence planning)等未加入外，法國代表全程參加其餘三十六個委員會。軍事上，法國亦參加北約在波士尼亞、科索沃以及阿富汗的維安任務，至今派遣軍隊超過四千人；另外在財政上，法國為北約第五大財政供應國，相較於 2007 年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的 2 億歐元預算，2006 年法國即提供 1 億 5 千 6 百萬歐元給北約。⁵²簡言之，法國與北約的關係，從冷戰時期的半會員狀態，逐步轉向積極參與，歐洲雖然同步發展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然從經濟以及軍事結構來觀察，其影響力仍比不上北約。

整體而言，法國對北約的貢獻度與其影響力不成比例，因此，席哈克政府推動重返北約的過程當中，即主張組織內部改革，讓歐洲人承擔更多責任。例如，歐洲盟軍司令部最高指揮官應由歐洲人擔任，並同時擔任西歐聯盟的指揮官，有益於兩個組織的協調與合作；而且，執行北約軍事任務的指揮體系，除非符合第 5 條主張的任務，否則應視聯軍組成而彈性調整，而不是僵固的指揮結構。⁵³法國希冀在新北約和新組織底下，能由法國主導、歐洲人積極參與，但在 1996 年，當法國要求位於義大利那不勒斯(Naples)的南歐司令部(AFSOUTH)指揮官職務為條件，用以交換法國全面性回到北約時，翌年美國明確的表示拒絕，導致法國全面性重返北約破局。

法國對南歐司令部指揮官職務的興趣，源自於傳統的地中海地緣政治利益。1994 年出版的「國防白皮書」內容當中，法國即定義其戰略利益(les interest stratégique)的地理範疇：從東歐及南歐，向南延伸至地中海盆地，向東延伸至中

⁵² Leo Michel, "France's Return to NATO Can Complement EU Security," *Speigel*, 6 Dec. 2008,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0,1518,drunk-559304,00.html>

⁵³ 法國希望北約依據軍事貢獻程度，調整職務的人士安排，由更多的歐洲人擔任重要職務，特別是法國軍官的人事安排，以提升法國在北約的影響力。請參閱 Stanley R. Sloan, 2003, *Nato,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Atlantic Community—the Transatlantic Bargain Reconsidered* (New York: 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3), p. 169; Janet Bryant, "France and NATO from 1966 to Kosovo: Coming Full Circle?" *European Security*, Vol. 9, No. 3 (Autumn 2000), p. 30.

東區域。此區域亦是法國經濟主要的活動空間，尤其是地中海—紅海—印度洋的海上航線，幾乎佔法國 56% 出口與 82% 進口。⁵⁴這條海上航線往昔為法國與英國競逐焦點，法英也曾因此聯合遏阻俄國勢力滲入東地中海，不過二十世紀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海軍強權，並且掌控地中海的制海權。從法國地緣戰略的觀點來看，地中海區域的穩定格外重要，除要維護法國到北非以及印度洋海上航運安全外，若巴爾幹半島或中東爆發危機，南歐司令部位居地理優勢，能夠立即前往支援處理。然而，南歐司令部編制包括美國海軍第六艦隊，法國主張歐洲人擔任指揮官的提議，抵觸美國的武力使用政策，最後在無意願分享權力並將指揮權交給歐洲人的前提下，美國拒絕法國的提案。法國為解開僵局，建議在那不勒斯成立兩個司令部：美屬司令部負責第六艦隊、集體安全以及涉及美軍的維和行動；歐屬司令部則專注在本身的維和行動。不過，美國最後仍拒絕此解決方案。

55

法國對南歐司令部的提案已透露政策轉向，在更早的國防白皮書(1994)即正式承認，北約、西歐聯盟以及歐盟為歐洲主要安全架構，三者應彼此協調合作，摒除相互競爭的觀念。法國最主要的轉變為，不再視大西洋同盟關係為發展歐洲防衛自主的障礙，承認美國的重要性，並且接受北約擴大的原則。席哈克政府所推動的「再平衡政策」(Rebalancing Policy)，即著重美歐兩者之間對歐洲安全的合作關係，通過歐盟以及大西洋聯盟兩者雙管齊下，讓歐洲人肩負更多責任。同時這亦表示，北約繼續存在以及未來的擴大，均有助法國維護其戰略利益。更重要的戰略意涵是，法國拉近與北約的關係，特別是加強和美國與英國之間的關係，則是隱含對德國的平衡作用。

⁵⁴ Le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Livre Blanc Sur la Defense*, 1994, p. 25,

<http://merln.ndu.edu/whitepapers/France1994part1.pdf>

⁵⁵ Janet Bryant, *op. cit.*, p. 32.

三、再加入：重返北約軍事指揮體系(1998-2009)

美國在歐洲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主要透過北約來維持，美國是海權國家，能夠在歐陸維持影響力，需藉助盟國的幫忙，無論是人力、物資或者是軍事基地等。英國雖是美國傳統盟國，但並非陸權國家，美國需要的是像法國以及德國般的傳統陸權國家的支持，只不過，美國的歐洲政策天平若偏向法德其中之一，會引起另一國疑慮。特別是美德關係的加強，將抵觸法國傳統對德戰略，並且讓法國再次產生受圍堵或包圍的感受。

此次雖尚未出現美國、英國與德國聯合包圍，或是外交孤立法國的情況，不過，法國主動推動修正版的歐洲安全計畫，在集體安全的前提下，聯合美國與英國等主要國家，共同整合北約與歐盟成為泛歐洲安全體系。法國尋求英國，而非德國為合作對象，1996年時，法國與英國即共同提出「代表提議」(deputies proposal)，建議歐洲最高聯合司令部指揮官（傳統上由歐洲將領擔任），應同時擔任西歐聯盟的指揮官，減少兩個組織因協調造成的溝通成本。⁵⁶1998年12月，法英兩國高峰會後，共同發表聖馬洛宣言(Saint-Malo declaration)，主要內容為：

- (一) 歐洲聯盟在國際舞台扮演全面性角色，亦即不僅在經濟領域，歐盟應推動政治與軍事整合。
- (二) 歐盟以政府間決策機制為基礎，必須擁有獨立的行動能力，佐以可靠的軍事力量支持，以應付國際危機。
- (三) 北約與西歐聯盟維持對歐洲聯盟會員國的集體防衛義務，並尊重歐盟會員國的立場及其對北約的義務。
- (四) 歐盟內建構組織，具備分析危機情勢、情報來源以及制訂戰略計劃等相關能力，組織結構上應避免無謂的重疊和浪費資源。
- (五) 歐洲需要加強軍事武力，才能迅速回應新危機，並由堅強、具競爭力的歐

⁵⁶ Stanley R. Sloan, *op. cit.*, p. 169.

洲國防工業及技術支持。⁵⁷

法國與英國的共同立場得到美國支持，事實上，法國北約政策的轉向與戴高樂執政時的初步構想一致，後冷戰的地緣政治變動，使這三國關係更為密切。聖馬洛宣言所強調的政府間決議，解決法國不斷強調的國防自主問題，以國家利益為基礎下，才會進行軍事合作。對英國來說亦是如此，法國改變主導歐洲對抗美國的政策，讓英國更願意配合，甚至認為支持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乃有利於北約。2000年9月，北約以及歐盟即就雙方軍事合作議題展開討論，法國、美國以及英國所推動的歐洲安全體系似乎完成。法國亦再嘗試重返北約軍事指揮架構。

然而，從密特朗、席哈克到薩科茲政府的重返北約過程，並非直線且毫無阻礙，除1997年美國拒絕分享南歐司令部指揮權力外，2003年美國出兵伊拉克更引起法、德兩國強烈反對，使大西洋關係降到低點。北約於冷戰結束後經過三次擴大，會員國增至28國，集體防衛體系擴充至前華沙公約國家，波羅地海三國等。⁵⁸北約的擴大與911後的阿富汗軍事行動，其軍事組織的本質不變，但是新任務的地理範疇變得更具全球性。後冷戰時期雖然消弭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然而國家間的小規模軍事衝突、種族衝突以及恐怖主義等，巴爾幹半島與中東區域的情勢密切影響歐洲各國，南斯拉夫內戰的經驗已經顯露美國軍事力量留在歐洲的重要性，歐洲各國亦開始自行處理小規模衝突。北約應當繼續由美國主導，還是美歐共同分享決策權力，北約的新成員應當以大西洋國家為主，還是擴及全球各地等等議題，都是法國調整北約政策時即將遇到的問題。

不顧其他歐洲盟國的反對，美國單邊決定出兵伊拉克，讓法國再次陷於兩難困境：一方面，不願意看到美國全球霸權的地位屹立不搖；另一方面，法國自身

⁵⁷ <http://www.atlanticcommunity.org/Saint-Malo%20Declaration%20Text.html>

⁵⁸ 冷戰結束後北約經過三次擴大：1999年，增加波蘭、捷克及匈牙利等3國；2004年，增加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等7國；2009年，增加阿爾巴尼亞及克羅埃西亞兩國。未來將加入的國家，包括馬其頓、烏克蘭及喬治亞等三國。

亦無能力單獨挑戰美國。最後所產生的作法是，席哈克政府藉著反對伊拉克戰爭，推促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以反對美國的霸權。不過，匈牙利、波蘭、捷克、西班牙、義大利、英國及丹麥等國聯合署名，在美國華爾街日報 (Wall Street Journal) 公開主張美國與歐洲國家共同對抗海珊政權的必要性，美國當時國防部長倫斯斐 (Donald Henry Rumsfeld) 對此形容為新歐洲對抗舊歐洲 (法德軸心) 的現象。⁵⁹ 西歐除傳統親美立場顯明的國家外，其餘反對法德兩國者以中東歐國家為主，無論從地理位置、意識型態或是歷史發展來看，美國所指的新舊歐洲劃分仍相當抽象、不清楚，此事件甚至引發歐洲知識菁英對什麼是新歐洲、舊歐洲以及核心歐洲等議題進行對話。⁶⁰ 從地緣政治來看，中東歐國家剛剛脫離蘇聯的勢力，並處於戰略真空狀態，且中東區域不穩的話，會直接影響中東歐國家安全，美國是唯一有能力填補這權力真空的國家。簡言之，法國推動歐洲防衛自主，無法避免遭致其他歐洲國家的懷疑，畢竟美國軍事能力的可信度仍遠勝過法國。

2007 年，薩科茲上任後不久，即責成馬列 (Jean Claude Mallet) 主持，由政府單位、國防部、學界專家、智庫、國會議員等 38 名代表組成委員會，歷經 40 場公聽會，諮詢 52 位法國及各國學者專家和政府官員，並且固定與國會相關委員會溝通後，於 2008 年提出「法國國防與國家安全白皮書」 (The French White Paper on Def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⁶¹ 這是繼 1994 年的國防白皮書後，法國首次系統地從全球、歐洲及國內等三個層次，並從外交、經濟、軍事以及文化等四個面向，建立法國的國家安全政策。其中，不僅跳脫單純的國防政策，更進一步確定法國與北約關係的重要性，尤其是法國若想在 global 以及歐洲層次上扮演更重要角色，北約的地位更不可或缺。薩科茲政府積極重返北約軍事指揮體系的作為，在法國內部激起不少爭辯，贊成與反對意見焦點仍在於國家自主性，雙方對

⁵⁹ Rebecca R. Moore, *NATO's New Mission—Projecting Stability in a Post-Cold War World* (Westpor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7), p. 87.

⁶⁰ 關於歐洲知識菁英的辯論，請參閱 Daniel Levy, Max Pensky and John Torpey (eds.), 鄧伯宸譯，*舊歐洲、新歐洲、核心歐洲* (台北：立緒文化事業 2007 年)。

⁶¹ ALTO (trans.), *The French White Paper on Def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aris: Odile Jacob, 2008), pp. 14-15, http://merln.ndu.edu/whitepapers/France_English2008.pdf.

重返北約後法國是否能夠維持自主性的認知不同（如表一）：贊成者認為北約決策模式不會傷害法國獨立自主，法國全面性參與的話能增加對美國的影響力；反對者則認為應以歐盟為主體，而非仰賴美國保護，成為英國第二。

表 4-1 法國重返北約軍事指揮體系的內部爭論

贊成意見	反對意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完全加入北約能夠解除美國的疑慮，除改善與美國關係外，亦可影響華盛頓的決策。 ● 法國主權不會受到威脅。北約決策採一致決，軍事行動參與完全依據會員國意願。 ● 法國已經參與九成的北約委員會（38 當中的 36 個委員會），而且是人員與財務上主要貢獻者（包括波士尼亞、柯索沃、阿富汗），與北約近十年來已經開始例行性軍事合作。 ● 法國能夠增加指揮與決策影響力，軍事工業亦能獲得商業利益。 ● 相對於帶領歐洲國家對抗北約或美國，法國完全參與更能夠提升歐洲防衛。 ● 北約的任務與冷戰時期並不相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喪失自主性，如同英國一樣。 ● 美國得到的比法國來的多。 ● 冷戰結束後，北約不斷向東擴張其軍事影響力。 ● 依據任務特性，法國已經參與北約軍事行動。 ● 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取代北約。 ● 「防衛歐洲」構想反可能退居第二位，因為多數會員國仰賴美國保護。

資料來源：Le Figaro, 23 Mars, 2009,

<http://www.lefigaro.fr/international/2009/03/11/01003-20090311ARTFIG00495-franceotan-1>

法國無法忽視美國是全球唯一霸權的事實，其中，北約是美國影響全球的重要工具，北約的起源與發展又跟歐洲息息相關。法國維持在北約的半會員身份，隨著德國崛起與歐洲地緣政治變動而逐漸不合宜，若繼續下去法國恐怕在北約組織以及歐洲整合過程遭到邊緣化。2004 年，北約伊斯坦堡高峰會(Istanbul summit) 決議，加強北約與中亞國家的夥伴關係，並且延伸至大中東(greater Middle East) 區域，此決議深具地緣戰略意義，意謂北約將跳脫歐洲中心，合法化歐洲區域外

的軍事任務。⁶²簡言之，爾後北約將不限於歐洲範圍，成為美國實行全球戰略的重要軍事組織，亦即，其他盟國在美國與北約帶領下，延伸自身地緣政治影響力。北約任務擴及大中東，即中東阿拉伯半島以及北非區域，緊連中亞區域，主要用於反恐與維和任務，這亦與法國在此區域的石油經濟利益符合。

2003年，法國與美國的關係處於低迷時期，當時國防部長阿禮歐特·瑪麗(Michèle Alliot-Marie)即著文表示，儘管法美兩國存在著歧異，但仍享有民主和自由等共同價值，法國與歐洲夥伴準備在全球事務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輔助北約以及與美國合作。⁶³2008年白皮書當中，法國公開表示支持北約的擴大與歐洲區域外的任務，並主張法國在核武使用自主，以及平時軍隊不受外國指揮的前提下，應該全面性重回北約。⁶⁴就如海斯伯格(Francois Heisbourg)所言，席哈克任內最後幾年，法國與北約的合作關係，無論是軍事、戰略及行動層面，法國在法理上已算是參與軍事指揮體系。冷戰後，法國留在指揮體系外的理由不再，繼續的話將喪失法國增加全球影響力的機會，同時導致其他歐洲國家的不信任，阻礙歐洲防衛自主的推動。⁶⁵這些主張都忽略德國崛起的事實，所帶給法國的壓力，無論是政治與經濟領域，或者是法德雙邊、歐洲層次以及全球層次方面，法國都得面對德國的競爭。

薩科茲政府與前幾任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將法國推向全球舞台的意圖更為明顯，而且不避諱主張加強法、美之間合作關係。若單從國家外交自主性角度來看待法國與北約的關係，所看到的表象未能夠觸及到深層的地緣政治意義。薩科茲政府重新參與北約軍事指揮體系，在政治象徵的意義上，除代表法國新政府在外交政策上與戴高樂主義「斷裂」之外，更可顯示法、美大西洋聯盟關係已獲實質改善。此外，法國全程參與北約事務，可以消解歐洲國家的疑慮，特別是在法國

⁶² Rebecca R. Moore, *op. cit.*, p. 5.

⁶³ Michèle Alliot-Marie, "France Is Ready to Play Its Role in Global Security," *European Affairs*(winter 2003) at http://ciaonet.org.ezproxy.lib.nsysu.edu.tw:8080/olj/ea/2003_winter_58.html.

⁶⁴ ALTO(trans), *The French White Paper on Def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p. 101-103.

⁶⁵ Jeremy Ghez and F. Stephen Larrabee, "France and NATO," *Survival*, Vol.51, No. 2(April-May 2009), pp. 78-79.

推動歐洲自主防衛方面，避免與「反美主義」(anti-Americanism)多做聯想。⁶⁶

此外，國防白皮書當中，法國更清楚地界定其全球地緣政治利益所在，劃定一條從大西洋到印度洋的「危機之弧」(The Arc of Crisis)，包括非洲北部毛利塔尼亞(Mauritania)到索馬利亞的薩赫勒區(Sahel area)、以及波斯灣區域，到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圖 4-1)。這些區域為全球安全戰略核心，穩定與否將會影響歐洲區域，而且歐洲國家在查德、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及阿富汗等國駐軍的條件下，法國及歐洲國家應將此區域視為一整體，界定為主要戰略核心，以預防及處理可能的衝突。⁶⁷而且，薩科茲政府提出的「地中海聯盟」(Union for the Mediterranean)概念，試圖強化法國對環地中海國家合作的主導，並且鞏固大西洋到印度洋之間的連結關係，逐步擴大法國的影響力。法國所提出的地中海聯盟特意不採取 Mediteeranean Union 的用法，主要避免與歐洲聯盟混淆，令人產生法國另組聯盟與歐盟對立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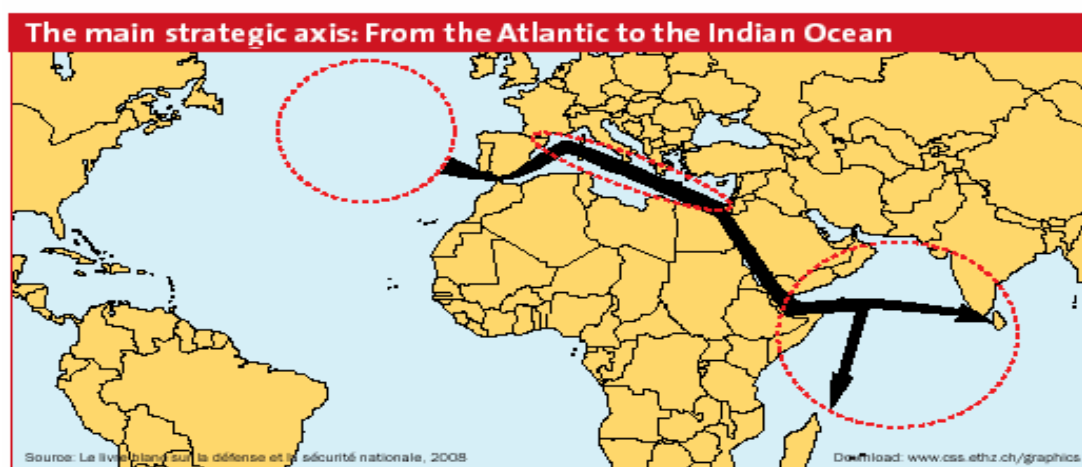


圖 4-1 從大西洋到印度洋的主要戰略核心

資料來源：Le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ALTO(trans), *The French White Paper on Def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aris: Odile Jacob, p. 72.

http://merln.ndu.edu/whitepapers/France_English2008.pdf.

⁶⁶ 法國外交上的戴高樂傳統，主要是追求獨立自主的外交空間，在實踐上常與美國立場相左，因此，會讓人產生法國對抗或反對美國的國際印象。冷戰時期，法國的反美印象在戴高樂政府退出北約軍事指揮體系達到高峰；後冷戰時期，法國嚴厲批評美國出兵伊拉克（2003年），並且積極推動歐洲整合的作為，亦被視為其挑戰美國霸權的野心。因此，法國政府所推動的歐洲防衛自主過程，會受到其他歐洲國家的懷疑，認定其為反美的作法。

⁶⁷ Le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The French White Paper on Def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p. 41-42.

法國於白皮書(2008)內容當中，再次重申歐盟與北約的互補性，然而真正有能力確保「危機之弧」穩定的組織，現階段仍是北約莫屬。法國在非洲東岸吉布地(Djibouti)，以及中東阿不達比(Abudhabi)的軍事基地，構成法國的珍珠鏈(string of pearls)戰略，可將其勢力延伸至印度洋。⁶⁸尤其是布吉地的地理位置處於紅海與阿拉伯海交接處，以及連接地中海與印度洋的扼制點(chokepoint)，其港口可納軍艦，並且從海上控制亞丁灣(Gulf of Aden)；境內的空軍基地巡弋範圍涵蓋中東區域；而且，位於沙漠氣候區亦使其成為絕佳的訓練基地，讓士兵更能適應酷熱氣候下的軍事任務。911 事件後，美國、西班牙、德國也派軍駐紮布吉地，法國與其他盟軍合作控制此區海空領域，並建立「吉布地—波斯灣—阿富汗」的戰略軸心。⁶⁹

2009 年 3 月 11 日，法國總統薩科茲(Nicolas Sarkozy)於國防研討會演說時宣布，法國將重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軍事指揮體系，尋求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成為美國和其他大西洋盟國的全面性夥伴。這是法國在 1966 年退出北約軍事指揮體系後，與北約關係的重大突破。3 月 17 日，國民議會對此議題進行投票表決，結果以 329 比 238 票通過。薩科茲如願地在北約成立六十週年高峰會上，重返軍事指揮體系。整體而言，薩科茲政府全面性重返北約，除國家的戰略需求考量外，更是迫於地緣政治新現實不得不做出的轉變。「法美關係」成為法國的外交新主軸，可預期的是此舉將微妙地改變法國的地緣戰略位置，並牽動法國、美國、德國與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競逐。

⁶⁸ 根據白皮書(2008)起草人之一海斯伯格(Francois Heisbourg)，前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機構主持人(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說：「我們準備一場半的戰爭」。這意謂法國能夠投射 6 萬士兵、70 架戰鬥機和所有海軍部隊，作為多國部隊部署「危機之弧」(the arc of crisis)的一部份。這兩個軍事基地，可成為軍事行動的補給 前進基地。請參閱 Michael Moran, "French Military Strategy and NATO Reintegratio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12, 2009,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6619/french_military_strategy_and_nato_reintegration.

⁶⁹ Jean-Dominique Merchet, "Les Transformations de L'armée Française," *Hérodote*, No. 116 (2005), p. 77.

第三節 後冷戰時期的法國地緣政治意義

法國重返北約軍事指揮體系後，可獲得兩個重要的指揮職務：盟軍最高司令部(Supreme Allied Command Transformation)、里斯本盟軍司令部(Allied Joint Command Lisbon)。前者位於美國維吉尼亞的諾爾福克(Norfolk)，負責規劃北約的長期戰略；後者位於葡萄牙的里斯本，負責北約快速反應部隊，以及偵察衛星系統。⁷⁰法國重返北約及其人事的安排，所透露的戰略訊息為，從歐洲到全球層次，法國將與美國密切合作。同時無法避免地，法國與德國、俄羅斯的地緣政治衝突，將隨著法、美關係的改善而露出檯面。

一、美國全球大戰略的法國地位

冷戰期間，蘇聯為美國主要的戰略敵手，法國雖在戴高樂執政時期退出北約軍事指揮體系，但仍屬於西方陣營；冷戰終結，開啟美國霸權的新時代，法國選擇與美國戰略合作，面對全球的安全挑戰。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法國從防禦型的橋頭堡，積極轉變為美國的全球戰略夥伴。

(一) 防禦型橋頭堡

美國的冷戰大戰略主要依據肯楠(George Kennan)提出的圍堵(Containment)概念，在歐亞大陸的東、西兩側築起防線，避免蘇聯勢力繼續擴張。實際上，美國的全球圍堵政策乃建立在地緣政治理論基礎，混合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

⁷⁰ 法國史托茲(Phillippe Stoltz)將軍已於 2009 年 7 月 20 日接任里斯本盟軍司令部指揮職；另外，阿布里爾(Stephane Abrial)將軍於 9 月 9 日，成為北約首位非美國籍的最高指揮官。請參閱 <http://www.nato.int/shape/news/2009/07/090727a.html>。

的「心臟地帶」(Heartland)與史派克曼的「邊緣地帶」(Rimland)理論。心臟地帶為海權國家勢力無法到達之處，亦為歐亞非三大陸構成之世界島的中心。麥金德直指蘇聯領土等同於心臟地帶，假如蘇聯征服德國的話，其將成為全球最大的陸權國家，並且處於強大的戰略防禦位置。⁷¹史派克曼使用邊緣地帶取代麥金德的內新月區(inner crescent)，認為海權國家聯合歐亞大陸兩側的邊緣地帶國家，能夠遏阻心臟地帶陸權國的擴張，避免出現美國遭受包圍的情況。⁷²

北約在「美國與西歐國家對抗蘇聯與東歐國家」的地緣政治結構下成立，超脫單純的海權對抗陸權的規律。冷戰與前兩次世界大戰差異點在於，前者為海權國(美英)聯合邊緣地帶國(西歐國家)，共同對抗心臟地帶陸權國(蘇聯)；後者為海權國(美英)聯合心臟地帶陸權國(蘇聯)，共同對抗邊緣地帶國(德國)。⁷³此外，北約會員國的地理範疇為環北大西洋兩岸，麥金德在1943年的文章中繼續補充北半球重要環帶(girdle)，除心臟地帶外尚需留意內陸洋(midland ocean)，即北大西洋盆地，及其附屬四個海域(地中海、波羅地海、北極海、加勒比海)的重要性。⁷⁴易言之，北約的成立並成為美國圍堵政策最重要的一環，可循著「內陸洋與心臟地帶」這自然地理脈絡，理解東、西集團衝突的地理根源。

法國的地緣戰略位置與國家實力，就麥金德或者史派克曼而言，無論目標為德國或者蘇聯，為扼制陸權勢力擴大，法國是絕佳的平衡者(balancer)以及協調者(mediator)，能幫助歐亞大陸達成權力平衡的態勢。法國介於歐亞大陸與內陸洋之間，北面與英國相隔英吉利海峽，法國成為北大西洋東岸的防禦型橋頭堡，英

⁷¹ 心臟地帶的地理範圍約為，波羅地海、黑海向東延伸到葉尼塞河(Yenisei)與勒那河地區(Lenaland)，除北面北極海無法侵入外，東面及南面為阿爾泰山(Altai)到興都庫什山(Hindu Kush)山脈邊緣，背倚蒙古戈壁(Gobi)和西藏高原(Tibetan)、伊朗沙漠。請參閱 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Washingto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42). pp. 598-600.

⁷² Nicholas John 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4), p. x.

⁷³ Colin S. Gray, "In Defence of the Heartland: Sir Halford Mackinder and His Critics a Hundred Years on," Brian W. Blouet (ed.), *Global Geostrategy—Mackinder and the Defence of the West* (New York: Frank Cass, 2005), p. 31.

⁷⁴ H. J.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Foreign Affairs*, Vol. 21 (July 1943), p. 602.

國為堅固堡壘，美國則代表戰略縱深，從北美向歐洲盟國提供後勤補給。⁷⁵法國於戰後第四共和政府以及戴高樂執政初期，便希冀透過央格魯 薩克遜主導的北約，甚至提升為美英法三巨頭的模式，強化法國在北約內外的影響力，徹底約制德國以及防禦蘇聯的可能入侵。

冷戰時期美國的大戰略，乃延續麥金德與史派克曼的權力平衡法則，避免歐亞大陸出現單一霸權，危害美國的國家利益。法國戴高樂主義的外交政策，實際上並未造成歐陸的權力失衡，而且，縱然法國退出北約軍事指揮體系，但仍屬於西方同盟的成員。整體而言，蘇聯及東歐共產集團未瓦解前，依舊是法國最大的外在威脅，法國單憑己力無法抗衡，需藉助北約的集體防衛能力。這段時期，法國為北約防禦型橋頭堡的角色依然不變。

（二）積極的全球戰略夥伴

冷戰結束後，法國雖欠缺直接的外在軍事威脅，但是危害國家安全的來源更複雜，危險也更難定義和預測，國家安全戰略必然受此影響而轉變。從法國歷次出版的國防白皮書內容，能夠看出其戰略變化：1972 年的白皮書著重嚇阻戰略；1994 年著重法國國土外的軍事行動，即長程的軍事投射能力；2008 年則是定義全球化時代下的國家安全戰略，致力完成知識與預警 (knowledge and anticipation)、預防 (prevention)、嚇阻 (deterrence)、防衛 (protection) 以及干預 (intervention) 等五項戰略目標。⁷⁶ 法國不再適用過去防禦型橋頭堡角色，並且需重新界定其地緣政治利益，劃出權力投射的地理範疇，轉為積極行為者。

蘇聯瓦解後，面對美國成為全球唯一霸權的事實，薩科茲政府選擇與美國緊密合作，共同處理涵蓋歐洲以及全球層次的議題，北約為最佳的組織工具。美國前國安顧問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將法國列為關鍵地緣戰略玩家，認為

⁷⁵ H. J.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p. 601.

⁷⁶ Le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The French White Paper on Def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p. 60-70.

美國應該在歐亞大陸與法國共同合作。對法國來說，伊比利半島、西地中海北部海岸、德國以及中東歐等，這塊地理區不僅是法國安全範圍，更是其政治利益所在。⁷⁷然而，法國不想將行動的地理範疇限於歐洲大陸，其戰略構想是劃定一條從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的地緣政治利益區，將其勢力擴展至環地中海、中亞以及南亞等區域。北約的擴大與全球性任務，法國採取贊成立場，並以實際行動支援美軍的全球任務。

此外，法國表達反恐立場以及支持飛彈防禦系統，藉此呼應美國的全球大戰略，呈現法、美共同陣線的印象。法國勾勒出的危機之弧，乃混合宗教和種族的衝突地帶，並且為恐怖主義主要滋生地。這塊弧形區處於布里辛斯基所提的「歐亞巴爾幹」(The Eurasian Balkans)南緣，⁷⁸兩者部分區域重疊，若從大印度洋地緣政治角度來看，兩國享有共同利益。法國的珍珠鏈戰略是由法國的地中海區域，經過地中海、蘇伊士運河、紅海與阿拉伯海，直抵印度洋的阿富汗、巴基斯坦(AfPakistan)。歐亞巴爾幹的亞洲部份與印度洋息息相關，特別是當亞洲部份區域的天然資源與通路，如石油、天然氣與巴基斯坦到中亞的陸路運輸，經過石油或天然氣管線與阿拉伯海沿岸的港口抵達印度洋，使得大印度洋的地緣政治範圍擴展到大中亞（包括前蘇聯的中亞加盟共和國與中國的新疆自治區等）。整體而言，法國延伸到印度洋西側的珍珠鏈戰略，正與美國進行的反恐戰爭區域重疊，且雙邊有合作關係，顯見雙方享有共同利益。另外在歐洲大陸，法國明確支持在歐盟與北約架構下，積極建構飛彈防禦能力，表示將繼續參與並致力推行。⁷⁹雖然法國並未明指飛彈威脅來自何處以及何國，但從北約計劃在捷克與波蘭設置飛彈防禦系統，招致俄羅斯強烈反對來看，法國的立場將影響與俄羅斯的關係。

⁷⁷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 63.

⁷⁸ 歐亞巴爾幹涵蓋：部分東南歐、中亞、部分南亞、波斯灣地區以及中東。此區域包括九個國家：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喬治亞與阿富汗，伊朗及土耳其可能列入名單的國家。歐亞巴爾幹指的是蘇聯瓦解後，歐亞大陸所產生的權力真空地帶，因其種族、宗教的複雜性而導致衝突。爾後，布里辛斯基使用全球巴爾幹(Global Balkans)，取代歐亞巴爾幹。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p. 125.

⁷⁹ Le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The French White Paper on Def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 175.

麥金德與史派克曼的權力平衡法則，仍適用於現今美國的全球大戰略。布里辛斯基不諱言指出，法國並未強大到足可阻礙美國對歐政策的地緣戰略根基，但欲將民主德國鎖在歐洲之內，法國是不能少的夥伴。⁸⁰佛列德曼(George Friedman)的分析更為透徹，美國建立歷史前所未見的全球霸業，接下來則是守成的工作，預防出現區域強權挑戰美國的海軍霸權。⁸¹歐亞大棋盤當中，法國也許是美國的一顆棋子，或者是自主性玩家，但無論如何，當法國決定與美國合作時，首當其衝者非德國莫屬。

二、歐洲層次的主要地緣政治關係

(一) 德國

德國統一後，法國相對優勢的地位不再，而且，當歐洲整合的地理範圍擴展至北歐、中東歐國家時，歐盟的政治與地理中心無疑地移轉到德國而非法國。法、德權力消長直接反映在歐盟的制度安排，例如，歐洲議會席次上，德國為 99 席，法國為 72 席；在歐盟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an Union)決策機制上，法國與德國加權後皆擁有 29 票，但歐盟增加至 27 國後，所增加的決策門檻限制，則削弱法國在歐盟內部的影響力。⁸²法國與德國引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幾近零，然而，以法、德為軸心推動歐洲整合的傳統，卻受到兩國權力天平逆轉，以及歐盟會員國增加等量變，從而產生質變。德國有能力跟法國競爭歐盟的領導權，意圖也日

⁸⁰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p. 78.

⁸¹ George Friedman, *op. cit.*, pp. 46-48.

⁸² 現行歐盟理事會決策機制，乃依據 2003 年 2 月生效的尼斯條約(Nice Treaty)，設定三重門檻：首先，在條件多數決(Qualified Majority Vote, QMV)下，需要 255 票贊成，即佔所有票(345 票)的 73.91%，阻擾少數門檻為 69 票；第二，尼斯條約亦設立通過政策的新門檻，除前述條件外，若提案為執委會所提，需半數以上會員國同意，若該政策為其他機構或國家所提案，則需要三分之二以上會員國同意；第三，通過人口需達歐盟全體人口 62%。請參閱歐盟官方網站尼斯條約全文 <http://eur-lex.europa.eu/en/treaties/dat/12001C/htm/12001C.html>；國內學者研究部分，請參閱藍玉春，「歐盟尼斯條約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48 卷第 4 期(2004 年 7 月 8 日)，頁 77-78。

益明顯，面對如此地緣政治現實，法國得要想辦法應付。

因此，薩科茲政府倡議成立地中海聯盟，排除非地中海國家，例如德國與英國，尋求新聯盟來鞏固法國的歐洲地位；另一方面，則是選擇與美國合作，以重返軍事指揮體系的方式，在北約內部提升法國的政治影響力，藉此平衡德國權力的崛起。

根據法國地中海聯盟的藍圖規劃，乃是要採取莫內模式，以經濟、安全、環境與文化等四大議題為基礎，整合歐洲、北非、中東等環地中海國家，除環地中海國家為當然成員國外，歐盟亦可透過執委會來參與。⁸³然而，法國此舉遭到其餘歐盟國家，特別是德國的強烈質疑，害怕將對歐盟造成負面影響。法國總統特別顧問蓋諾(Henri Guaino)為地中海政策辯護，認為德、法兩國政治影響不同的地理範疇，德國為中東歐，法國則是地中海，法國的地中海政策並不是特別針對德國，也不是尋求新聯盟與歐盟競爭。2007年12月6日，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利用與薩科茲會面機會再次強烈表示，儘管德國並未鄰近地中海，但不意謂德國對此區域不感興趣。⁸⁴整個過程當中德國看到的是，法國企圖跳過歐盟，藉由地中海聯盟的成立與擴大，來擴張法國的地緣政治影響力，成為歐洲以及地中海的戰略樞紐。後來法國雖然讓步，同意全部歐盟國家加入地中海聯盟，但也同時顯露德、法兩國地緣戰略的根本歧異。

法國重返北約軍事指揮體系後，將降低德國在大西洋聯盟內的相對重要性，並藉著法、美合作關係，延續對德國制約的傳統政策。對美國而言，原就不希望歐洲出現單一強權，能夠挑戰美國霸權，法、德之間繼續存在矛盾，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對俄羅斯而言，法、德之間的矛盾亦提供機會，能藉此突破北約擴大後對俄羅斯的圍堵態勢。簡言之，法國的親美作為懷有強烈制衡德國的動機，並藉此提升其全球地緣政治影響力。同時，法國與俄羅斯的關係，亦隨著德國因素

⁸³ Fifteenth Ambassadors Conference—Speech by M. Nicolas Sarkozy,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Paris, 27 August 2007,

http://www.premier-ministre.gouv.fr/en/information/press_871/fifteenth_ambassadors

⁸⁴ Jacques-Pierre Gougeon, “France-Allemagne: Vers une Nouvelle Rivalité?” *La Revue Internationale et Stratégique*, No. 74 (été 2009), p. 84.

的介入，而更顯得複雜。

（二）俄羅斯

傳統歐洲地緣政治的命題：擔憂德國或俄羅斯、甚至兩國共同合作，掌控歐亞大陸心臟地帶，往外擴張並且發展海權，最後支配全球。史派克曼對此難題提出的解決方案為，從波羅地海到地中海的東歐區域，建立起「大東歐邦聯」(great eastern European confederation)，取代原先零碎的緩衝國地帶。⁸⁵史派克曼的想法與法國的地緣戰略不謀而合，但是這樣做法會遇到另一難題，大東歐邦聯若只是小國鬆散的組合體，實力根本無法與蘇聯（俄羅斯）以及德國相比，如此一來，德俄之間不會產生直接牽制，反而吸引兩大國在緩衝地帶劃分勢力範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波蘭以及蘇聯的情況類似，波蘭最後再次遭到德蘇兩國的瓜分。冷戰時期，建立大東歐邦聯權力平衡的構想並未真正實踐，後冷戰的歷史演變反倒是北約與歐盟的不斷擴大，將中東歐緩衝地帶逐步納入西方陣營，勢力逼近俄羅斯邊界。尤其，北約的軍事組織本質，其擴大以及在新會員國部署軍事武力的作為，更讓俄羅斯坐立難安。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法國與俄羅斯並無直接的地緣政治衝突，法國雖與其他歐洲國家聯合遏阻俄國勢力進入巴爾幹半島以及東地中海，但從十九世紀克里米亞戰爭結束後，法國便未與俄國發生嚴重的軍事衝突，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除英國以外，俄國都是法國箝制德國的最佳夥伴。冷戰結束後，法國仍將俄羅斯視為全球多極體系的重要行為者，甚至主張增強法、德、俄的戰略三角關係，在此架構下圍堵亞洲中國的崛起，以及對付伊斯蘭極端份子。⁸⁶這項構想結合歐亞大陸中央國家（俄羅斯），以及歐亞大陸突出部兩個主要國家（法德），實現陸

⁸⁵ Nicholas John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2), pp. 466-467.

⁸⁶ Thomas Gomart, "France's Russia Policy: Balancing Interests and Valu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0, No. 2(Spring 2007), p. 151.

權國家結合邊緣地帶國家對抗海權國家，法國將自己加入德俄軸心，不難想像針對目標為美國。這項戰略構想假設美國單邊主義為全球不安的來源，法國希望聯合更多國家以對抗美國，不過在法、德之間的競爭加劇，俄羅斯試圖擴張勢力至前蘇聯共和國等因素影響下，法德俄並未真正建立三角戰略關係。

2008年，法、俄之間因科索沃獨立及俄羅斯入侵喬治亞兩起事件而升高緊張關係。儘管俄羅斯與塞爾維亞強烈反對，法國仍舊與美國率先承認科索沃獨立。此事件顯示在南歐巴爾幹半島，避免俄、塞兩國或者是斯拉夫民族擴大勢力的上，法國與美國立場一致；另外，當俄羅斯出兵介入喬治亞的內戰時，法國總統薩科茲便以歐盟輪值主席身份，譴責並要求俄羅斯從喬治亞撤軍。但實際上法國對待科索沃與喬治亞並不同，巴爾幹半島直接攸關歐洲安全，喬治亞則是在俄羅斯地緣政治影響範圍內，法國雖不願意見到俄羅斯擴張勢力，但也無意與其發生激烈衝突。於是，當俄羅斯承諾將從喬治亞撤軍時，法國便讚揚這項和平舉動以和緩歐盟與俄羅斯的緊張外交關係。

法國加強與美國的關係，並不等於跟俄羅斯反目成仇，法國主要在尋求外交空間，繼續斡旋於美國、俄羅斯與歐洲國家之間。法、美、俄三國在打擊恐怖組織與伊朗核武議題上，享有共同利益，而且，俄羅斯同意美國使用境內領空，作為阿富汗任務的後勤補給線，亦緩和近年來北約和俄羅斯雙邊的緊張關係。此外，為降低俄羅斯的擔憂，法國表達扮演「俄羅斯-北約」平衡者的意願。法國國防部長莫林(Herve Morin)明確表示反對「全球性北約」(global NATO)概念，暗示將限制北約擴張的界線。對於烏克蘭與喬治亞加入北約議題，莫林亦主張北約應先諮詢俄羅斯的意見，甚至強調俄羅斯對此議題應享有否決權。⁸⁷全球性北約乃指其他區域國家亦能夠加入北約組織，例如日本、澳洲以及印度等國加入北約，使其轉為全球性安全組織。法國反對全球性北約概念，認為北約成員國應該都是北大西洋國家，而不是無限制擴張，最後將使北約組織變得鬆散。全球性北

⁸⁷ James Joyner, "France in Collision Course on NATO?" *Atlantic Council*, 19 Mars, 2009, <http://www.acus.org/print/3427>

約將可能對法國造成以下幾點影響：首先，新成員擴充過多，將會稀釋法國對北約以及對美國的影響力，削弱法國想藉北約擴張全球影響力的努力；其次，北約增加成員過多，可能變成無效率的組織，法國將喪失壓制德國的重要工具；不限制成員國的地理範圍，將引起俄羅斯更大的疑慮，法國不樂見北約與俄羅斯的衝突升高。

簡言之，法國雖支持北約東擴的地緣戰略邏輯：控制東歐以及東南歐（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為目的，獲得飛航戰略空間與基地，俾利進一步對伊拉克、中東、高加索地區與中亞地區的軍事行動。⁸⁸但法國並不贊成北約無限制擴張，況且烏克蘭與喬治亞對北約防衛無實質助益，若兩國成為北約會員國，可以預期將來兩國與俄羅斯發生軍事衝突的話，其他會員國將無法避免涉入。易言之，在俄羅斯擴張勢力並危害法國利益的前提下，法國才會將俄羅斯視為敵手，現階段挑釁俄羅斯絕非法國的優先選項。

第四節小 結

法國的北約政策轉向並非首次發生，冷戰時期從親北約轉向疏遠北約，後冷戰時期則從疏遠北約轉向親北約。法國對北約政策的反覆特性，同樣困擾著學術研究。郝沃爾斯(Jolyon Howorth)研究法國的防衛政策時就坦承，想要解構法國與歐洲安全之間的關聯性相當困難：一方面，從政府機關的書面報告、政治人物的公開演說內容來看，會認為法國國防政策與歐洲安全政策一致；但另一方面，法國在核武自主、軍隊職業化，以及對歐盟與北約的政策等來看，又與其他歐洲國家不同。⁸⁹兩者間難以釐清的關鍵在於，究竟法國是從國家層次來看待歐洲安全？還是從歐洲層次來看待法國安全？前者的話，則符合戴高樂主義追求獨立自

⁸⁸ Pierre Verluise, "La France de Retour Dans le Commandement Integre de l'OTAN?" 1 Oct. 2007, http://www.diploweb.com/spip.php?page=imprimer&id_article=82

⁸⁹ Jolyon Howorth, *op. cit.*, pp. 23-25.

主的政策，強調法國主權優先，再擴及至國家合作模式的歐洲安全；後者則指歐洲合作架構下，主要為北約、歐盟以及歐安組織等，從組織到國家的由上到下模式來推動歐洲安全，法國跟其他國家一樣均受惠於此。法國與北約關係之複雜，乃因法國的作為混合國家與歐洲層次，根本難以釐清。

作者認為，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法國與北約的關係絕非不理性且無法預測。當薩科茲政府強化與美國的合作關係，並且決定重返北約軍事指揮體系時，外界甚至以薩科茲主義(Sarkozyism)來形容新政府作風，認定其與過去戴高樂主義切割。事實上，薩科茲主義與戴高樂主義的本質相同，更精確地說，從席哈克到薩科茲執政時期，法國政府親近大西洋聯盟的政策，與戴高樂的原始期望並無不同。首先，薩科茲政府仍延續偉大與獨立的戴高樂傳統，堅持核武自主以及平時國防武力不受外國指揮，並且試圖藉著與美國合作（戴高樂政府則是倡議美英法三國合作），擴張法國的全球地緣政治影響力；其次，無論是戴高樂主義或者是薩科茲主義，都是法國在持續變動的地緣政治狀態下，執行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最後，兩者均視歐洲為發揮法國影響力的重要槓桿，但無論冷戰以及後冷戰時期，法國在推動歐洲整合的過程當中，皆未放棄北約的會員國資格。薩科茲政府正式定調歐洲防衛自主與北約為合作關係，除解決過去對此議題曖昧模糊的立場外，更為法國全面性重返北約提供正當理由。

無庸置疑，德國統一及其地理位置毗鄰法國的事實，從十九世紀至今仍然是法國地緣戰略的關鍵考量。從歷史上來看，法國親近美國的作法，與二戰前法國聯合英國共同對付德國的地緣政治邏輯相同。美國的重要性，如卡根(Robert Kagan)所作的描繪，二戰後美國是歐洲處理德國問題的關鍵，欠缺美國勢力駐留歐洲大陸，法、德共同推動歐洲整合就不會成立。⁹⁰此外，在後冷戰美國霸權結構下，法國一度冀望法、德主導反美聯盟，但最後卻失敗，主要原因在於歐盟的會員國越多，則越是削弱法國的主導能力。最後，法國若不願意接受德國在歐洲

⁹⁰ Robert Kagan, 前引書，頁 111-112。

的領導，又想要維持自身的影響力，北約自然地成為首選。

冷戰結束至今逾二十年，法國不斷摸索並調整政策，以因應地緣政治的持續變動。從法國全面性重返北約的作法來看，下面這組法國地緣政治密碼，將會越來越清楚：

全球層次與美國合作；區域層次與俄羅斯和解；雙邊層次繼續制約德國。⁹¹

⁹¹ 法德兩國間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兩國毗鄰的地理特性，使其無法忽視彼此間相對權力消長。法國地緣戰略受到歐洲地緣政治影響，特別是德國統一所帶來的衝擊。歐洲整合過程雖可看成兩國合作，然合作背後的地緣政治動機，即法國主導歐洲整合提升自身國際影響力以及避免德國威脅再起等條件，若遭遇挑戰且更迭，則將重回到現實的權力政治，國際體制（北約、歐盟）亦成為兩國間權力競逐的場域。從這角度來看，德國統一改變法德合作的本質，法國的歐洲地緣戰略將回到權力平衡，壓制且避免德國主導歐洲未來。

第五章 結 論

本章將先總結前三章法國歷史發展中所得出的五點法國地緣政治特性；其次，本文透過地緣政治途徑研究法國地緣戰略後，將再檢視古典地緣政治學的適用性，並從事實與理論提出個人看法，說明地緣政治學仍具有解釋能力；最後則是以本論文為出發點，提出未來可進一步的研究議題。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文從地緣政治角度理解四百多年來的法國對外關係史，從中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特性：

一、法國領土同時毗鄰海陸的地理特性，既是地緣政治擴張路徑，同時亦是海權受限的原因，凸顯法國地緣戰略的理想與現實雙面性。

法國於路易十四時期開始即積極拓展陸權與海權，透過經濟、軍事組織和制度、海軍的擴建等改革措施，使法國躍升為陸權與海權強國。陸權上，法國境內雖具天然險阻，可成為良善的防衛碉堡，延伸領土至天然疆域的論述，亦以防衛為正當理由。法國最佳的陸權擴張路徑是經由北歐平原，往東延伸地緣政治勢力，然而，法國陸權擴張卻不斷遭遇歐洲各國聯合反抗，路易十四、拿破崙到拿破崙三世時期的歐陸擴張政策，在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英國和德國主導的反法聯盟下受阻。在海權上，法國與英國的海外殖民競爭，遍及北美洲、非洲、印度以及中南半島等地，不過在七年戰爭(1763)後，法國的海權發展便受制於英國，

究其原因，乃是法國需將資源用於陸權對抗，弱化海權發展，畢竟對法國國家安全而言，陸地上的威脅遠勝於海上威脅。

綜覽法國的歷史發展，本文同意馬漢以及保羅甘乃迪對法國地緣政治困境的描述，法國地緣戰略主要依據實際權力能夠投射的地理範圍而締造，然而多次挑戰英國海權失敗以及德國統一後的歐洲地緣政治變動，均限制法國海權與陸權的擴張路徑，致使法國轉向採取合作模式以維持權力平衡者角色。1871 年後法國地緣戰略的轉向更為明顯，不再選擇直接對抗海權國：英國，轉以合作形式共同對抗德國，直至現今依舊如此，德國依然不變，合作的海權國則轉為美國。

二、法國對歐洲進行雙軌權力平衡政策，阻擾周遭區域成立新國家，擔任大國間權力平衡者。

與英國相同，法國對歐洲的政策亦是依循歐洲權力平衡原則，背後蘊含著地緣政治意義。法國對歐洲進行雙軌權力平衡政策，一方面阻擾德意志區域和義大利半島的統一運動，避免周遭成立新國家，危及原本的歐陸權力平衡態勢，這些區域可成為法國與普魯士、奧國間的緩衝地帶，使其無法直接威脅法國國土安全；另一方面則是扮演平衡者，斡旋在英國、奧國、普魯士以及俄國間，直至現代，法國在歐洲乃至於全球層次上，亦希望能夠扮演相同角色。不過，義大利與德國的統一，迫使法國勢力從萊茵河東岸及義大利北部撤出，法國地緣戰略受其影響，且更難單獨抗衡英國海上霸權。

簡言之，法國地緣戰略的傳統在於權力平衡，避免歐陸出現新的威脅前提，特別是維持德意志區域分裂狀態所形成的緩衝地帶，能減緩歐陸強權對其直接威脅，法國也才能和英國在海權的競逐。於是，當德國統一且造成直接威脅後，法國勢必尋求抗衡或甚至壓制德國的最佳地緣戰略，法國再次運用權力平衡政策，聯合英國、俄國（蘇聯），乃至於二戰後的美國，皆是如此思維下的產物。法國

全球地緣政治勢力消退後，更積極扮演權力平衡者角色，直至二十一世紀法國加強與美國關係，其提升自身在歐洲、乃至於全球的影響力的意圖更為明顯。

三、大革命後法國仍以地緣政治，而非意識型態，作為對外政策的考量。

1789 年大革命及其後的拿破崙法國崛起，將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等意識型態散佈到歐洲各國，保守主義王權國家組成神聖同盟（俄普奧），儼然與英國和法國等自主主義國家對立。類似意識型態形成的對立尚包括，二戰前德國法西斯主義與蘇聯共產主義，冷戰期間自由主義陣營與共產主義陣營等對立情勢。然而，意識型態作用雖可成為國家對外關係以及正當化國家對外行為，但在意識型態背後，仍可清楚看出地緣政治根源，而且兩者間常發生不一致現象。例如，十九世紀時，英法與俄普奧間標榜意識型態差異，然而對各地發生的革命與民族獨立運動確卻持不同立場，法國與英國支持比利時獨立，阻止神聖同盟國家干預，但卻漠視匈牙利以及波蘭兩地的獨立運動，究其原因，乃在於比利時傳統上為法英兩國緩衝地帶，並不希望其他國家勢力進入。匈牙利與波蘭原本屬三國的勢力範圍，且與法英並無直接地緣政治關聯，致使兩國立場前後不一。

同一陣營內部的立場亦不見得相同，例如英國與法國對於德國與義大利的看法就不同。法國跟這兩個區域擁有直接的地緣政治關聯，歷任政府試圖將勢力擴及這兩區域，自然不願見到這兩個區域出現新的統一國家。對英國而言，則是從歐陸權力平衡角度，不阻擾這兩區域的統一運動，甚至認為兩個新國家能幫忙制衡法國，形成更穩定的歐洲權力平衡。換言之，法英兩國對民族統一運動採取的立場，無關意識型態，而是地緣政治考量。直至二十世紀冷戰時期，法國雖然屬於自由主義陣營的成員，但其追求自主的外交政策，與北約的關係轉變等作為，仍然無法跳脫地緣政治思維。

四、德意志區域統一衝擊法國地緣政治，壓制德國成為法國至今的地緣戰略。

從 1871 年普法戰爭後，法國地緣政治最大特點，即在雙邊層次實行壓制德國的地緣戰略，甚至在區域以及全球層次，仍然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德國的牽制。普法戰爭以及兩次世界大戰，德國已經證明有足夠能力與法國競逐主導歐陸的實力。對此，法國從普法戰後至今，所設定的對德國地緣戰略目標，已經放棄獨自對抗德國的作法，轉以雙邊以及多邊合作模式，進行對德國的圍堵，英國以及美國等海權國家在其中將扮演關鍵角色。

法國對德國地緣戰略的轉向，乃受困於歐洲地緣政治的現實，所做出的理性選擇。法國無法同時在海權和陸權同英國以及德國對抗，最後採取與英國海權合作的妥協方式，共同圍堵德國。法英之間合作空間勝過法德、英德的原因在於，德國在陸權對法國以及在海權對英國均具威脅，而法英兩國並無直接的地緣政治衝突。冷戰兩極以及後冷戰單極國際體系，法國想要成為美蘇兩國間的平衡者，或者挑戰美國霸權，單憑法國並無可能，於是主導並推動歐洲整合成為法國提升國際影響力的最佳方式。然而，對法國而言，德國問題因統一而再起，法國並不樂見德國主導歐洲整合，於是法國便藉國際組織，尋求體制內模式繼續壓制德國。英國與美國在法國對德國的戰略當中，重要性再次浮現。

五、歐洲地緣政治特性：控制世界，卻未能產生歐洲帝國。

歐洲從大航海時代至二十世紀初期，在世界各地征服佔領殖民地，建立龐大海外勢力，然而雖出現西班牙帝國、法國帝國、德意志帝國以及大英帝國等，卻能未形成單一的歐洲帝國。歐洲各國在海外的殖民擴張，除法英在北美大陸發生

大規模軍事衝突外，爾後各國在殖民地雖有地緣政治經濟衝突，但不至於演變成大型戰爭，甚至劃分殖民地勢力範圍。例如，各國在非洲和中國、法英在中南半島，以及英俄在中東、中亞和南亞等。亦即，海外殖民利益雖然重要，各國並無意願為此而兵戎相見，較傾向合作的方式。

另一方面，歐洲大陸本身卻未能夠出現歐洲帝國。雖然存在相當多解釋說明歐洲無法統一的原因，不過地理特徵，尤其是英吉利海峽隔絕英國於歐洲大陸之外，使得西班牙、法國到德國等歷史上稱霸歐洲大陸的國家，從未克服這地理障礙，征服英國。也因為如此，英國才能夠維持歐陸權力平衡政策，避免歐陸出現單一國家主宰的情況。受到此歐洲地緣政治特性影響，法國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稱霸歐洲大陸的嘗試，才在反法聯盟的圍堵下失敗。

此外，現今歐盟仍無法等同於美國以及中國等國家，並無一單一歐洲憲法，且歐盟雖然成功地進行經濟整合，不過並非所有會員國都加入歐元區。而在歐洲防衛上，歐洲國家仍相當依賴北約。這些現象皆突顯歐盟內部仍然相當分歧，傳統國家角色仍未消失。

第二節 從事實與理論反思古典地緣政治學的適用性

本文採取的地緣政治途徑屬於古典地緣政治學，採用國家中心、理性主義、權力平衡以及國際無政府狀態為基本假定，古典地緣政治學與國關現實主義理論一樣遭受抨擊，質疑其理論的解釋能力以及對現實的適用性。從前幾章陳述的法國地緣戰略過程及結果來看，本文認為古典地緣政治學不但適用，且亦能夠解釋國家在全球化時代的對外行為。現今挑戰地緣政治學的論點主要可分為事實與理論兩方面，爭論的根源在全球化，即質疑全球化時代地理因素是否還是影響人類行為的關鍵變數？或者說，傳統主權國家所界定的政治邊界將不具實質意義，而且因為科技發展，特別是運用航太科技，人類已能克服地理障礙，地理變數將消

失。此外，學者亦從理論層面反思地緣政治學，透過文本分析，提出批判地緣政治學，挑戰古典地緣政治學的方法論。然而無論就事實以及理論，本文認為古典地緣政治學仍具解釋價值，以下將依次進行說明。

一、事實的挑戰

(一) 全球化

全球化現象指超越國界的人員、資本、科技以及貨物的流通，此現象讓學者重新審視傳統國家主權概念，亦即，全球化延伸的全球治理研究基於，國家雖依然存在，但其職能受到影響，且眾多非國家行為者以及超國家行為者，共同參與價值分配的決策過程。對於國家主權的削弱最常被提出來做為證明的論點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已使它的制度和組織（跨國與多國公司、媒體與傳播網路、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相對獨立於民族國家的權力與控制之外。¹換言之，全球治理的相關論述便探討主權國家如何管理種種跨國活動，例如貿易、金融和犯罪活動等，以及如何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形成共同政策。新增的議題超越政治疆界，主權國家與其他行為者複雜交織情況下，領土不再是政治決策的考量重心，區域組織和全球性組織日漸增加，形成全球化的多層次治理圖像。²

全球化現象以及學者研究，認為主權國家在跨國行為者競爭過程當中，對政治疆界的控制能力逐漸減少，原有地理疆界的意義不再。在原有國家的政治疆界範圍，的確非國家以及跨國行為者越來越重要，然而筆者認為地理因素不應該被忽視。卡普蘭(Robert D. Kaplan)於2009年發表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文章，以《地理反撲》(The Revenge of Geography)作為標題，強調縱然在全球

¹ Tony Schirato and Jen Webb,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3), p.106.

²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Introduction,"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Governing Globalization*(Malden: Polity Press, 2002), p.6.

化時代，人類所居住的自然環境為第一序實在(the first order of reality)是不變的，理念(ideas)則為第二序實在。因此，想要理解當代挑戰，例如氣候變遷、北極暖化、石油和水資源稀少問題，都必須借用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事件的环境詮釋(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of events)方法，將地理因素帶入歷史的理解。此外，卡普蘭亦認為古典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與馬漢所描繪的地緣政治圖像仍具意義，能從中東、中亞到南亞所劃出的破碎地區(shatter zones)，看到族群、宗教以及能源因素導致的紛爭，這些都具有地理根源。³

以本文所研究的法國地緣戰略為例，法國政府亦提出類似破碎地區的地理概念，並於國防白皮書內容中提出因應政策。本文並非否定非國家行為者，或者是跨國行為者的重要性，而是強調國家所代表的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仍居主導地位，同時也只有國家有能力進行統合、制訂全方位的地緣戰略以及大戰略(grand strategy)。換言之，當談論宗教、文明、種族，以及資源等地緣政治議題時，衝突主體（行為者）所具有的能動性，可能還遠不如國家，反有賴國家提出解決方案。

另外，全球化與區域化被視為一體兩面，區域經濟組織能夠促進全球化自由貿易，然而一旦發生金融危機，或者是能源危機，區域組織可能因採取保護主義政策而產生對立。換言之，地緣政治衝突非必然是軍事衝突並引發戰爭，然而儘管是經濟衝突，想要理解組織間衝突、或者是國家在組織內立場，地緣政治仍是重要的理解途徑。

（二）科技發展對地理的衝擊

另一種認為地緣政治不合時宜的論點在於，因為地形以及距離造成的地理屏障，隨著科技發展已經被克服，此論點並不否認國家仍是重要行為者，不過認為

³ Robert D. Kaplan, ,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Foreign Policy*, (May/June 2009), pp. 96-105.

科技發展已經排除地理因素對國家決策的影響，傳統地緣政治的海權與陸權主張將不適用。此論點主張新的軍事科技，例如，核子武器、長程導彈以及衛星系統等等，可以克服過去山脈、河川以及距離等問題對軍事行動造成的阻礙。然而，核武以及導彈的發射仍然需要陸上基地、海上航空母艦以及潛艦等作為發射器，這些發射設施與裝備如何部署，亦受到地緣政治各種條件限制。由此來看，馬漢海權論提到國家發展海權需要經濟、軍事以及海軍基地等條件，仍合乎現代軍事科技發展。此外，衛星系統可用於軍事情報蒐集和軍備監控，協助部隊聯繫與決策，現階段仍是軍事行動的輔助工具，未能取代傳統地面部隊的功用。

地理位置與國家相對位置，仍對國際關係產生重大意義，例如，2008年，小布希政府決定在波蘭與捷克部署飛彈防禦系統，即引起俄羅斯強烈反對。美國雖表示飛彈部署的目標是伊朗而非俄羅斯，但代表美國與東歐國家將進行直接的軍事合作，再加上波捷兩國鄰近俄羅斯的地緣現實，使俄羅斯對此議題不讓步。2009年，歐巴馬政府宣布放棄在東歐部署飛彈防禦系統計畫，將以船艦防禦以及部署短程飛彈防禦系統在南歐和土耳其境內的方式取代原訂計畫。美國取消舉動受到法英德三國的支持，但卻又引起東歐兩國不滿。整體事件可以看到各國的地緣政治考量：從美國全球戰略來看，其改善與俄羅斯的雙邊關係，有助於處理伊朗、阿富汗以及北韓等核武與反恐等議題。俄羅斯對伊朗與北韓仍具影響力，美國想要推促這兩國回到國際談判機制，避免擦槍走火，若缺少俄羅斯合作的話，勢必難以達成，同樣對阿富汗議題上，俄羅斯允許美國及北約經由其領空進行後勤補給，亦有助盟軍在此區域的維和行動；而從法德英三國地緣政治來看，亦不願意因北約勢力東擴，惡化美歐與俄羅斯的關係，東歐兩國則害怕再次被犧牲，重回俄羅斯的勢力範圍。整個政策轉變過程，飛彈防禦系統本身所代表的科技功能，反而遠不如地緣政治意義。

二、理論的挑戰

學界目前針對「地緣政治」一詞的定義尚未產生共識，最鬆散的定義為「空間與政治的關係」，這樣的定義雖然安全，也不會遭致嚴厲的批評，不過卻淪於空泛，無助於實際研究。本文所指的地緣政治，較接近帕克(Geoffrey Parker)的定義：從空間以及地理的視野，進行國際關係研究。⁴本文的研究則是在帕克所定義的基礎上，將歷史一併帶入。亦即，從空間以及地理的視野，進行長時間的國際關係研究。

本文採用的地緣政治分析途徑接近佛列德曼(George Friedman)的方法論，地緣政治乃基於兩個假設：第一，人類會組織比家庭還大的社會單位，在組織過程中必然產生參與政治的行為。地緣政治學認為人類天生、且自然會忠於原生地的人、事、物、部落、城市與國家。在現代，國家認同仍然十分重要，地緣政治學呈現國家間的關係是人類生活的重要面向，意謂戰爭是普遍的現象；第二，地緣政治學主張國家特質相當程度受到地理影響，並決定國家之間的關係。佛列德曼的地理定義相當廣泛，包括位置的自然特質，也涵蓋特定地方對個體與共同體產生的影響。⁵此外，地緣政治是一種思考世界的方式，用來預測事件過程會產生何種結局。地緣政治將經濟學「看不見的手」概念，應用到國家與其他國際行為者，兩者皆假設參與者是理性的，至少知道短期利益為何，無論大國或小國，都會受到現實的侷限。

然而，就理論層次而言，古典地緣政治學以及採取以國家為中心的方法論，遭致不同學者的挑戰。例如，歐圖泰爾(Gearóid Ó Tuathail)對地緣政治提出四項論點：(一)地緣政治並非是抽象，或者限於少數菁英團體使用的語言，而是對國際政治背景的描述，地理特性不只是位置或者地形，其中亦牽涉到分類、一系

⁴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London: Pinter, 1998), p. 5.

⁵ George Friedman, *The Next 100 years: A Forecast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 Doubleday, 2009), p. 12.

列的敘述(narratives),以及適當的外交政策回應;(二)地緣政治具有實踐(practical)以及形式(formal)兩種論據,實踐地緣政治指官僚、政治人物以及軍事指揮官等國家機關實踐者,關切自身與主導外交政策;形式地緣政治則指戰略思想家以及民間知識份子,從世界政治地圖整體角度研究國際事件;(三)研究地緣政治需要更廣泛的地理知識,以特定國家或是世界體系為整體來研究,地理範圍包括地區、國家以及跨國區域,議題則嵌入性別、種族和認同;(四)霸權的地緣政治受葛蘭西思想啟發,並且是非國家中心的研究,討論美國霸權背後由誰制訂地緣政治規則。⁶歐圖泰爾將這些不同的理論視野統稱為批判地緣政治學,他本人則是偏好以文本分析公眾人物、媒體以及知識份子等,如何詮釋全球空間,以及這些詮釋如何影響實際政治運作。針對批判地緣政治學,國內學者認為,批判地緣政治學的發展即是檢討在全球化和科技發展下,古典地緣政治學是否不足以解釋現狀,並提出另一解釋途徑。古典地緣政治學提供國家決策的參考,批判地緣政治研究是學術研究而非實務,其研究旨趣在於解構實務者的地緣政治論述下的權力與空間關係。⁷

本文認為,古典地緣政治學與批判地緣政治學的差別在於目的與方法論。古典地緣政治學目的在於提供決策選擇,具有濃厚的政策導向意味,屬於問題解決理論(problem solving theory);而批判地緣政治學研究主體較為多元,包括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議題亦非限於國家間事務,而是涵蓋族群、宗教、文化以及貧富差距等議題,批判地緣政治學研究目的在於理解。在方法論上的差異:兩者除研究主體差異(國家、非國家),對於世界構成本質(物質、理念),即對本體論的看法並不相同。於認識論上的差異則在於,古典地緣政治學採實證主義,以歷史資料佐證,批判地緣政治學則是偏向詮釋途徑,背後蘊含理念和意識型態。

簡言之,古典地緣政治學與批判地緣政治學,兩者的研究目的與方法顯然不同。不過,兩者間關係與其說是互相排斥,不如說相互彌補,如同國關理性主義

⁶ Gearóid Ó Tuathail, *Critical Geopolitics*(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 60-61.

⁷ 莫大華,「批判性地緣政治戰略之研究」,《問題與研究》,47卷第2期(2008年6月),頁72。

理論(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與批判/後現代/後結構/建構主義理論間的關係，可以透過對話以豐富學術成果。以國家為中心的古典地緣政治學確實遭受全球化衝擊，地緣政治研究途徑亦可能受到限制，無法用於解釋所有議題。這些研究限制可成為將來研究地緣政治學者，進一步鑽研的主題。

第三節 未來研究議題

本文在研究過程當中發現許多值得研究的地緣政治議題，然礙於篇幅限制以及避免偏離本文主軸而未能深入探討。從學科發展過程來看，17世紀到20世紀法國地理學思想與地緣政治發展息息相關，但未產生像德國地緣政治學一樣巨大的影響力，且發展背景和主張都跟德國或者是英美學者不同，若能夠深入耙梳法國地理思想、地緣政治學以及地緣戰略的關聯性，將能系統性理解理論與實務的差異。

因此，地緣政治仍有相當大的研究空間，以本論文延伸出的議題，可以從下述地緣政治議題著手：

首先，回歸歐洲地緣政治思想，特別是追溯並釐清法國人文地理學、年鑑學派歷史學和地緣政治學之間的思想關聯性，從學科發展的歷史脈絡，找出這三者間存在何種共同點，以及與歷史地理學差別何在。

第二，古典地緣政治學主張海權與陸權二元論，這些主張差別與學者所處地理位置(歐陸國家還是海洋國家)是否相關，法德俄三國所發展出來的地緣政治思想，與英美兩國的研究差別何在。

第三，當代地緣政治學者受到國際關係理論影響，在分析過程引用國際體系概念，然而，兩者之間關聯卻未系統性的整合，究竟是國際體系影響地緣政治，還是地緣政治改變影響國際體系等，仍待進一步研究與釐清。

第四，本文儘量避免使用地緣政治理論這一描述，主要是筆者同意地緣政治

是一門學科，但對於地緣政治是否是一套理論，筆者採取保留態度。因此採用比較方法，進行各個地緣政治學流派分析，釐清究竟是理論還是研究途徑，並試圖建構一套地緣政治研究架構。

第五，從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與發展過程，探討歷史地緣政治學建立以及發展的可能性。

第六，理解地緣政治學各學派的發展，以及未來的研究趨勢。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一) 專書

B. H. Liddell-Hart 著，鈕先鍾譯，2008年，戰略論—間接路線。台北：城邦文化事業，二版。

B. H. Liddell-Hart 著，鈕先鍾譯，1998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第一冊。台北：城邦文化事業。

Nicholai Bukharin 著，呂智明譯，1988，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台北：南方叢書出版社。

Paul Claval 著，鄭勝華等譯，2007，地理學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三版。

Williamson Murray, Macgregor Knox and Alvin Bernstein 等編，時殷弘等譯，2004，締造戰略：統治者、國家與戰爭。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Daniel Levy, Max Pensky and John Torpey 等編，2007，鄧伯宸譯，舊歐洲、新歐洲、核心歐洲。台北：立緒文化事業。

Charles de Gaulle 著，尹國祥、郭彥譯，1975，戴高樂從政回憶錄。台北：黎明文化事業。

Jean Monnet，孫慧雙譯，1989，歐洲之父—莫內回憶錄。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Robert Kagan，蕭蓉、魏紅霞譯，2004，天堂與實力。北京：新華出版社。

William R. Keylor 著，蔡百詮譯，1989 年，二十世紀國際史。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G. de Bertier de Sauvigny and David H. Pinkney 著，蔡百詮譯，1989 年，法國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Will and Ariel Durant 著，幼獅翻譯中心編譯，1978，拿破崙的升沈。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Will and Ariel Durant 著，幼獅翻譯中心編譯，1970，路易十四與法國。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三版。

Stephen J. Lee 著，王瓊淑譯，1999，三十年戰爭。台北：城邦文化出版。

蔡東杰，2006，西洋外交史。台北：風雲論壇有限公司。

張麟徵，2002，近代國際關係史。台北：揚智文化。

王曾才編著，1998，西洋近世史。台北：正中書局。

張錫模，2003，聖戰與文明—伊斯蘭與世界政治首部曲 AD610-1914。台北：玉山社。

--2007，地緣政治學教學講義。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

賴建誠譯著，2003，年鑑學派管窺。台北：左岸文化。

（二）期刊論文

莫大華，2008 年 6 月，「批判性地緣政治戰略之研究」，問題與研究，47 卷第 2 期，頁 57-85。

時殷弘，2005 年，「法國大革命、拿破崙和國際政治的變更」，歐洲研究，第 6 期，頁 1-13。

藍玉春，2004 年 7、8 月，「歐盟尼斯條約評析」，問題與研究，43 卷第 4 期，頁 73-94。

二、外文部分

(一) 專書

- Allain, Jean-Claude., et al (els), 2007. *Histoire de la Diplomatie Française II—De 1815 à nos jours*. Paris: Editions Perrin.
- Albrecht-Carrié, René, 1973.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New York : Harper & Row.
- Autrand, Françoise., et al (els), 2007. *Histoire de la Diplomatie Française I—Du Moyen Age à l'Empire*. Paris: Editions Perrin.
- Blouet, Brian W.(ed.), 2005. *Global Geostrategy—Mackinder and the Defence of the West*. New York: Frank Cass.
- Bodin, Jean. Julian H. Franklin (Trans), 1992, *On Sovereign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zo, Frédéric, 1998. “France,” in Michael Brenner (ed.), *NATO and Collective Security*.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INC, pp. 39-80.
- Brenner, Michael, (ed.), 1998. *NATO and Collective Security*.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INC.
- Brzezinski, Zbigniew. 1997. *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Braudel, Fernand. Siân Reynolds(tran), 1993. *The Identity of France Volume 1—History and Environment*.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 Braudel, Fernand. Siân Reynolds(tran), 1992. *The Identity of France Volume 2—People and Productio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 Brock, W. R. 1963. “England,” in J. O. Lindsay(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 History Volume VII—The Old Regime 1713-63*.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41-268.
- Bromley, J. S. (ed.), 1971.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VI— 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15/25*.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ry, J. P. T. 1971.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X—The Zenith of European Power 1830-70*.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rr, E. H. 1963.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1984.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1919-1939*.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Cohen, Saul B., 1975. *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a World Divid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nd Edition.
- 2009. *Geopolitics—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Second Edition.
- Craig, Gordon. 1971. “The System of Allianc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J. P. T. Bury,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X—The Zenith of European Power 1830-70*.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46-273.
- Creswell, Michael, 2006. *A Question of Balance—How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reated Cold War Europ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lark, George. 1971. “The Nine Years War, 1688-1697,” in J. S. Bromley (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VI—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15/25*.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23-248.
- Demangeon, A. 1920. *Le Déclin de l'Europe*. Paris: Payot & Cie.
- De Montferrand, Bernard. 2006. *Diplomatie—Des Volontés Françaises*. Condé-sur-Noireau: Editions Alban.
- De la Blache, P. Vidal., Millicent Todd Bingham(tran.), 1926. *Principles of Human*

- Geograph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 De la Blache, P. Vidal. 1918. *La France de l'Est--Lorraine-Alsace*.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Twelfth Edition.
- De Planhol, Xavier. Janet Lloyd (tran), 1994.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Fr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ringdon, Hugh, 1989. *Strategic Geography: NATO, the Warsaw Pact, and the Superpowers*. New York: Routledge, 2nd Edition.
- Friedman, George. 2009. *The Next 100 years: A Forcast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Doubleday.
- G. Chandler, David, 1971. "The Art of War on Land," in J. S. Bromley (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VI—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15/25*.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741-762.
- Grygiel, Jakub J. 2006. *Great Powers and Geopolitical Chang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Gierowski, Józef and Andrzej Kamiński, 1971. "The Eclipse of Poland," in J. S. Bromley (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VI—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15/25*.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681-715.
- Goodwin, A. (ed.), 1965.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VIII—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1763-93*.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odwin, A. 1965. "Introductory Summary," in A. Goodwin(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VIII—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1763-93*.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24.
- Goodwin, A. 1965.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October 1789-February 1793," in A. Goodwin(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 VIII—*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1763-93*.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680-713.
- Gollwitzer, Heinz. 1969. *Europe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1880-1914*. New York: W. W. Norton.
- Crawley, C. W. (ed.), 1975.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IX—War and Peace in an Age of Upheaval 1793-1830*.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awley, C. W. 1975.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815-30,” in C. W. Crawley(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IX—War and Peace in an Age of Upheaval 1793-1830*.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668-690.
- Gray, Colin S., 2005. “In Defence of the Heartland: Sir Halford Mackinder and His Critics a Hundred Years on,” in Brian W. Blouet (ed.), *Global Geostrategy—Mackinder and the Defence of the West*. New York: Frank Cass, pp. 17-35.
- Griffin, Charles C. 1978. “The States of Latin America,” in F. H. Hinsley(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XI—Material Progress and World-Wide Problems 1870-1898*.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16-541.
- Harrison, Michael M., 1981. *The Reluctant Ally—France and Atlantic Security*.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eld, Davi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2002. *Governing Globalization*. Malden: Polity Press.
- Held, David and Anthony McGrew, 2002. “Introduction,”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Governing Globalization*. Malden: Polity Press.
- Hill, Christopher, 1998. “Closing the Capabilities-Expectations Gap?” in John Peterson and Helene Sjursen (eds), *A Common Foreign Policy for Europe? Competing Visions of the CFSP*. New York: Routledge, pp.18-38.

- Hinsley, F. H. (ed.), 1978.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XI—Material Progress and World-Wide Problems 1870-1898*.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bson, J. A. 1965. *Imperialism—A Study*. New York: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Holsti, Kaleve J. 1991. *Peace and War—Armed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1648-1989*.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festos, Panayiotis, 1988. *Nuclear Strategy and European Security Dilemmas — Towards an Autonomous European Defence System?* Brookfield: Gower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 Ikenberry, John. 2001. *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oll, James. 1971. “Prussia and the German Problem, 1830-66,” in J. P. T. Bury,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X—The Zenith of European Power 1830-70*.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93-521.
- Kennedy, Paul. 1989.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Kissinger, Henry. 1994.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 Lacoste, Yves. 2006. *Géopolitique—La Longue Histoire D’Aujourd’hui*. France: Larousse.
- Lewis, Michael. 1971. “Armed Forces and the Art of War: Navies,” in J. P. T. Bury,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X—The Zenith of European Power 1830-70*.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74-301.
- Lindsay, J. O. (ed.), 1963.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VII—The Old Regime 1713-63*.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loyd, C. C. 1975. “Armed Forces and the Art of War—Navies,” in C. W.

- Crawley(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IX—War and Peace in an Age of Upheaval 1793-1830*.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76-90.
- Lossky, Andrew. 1971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ope,” in J. S. Bromley (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VI—The Rise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1688-1715/25*.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54-192.
- Mackinder, Halford J. 1942.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Washingto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 A. T. Mahan, 1987.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Inc.
- Mongrenier, Jean-Sylvestre. 2006. *La France, L’Europe, L’Otan—Une Approche Géopolitique de l’Atlantisme Français*. Paris: Editions Unicomm.
- Moore, Rebecca R., 2007. *NATO’s New Mission—Projecting Stability in a Post-Cold War World*. Westpor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 Morgenthau, Hans J. 1966. *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NY: Alfred A. Knopf, fourth edition.
- O’Loughlin, John(ed.), 1994. *Dictionary of Geopolitics*. London: Greenwood Press.
- Ó Tuathail, Gearóid. 1996. *Critical Geo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Pierre, Goubert. Maarten Ultee(tran.), 1988. *The Course of French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 Parker, Geoffrey, 1985.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Groom Helm Ltd.
- 1988. *The Geopolitics of Domination*. London: Routledge.
- 1998.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Pinter.
- Peterson, John and Helene Sjursen (eds), 1998. *A Common Foreign Policy for Europe?*

- Competing Visions of the CFSP*. New York: Routledge.
- Peterson, John and Helene Sjursen, 1998. "Conclusion—The Myth of the CFSP?" in John Peterson and Helene Sjursen (eds), *A Common Foreign Policy for Europe? Competing Visions of the CFSP*. New York: Routledge, pp. 169-185.
- Robson, Eric. 1963. "The Seven Years War," in J. O. Lindsay(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VII—The Old Regime 1713-63*.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65-486.
- Schirato, Tony and Jen Webb, 2003.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 Shennan, J. H. 1995.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ope, 1689-1789*. New York: Routledge.
- Sloan, Stanley R., 2003. *NATO,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Atlantic Community — the Transatlantic Bargain Reconsidered*. New York: 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 Spykman, Nicholas J., 1942.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 1944.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 Sutton, Michael. 2007. *Fr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urope, 1944-2007—The Geopolitical Imperativ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 Taylor, A. J. P. 197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F. H. Hinsley(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XI—Material Progress and World-Wide Problems 1870-1898*.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42-566.
- 1980.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omson, Mark A. 1963. "The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in J. O. Lindsay(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VII—The Old Regime 1713-63*.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16-439.

Thornton, A. P. 1978. "Rivalries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Middle East and Egypt," in F. H. Hinsley(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XI—Material Progress and World-Wide Problems 1870-1898*.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67-592.

Watson, Adam. 1992.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Wesseling, H. L., Diane Webb(tran.), 2004. *The European Colonial Empires 1815-1919*.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Wilson, C. H. 1963. "The Growth of Overseas Commerce and European Manufacture," in J. O. Lindsay(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VII—The Old Regime 1713-63*.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7-49.

(二) 期刊論文

Alliot-Marie, Michèle, 2003, "France Is Ready to Play Its Role in Global Security," *European Affairs*.

Bryant, Janet, Autumn 2000, "France and NATO from 1966 to Kosovo: Coming Full Circle?" *European Security*, Vol. 9, No. 3, pp. 21-37.

Debré, Michel, April 1971, "France Global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 49, No. 3, pp. 395-406.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2008, "The Role of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7, No.2, pp. 357-364

- Ghez, Jeremy and F. Stephen Larrabee, April-May 2009, "France and NATO," *Survival*, Vol. 51, No. 2, pp. 77-90.
- Gomart, Thomas, Spring 2007, "France's Russia Policy: Balancing Interests and Valu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0, No. 2, pp. 147-155.
- Gougeon, Jacques-Pierre, été 2009, "France-Allemagne: Vers une Nouvelle Rivalité?" *La Revue Internationale et Stratégique*, No. 74, pp. 75-85.
- Gray, Colin S., 1991, "Geography and Grand Strategy,"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0, pp. 311-329.
- Hoffmann, Stanley, 1992, "Dilemmes et Stratégies de la France Dans la Nouvelle Europe (1989-1991)," *Politique Étrangère*, Vol. 57, No. 4, pp. 879-892.
- Howorth, Jolyon, 2002, "La France, l'OTAN et la Sécurité Européene: Statu Quo Ingérable, Renouveau Introuvable," *Politique Étrangère*, Vol. 67, No. 4, pp. 1001-1016.
- Kaplan, Robert D. May/June 2009, "The Revenge of Geograph," *Foreign Policy*, pp. 96-105.
- Kramer, Steven P., 1991. "La Question Française," *Politique Étrangère*, Vol. 56, No. 4, pp. 959-974.
- Mackinder, Halford J., July 1943, "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Foreign Affairs*, Vol. 21, pp. 595-605.
- Menon, Anand, 1995, "From Independence to Cooperation: France, NATO and Europe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1, No. 1, pp. 19-34.
- Merchet, Jean-Dominique, 2005, "Les Transformations de l'armée Française," *Hérodote*, No. 116, pp. 63-81.
- Spykman, Nicholas J., Feb., 1938, "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 I,"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2, No. 1, pp. 28-50.
- Vernet, Daniel, Oct. 1992, "The Dilemma of French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8, No. 4, pp. 655-664.

Yost, David S., 1989, "France in the New Europe," *Foreign Affairs*, Vol. 69, pp. 107-128.

(三) 網站資料

Ehrhart, Hans-Georg, January 2000, "France and NATO: Change by Rapprochement?" Heft 121, Hamburg, pp. 1-32,

<http://www.ifsh.de/pdf/publikationen/hb/hb121.pdf>

Joyner, James, 19 Mars, 2009, "France in Collision Course on NATO?" *Atlantic Council*, <http://www.acus.org/print/3427>

Michel, Leo, 6 Dec. 2008, "France's Return to NATO Can Complement EU Security," *Speigel*,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0,1518,drunk-559304,00.html>

Moran, Michael, "French Military Strategy and NATO Reintegratio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12, 2009),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6619/french_military_strategy_and_nato_reintegration

Verluisse, Pierre, "La France de Retour Dans le Commandement Integre de l'OTAN?" 1 Oct. 2007, http://www.diploweb.com/spip.php?page=imprimer&id_article=82

(四) 官方資料

Fifteenth Ambassadors Conference—Speech by M. Nicolas Sarkozy,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Paris), 27 August 2007,

Http://www.premier-ministre.gouv.fr/en/information/press_871/fifteenth_ambassadors (2009年6月15日閱讀)

Le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ALTO (trans), *The French White Paper on Def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aris: Odile Jacob, 2008.

http://merln.ndu.edu/whitepapers/France_English2008.pdf. (2009年7月1日閱讀)

Le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Livre Blanc Sur la Defense*, 1994,

<http://merln.ndu.edu/whitepapers/France1994part1.pdf>. (2009年7月1日閱讀)

Lettre et Memorandum du General de Gaulle au General Eisenhower (17 Septembre 1958), <http://www.ena.lu>. (2009年7月1日閱讀)

NATO Allied Command Operation,

<http://www.nato.int/shape/news/2009/07/090727a.html> (2009年7月1日閱讀)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http://eur-lex.europa.eu/en/treaties/dat/11992M/htm/11992M.html#0104000047>

(2009年7月8日閱讀)

(五) 新聞媒體

Le Figaro, “France / Otan : les arguments pour et contre ,” 11 Mars, 2009,

<http://www.lefigaro.fr/international/2009/03/11/01003-20090311ARTFIG00495-franceotan-1>

Le Figaro, “Pour Bayrou, Sarkozy jette aux orties l’héritage gaulliste ,” 12 Mars,

2009, <http://www.lefigaro.fr/politique/2009/03/12/>

Le Figaro, “Quand Mitterrand déjà négociait le retour dans l’Otan ,” 13 Mars, 2009,

[Http://www.lefigaro.fr/international /2009/03/11/](http://www.lefigaro.fr/international /2009/03/11/)

Le Figaro, “Otan : Jospin et Fabius font front commun contre Sarkozy ,” 18 Mars,

2009, <http://www.lefigaro.fr/polituqye/2009/03/18>

Le Mon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donne son feu vert au retour de la France dans l’OTAN,” 17 Mars, 2009,

http://www.lemonde.fr/web/imprimer_element/0,40-0@2-3224,50-1168927,0.html

附錄

法國地緣政治事件表

時間	事件	對法國的地緣政治意義	歐洲地緣政治特色
1648 年	三十年宗教戰爭結束，交戰國簽訂威斯特伐利亞條約。	法國地緣戰略主要目標為突破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包圍，並且繼續維持德意志區域的政治分裂狀態。	主權國家構成西歐國家體系。
1659 年	法西戰爭結束，簽訂庇里牛斯山條約。	解除法國西疆的安全威脅，使其全力向西擴張陸權。	西班牙霸權衰微。
1713 年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結束，簽訂烏特勒支條約。	法國同時進行陸權與海權擴張，遭受反法聯盟阻止。	法國霸權與反法聯盟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競逐。
1763 年	法英七年戰爭結束，簽訂巴黎條約。	法國地緣戰略的對手國，海權為英國，陸權為普魯士。戰爭結果使法國喪失北美殖民地。	英國奠定海上霸權地位，用以維持大英帝國勢力的擴張。
1783 年	美國獨立戰爭結束。	法國海權援助美國，但亦導致財政危機，間接引發法國大革命。	英國喪失北美殖民地，將擴張重心移往亞洲。
1815 年	拿破崙戰敗，維也納體系（歐洲協調體系）建立。	法國地緣政治困境再次牽制法國海權與陸權霸權。維也納體系為一反法包圍聯盟。	英國致力維持歐陸權力平衡，法國尚能維持大國地位。
1856 年	克里米亞戰爭結束。	英國與法國的海權合作，共同遏止俄國勢力擴及東地中海。法國開始嘗試在海權與英國合作。	俄國勢力崛起並往西擴張，與奧地利、英國以及法國產生地緣政治衝突。
1871 年	普法戰爭，法國戰敗。	德國統一對法國產生直接的安全威脅，德國成為法國地緣戰略首要目標。	俾斯麥反法體系的建立，英國採取孤立中立政策。
1918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戰敗。	法國的地緣戰略主要在避免德國再次成為安全	法國與德國周遭國家建立反德聯盟。

		威脅。	
1945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戰敗且分裂成東、西德。	德國對其安全威脅減弱，但是法國全球地緣政治影響力逐漸式微。	兩極體系建立。美國與蘇聯在歐洲的影響力取代傳統歐洲國家。
1950 年	法國外長提出舒曼計畫。	法國藉由經濟整合，即整合法國的鐵礦與西德的煤礦，避免法德衝突再起。	歐洲整合開始進行，成為美國與蘇聯外的第三股國際勢力。
1966 年	法國退出北約軍事指揮體系。	法國試圖扮演歐亞大陸的新權力平衡者，拓展與第三世界的外交關係。	西德重新武裝且加入北約。歐洲政治整合失敗。
1989-1991	中東歐共產政權垮台、德國統一與蘇聯解體。	歐洲地緣政治變動同時對法國地緣戰略產生契機與挑戰： 契機：能夠藉主導歐洲整合，以提升法國影響力。 挑戰：德國統一後成為潛在性競爭對手。	國際體系從兩極轉為單極體系。歐洲整合突破傳統政治邊界限制。
2009 年	法國重返北約軍事指揮體系。	法國地緣戰略轉向與美國合作。	歐盟與北約不斷向東擴張，與俄羅斯形成緊張關係。